

# 淡江外語論叢 December 2011 No. 18

## 目 錄

---

數字口譯密集練習初探 .....	張鳳蘭	1
“Deny Self for Self’s Sake”? Identity, Authorship, Print Culture, and Benjamin Franklin .....	游錫熙	33
華勒斯《兒童》中的人物命名研究 .....	王秀文	58
Traduisibilité et intraduisibilité Une étude interculturelle du concept de romantisme .....	陳麗娟、賈瑪琍、江 灝	75
La pluralité de l’étude du voyage et du roman dans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et littéraire .....	楊淑女	92
La sensualité et son expression poétique dans les Folastries de Ronsard .....	舒卡夏	113
Raumbezogene PPn im Deutschen und Chinesischen: Eine Analyse aus vergleichender Perspektive .....	羅麗蓓	136

文學作品中文字意象的研究－  
以詩人布洛克詩中五大文字意象為例  
..... 廖梨月 158

〈本期送審論文共 11 篇， 7 篇獲推薦， 4 篇未獲推薦〉

***Tamkang Studies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o. 18***

**CONTENTS**

No. 18 December 2011

Intensive Practice of Number Interpretation-a Preliminary Study ..... Feng-lan Chang	1
“Deny Self for Self’s Sake”?: Identity, Authorship, Print Culture, and Benjamin Franklin ..... Joseph Hsi-hsi Yu	33
Study of the character’s name as in the novel <i>The Child</i> ..... Hsiu-wen Wang	58
Translatable or non-translatable — Taking the concept of “Romantic”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issues ..... Li-Chuan Chen / Marie-Paule Chamayou / Hao Chiang	75
Plurality of novel and travel study in cultural and language creation ..... Shu-Nu Yang	92
Sensuality and its apoetic expression in Follastries Ronsard ..... Katarzyna Stachura	113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Spatial PPs in German and Chinese ..... Lyih-Peir Luo	136
A study of verbal image in literary works based on analyzing five verbal images in A. Blok’s poetry ..... Liao Lee-Yueh	158

# 淡江外語論叢

第18期 2011年 12月號

*Tamkang Studies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o.18, December 2011

---

淡江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發行

Published by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amkang University

---

發行人/Publisher：吳錫德/ Hsi-deh Wu

主編/Chief Editor: 林盛彬/ Sheng-bin Lin

編輯委員/Editors: 薛玉政/ Yu-cheng Sieh、邱彥彬/ Yen-bin Chiou

林盛彬/ Sheng-bin Lin、杜東璿/ Regina Tu

楊淑娟/ Shu-Chuen Yang、阮若缺/ Rachel Juan

張秀娟/ Hsiu-chuan Chang、查岱山/ Dai-shan Jahr

曾秋桂/ Chiu-kuei Tseng、賴錦雀/ Jiin-chiueh Lai

張慶國/ Ching-gwo Chang、王愛末/ Ay-moh Wang

執行秘書/Executive Secretary：阮劍宜/ Chien-yi Juan

編輯助理/Editorial Assistant：曾香屏/ Heung-ping Tsang

---

地址：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淡江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電話：886-2-2621 5656 ext.2558

886-2-2622-4593

電子信箱：[jtsfee@staff.tku.edu.tw](mailto:jtsfee@staff.tku.edu.tw)

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不得轉載或翻譯

---

Address: Tamk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o.151, Yingzhuan Rd., Danshui Dist., New Taipei City 25137, Taiwan(R.O.C.).

Tel: 886-2-2621 5656 ext.2558      886-2-2622-4593

E-Mail: [jtsfee@staff.tku.edu.tw](mailto:jtsfee@staff.tku.edu.tw)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int and translation rights must be obtained by writing to the address above.

---

ISSN 1562-7675

# 數字口譯密集練習初探

張鳳蘭 / Feng-lan Chang

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助理教授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摘要】

數字是口譯員的大敵，但實證研究卻不多見。本研究旨在探討一套數字口譯的自我練習方法能否提高同步口譯數字的正確性。五名研究生在一學期之中，一週五天，每天密集練習數字口譯 15-30 分鐘。成果由前測、後測加以監測，並在寒假停止練習一個月後，再度測試學生數字口譯的能力是否又會回到原點。實驗結果支持這套密集練習的潛力。

## 【關鍵詞】

數字口譯、口譯、口譯訓練、口譯教學、同步口譯

## 【Abstract】

Numbers are the foes of many best interpreters. Numbers are challenging and yet critical. Despite the difficulty and significance of numbers in interpreting, relevant empirical studies are limited. Research on systematic training of number interpreting is especially scarce. Hence,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whether an intensive number practice regime can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numbers in English-to-Chines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Five graduate students in an interpretation program practiced pre-recorded materials full of numbers in the format of one-minute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and two-minut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They practiced for 15-30 minutes five days a week for one semester. Their progress was tracked with a pretest, a post-test, and a follow-up test after the winter break.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potential of this number practice regime.

## 【Keywords】

number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training, teaching of interpreting

## 壹、背景及目的

1982 年一份研究口譯職業壓力的調查指出，在 826 個口譯員中 65%的口譯員認為數字口譯是工作壓力的一個來源。數字即使對資深的口譯員也是個挑戰 (Alessandrini 1990)。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梅德明教授在《英語高級口譯資格證書考試高級口譯教程》中也明確指出「數字翻譯是口譯中的一大難關，即使是資深譯員，當遇到數字時，尤其是遇到五位數以上的數字時，亦不敢有半絲鬆懈，這不僅僅是數字難譯，更因為是在商貿談判或外交活動中，數字誤譯所造成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梅德明 2000：435)。

在口譯教學中，數字口譯需要特別的訓練 (Liu 2005)。諸多的口譯訓練教材當中，數字口譯常自成一個單元 (如劉敏華 1993；周兆祥 & 陳育沾 1995；張維為 1999；鍾述孔 1999；劉和平 2001；吳冰等 2004；仲偉合 2006；林郁如等 2006)，反映了數字口譯的重要性和困難。遇到數字，特別是大的數字便神經繃緊的口譯學生為數不少；文獻指出，口譯學生對數字常有厭惡感，有時甚至強烈到演講中一出現數字就慌張或無法思考 (Wu 2001)。即便如此，探討有系統的數字訓練的研究卻少之又少，尤其在台灣探討如何有系統地練習數字的研究還付之闕如。

筆者在蒙特瑞國際研究學院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攻讀口筆譯學位時，好些同學也遭遇數字口譯的挑戰，一心想突破卻遲遲未見成效。資深的台灣口譯員兼教師建議我們練數字要每天練，並且不要光練單純的數字，而要拿財經雜誌滿是數字的材料以逐步口譯對同步口譯 1：2 的比例，一週五天每天作 15 分鐘左右的練習。根據老師的說法，逐步對同步 1：2 的比例是因同步模式下的數字口譯因時間的壓力，而相對比較困難，所以平日練習比重宜加重。筆者在返台擔任口譯教職之後，希望能探討這樣的練法對口譯研究所的學生是否有效，若是有效，可以推廣，甚至可將教材和大家分享，幫助許多想在數字口譯有所突破的人省時省力。本研究在學術上有助於瞭解數字口譯的本質和訓練過程及自我提升的方法，進而能有效應付令許多專業口譯員緊張的數字口譯問題，提高台灣口譯員的專業水平，避免在重要的會議中因誤譯數字而造成不可彌補的遺憾。研究結果也能成為口譯老師教學上的參考。

## 貳、文獻探討

鮑剛在口譯理論概述中指出，為了減輕數字口譯的壓力，國內外都作了許多努力 (如王軍 1996；許湘 1999；Pellatt 2006)，並且也逐漸形成一些對策；但他也明確地表示：「眾所皆知，數字口譯至今仍是具有相當難度的」(鮑剛 2005：

203)。數字給口譯員相當大的挑戰，主要的原因包括：

- (1) 數字所攜帶的巨大信息量；
- (2) 單位時間內數字信息變化的迅速性與多樣性；
- (3) 數字在語境中的難以預測性；
- (4) 數字信息之間的低相關性低冗餘度；
- (5) 數級差異」在雙語數字互譯時所產生的干擾；
- (6) 以上諸條所造成的譯員數字感知、記憶時的困難。(鮑剛 2005：193)

Wang 在探討了相關文獻之後，用吉爾（Gile）的精力分配模型（the Effort Model）（Gile 1995; 1997; 1999）詳細分析了影響數字口譯的因素（Wang 2005, Table 2.2）。吉爾的理論在眾多口譯理論中是極具影響力的。Effort Model 把口譯的過程分解為聽解和分析源語的任務（Listening & Analysis Requirement）、記憶的任務（Memory Requirement）、以及組織和表達譯語的任務（Production Requirement），每個任務都需要消耗大腦的精力，任何額外精力的支出都可能導致精力分配失衡。吉爾用「走鋼索」來比喻口譯，因為口譯員在工作中一直處在注意力接近飽和的狀態。在聽解方面，數字容易因為長度短（short duration）、冗餘度低（low redundancy）的緣故，因一時聽解的精力不足而增加信息處理的負荷。在記憶的負荷方面，數字的處理可能存在語音的層次（phonological level），因而需要消耗更多的處理能力來儲存信息（maintain information）。在譯語的組織和表達方面，當數字互譯牽涉到位數的轉換時，像是中文的「一萬」轉換為英文的「ten thousand」，便需要耗費大腦更大的力氣。其他細節請參考 Wang（2005, Table 2.2）。

數字口譯困難，卻又不容忽視。Jones（1998）認為數字對同步口譯員而言不易處理，而且在某些會議中是絕不容有錯的重要信息。因此迅速又準確地做好數字口譯，是口譯員的一大考驗（鍾述孔 1999；梅德明 2000；仲偉合 2006；林郁如等 2006），然而數字口譯相關的實證研究卻屈指可數，多為學者專家的觀察或假設（Wang 2005）。實證研究只有五六篇（Her 1995; Gotri 2003; Liu 2005; Wang 2005; Pellatt 2006），其中 Wang 以實驗的方式探討了數字對英譯中同步口譯的正確性與流暢度的影響，結果顯示相鄰出現的數字，和需要轉換單位的數字都會降低口譯的正確性與流暢度。因此作者的結論是：這類數字的口譯可能需要消耗較多的處理能力（processing capacity）。

Liu（2005）以實證的方式探討訓練、呈現模式以及數字難度對中譯英數字口譯的影響。結果指出位數越多的數字以及加了單位的數字（像是 25「萬」），會讓受測者的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增長。

Pellatt (2006) 跳脫了單純分析數字本身，而進一步探討數字出現的上下文對口譯難度的影響。他分析了 17 名口譯學生六分鐘的口譯譯文，結果發現第一個出現的數字沒有人翻對，顯示暖身 (warm up) 和做好準備 (preparedness) 對口譯的表現極為重要。資料也顯示重複出現的數字譯出較易，可能是因為還留在工作記憶 (working memory) 中的關係；此外，研究結果也明顯指出，不只複雜的大數字容易譯錯，簡單的小數字也不例外。

Her (1995) 採用了前測後測的設計探討數字口譯訓練是否有效。八名修口譯課的英文系大學生參與了實驗。前測包括 (1) 口譯單純的數字；(2) 口譯含數字的短文。前測之後，學生接受了四個星期的堂上數字口譯訓練。內容包括聽了英文的數字之後跟著重複以及記下該數字、學習中英文數字互譯的規則如 1 billion = 十億；100 million = 一億；10 million = 一千萬；10 thousand = 一萬等等。經過四週的訓練之後，受測者再次接受前測的兩個測驗做為後測比較學習成效。結果發現後測的正確性比前測高。

Her 的研究有以下幾個限制：(1) 她只進行了四星期的課堂數字口譯訓練，但實際上口譯課上課的時間有限，而且學生需要學的技能很多，無法在課堂上花太多時間光練習數字。數字準確和迅速地翻譯需要大量地練習 (張維為 1999：119；鍾述孔 1999)，口譯學生在訓練的過程中很需要一套有系統、長期的自主練習方法來徹底提生數字口譯的能力。(2) 作者自己也指出，該實驗的前測和後測並非真正的口頭演講 (oral speeches)，只是書面的新聞剪輯。(3) Her 的實驗結果指出在四星期的數字訓練，學生後測結果的確進步了，但並未追蹤停止訓練之後學生是否還能維持數字口譯的能力。

## 參、研究方法

### 一、研究問題

此研究之目的在探討一套數字口譯的自我練習方法是否能提高口譯所研究生的數字口譯能力。具體的研究問題如下：

- (一) 一週五天每天練習逐步口譯一分鐘、同步口譯兩分鐘左右、內容含有許多數字的教材，是否能提高口譯所研究生在英譯中同步口譯數字的正確性？
- (二) 經過一個學期左右持續的練習，若在寒假中停止練習，寒假後學生數字口譯的能力是否又會回到原點，退步到前測的程度？



##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依照研究目的設計並錄製了一套逐步口譯和同步口譯比例為 1:2 的數字口譯練習材料，讓口譯組的研究生一週練習五天，每次約 15-30 分鐘。經過將近一個學期的持續練習之後，比較練習前的前測和學期末的後測結果，看學生同步口譯中數字的正確性是否提升了。詳細方法如下：

### (一) 受試者

受試者為彰師大翻譯研究所口譯組學過逐步口譯和同步口譯的二年級和三年級研究生共五名。本所的研究生人數很少，但因為這套練習的目的主要是要探討它是否對將來有可能進入口譯市場的研究生是否有幫助，所以受試者的首選是研究生。若要考慮樣本的大小以滿足統計的要求，在本校只能採用上過口譯入門的英語系大四學生，但他們的程度和練習動機與翻譯所的研究生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不合適當受試者。有鑑於符合參加資格的研究生只有五名，本研究先針對這幾人進行實驗初探，若有初步正面的結果，則可尋求跨校合作，以取得足夠的樣本和較有力的結論。

### (二) 測驗材料

本研究所有的測驗，包括前測、後測和寒假後的追蹤測驗均為同一篇擷取自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雜誌的演講「The Middle Kingdom: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01, Vol.67, No.6) (附錄 1)。這是美國 *Community of Science* 公司的總裁兼執行長 Douglas Patterson 於 2000 年在中國的一場演講。演講的主旨是講者對中國成為全球科技研發重鎮的潛力充滿信心。*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雜誌於 1934 年出版至今，專門收集近期美國知名人士重要演說的講稿。筆者透過電腦資料庫作關鍵字搜尋，選取內容提及許多數字的演講稿，用微軟 (Microsoft) 的 WORD 軟體中拼字和文法檢查 (Spelling & Grammar) 下的可讀性分析 (Readability Statistics) 篩選出 Flesch Reading Ease 在 20-30 之間，且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為 12 的演講稿，最後挑出文中出現需要及不需轉換位數的數字各超過 25 個，而且演講的主題不會過度冷僻或專業的一篇講稿。筆者以一分鐘 110 字的速度，錄製長度約為 10 分鐘的演說作為測驗材料。*The Middle Kingdom: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這篇演講很長，因為主要在講中國的成就和潛力，所以提到很多數字。筆者針對測驗的需要，將該篇演講稍加編輯：一開頭的開場白和客套話以及 *Community of Science* 公司的基本簡介是很好的暖身材料；接著進入該公司較詳細的歷史發展，這一段因需背景知識所以予以刪除，避免影響學生的表現；接下來講者開始談中國的經濟成就，因此便提及一連串的數字。為了要含括至少

25 個不需轉換位數和 25 個需轉換位數的數字，並且爲了將長度控制在十分鐘左右，文中穿插了兩小段擷取自另一篇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題爲 *Development in China* 的演講（2008, Vol.74, No.3）（見附錄 1 斜體字）。這一篇的難度也符合上述的篩選標準，並且內容也完全在講中國的經濟成就，所以接在一起一點都不突兀。演講一直錄到 12 分鐘左右才切斷。因爲數字不少，再長下去恐怕學生作同步口譯會不堪負荷。

Flesch Reading Ease Test 的分數越高表示閱讀難度越低，90-100 分的材料一般母語是英語的五年級生可輕易讀懂，八九年級的學生可輕鬆看懂 60-70 分的材料，而 0-30 分的材料則要大學畢業生才能讀懂。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則將 100 分換算成美國的學年年級，Level 8 是 8 年級可以看得懂文章，Level 12 則是 12 年級可以讀懂得文章。

錄音速度決定採用一分鐘 110 字，是根據劉敏華教授在《建立國家翻譯人才評鑑基準之研究》所使用之數據（劉敏華 2005：117），同步口譯以英語爲源語的平均產出速度約爲 1 秒 1.81 個字，即一分鐘約 100-120 字。此外，彰師大翻譯所的同步口譯資格考試一向採用一分鐘 110 字的錄音速度，因此本研究的測驗錄音檔也採用這個速度。

此研究採用 Flesch Reading Ease 在 20-30 之間，且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爲 12 的演講稿，以一分鐘 110 字的速度錄音，目地在於確保測驗材料有一定的難度，避免程度高的學生在前測就取得高分，導致無法從測驗中追蹤學生後期的進步。以這個速度錄製內容有許多數字並且內容稍有難度的講稿作同步口譯並不容易，筆者自己在錄完音之後試作同步口譯，發現的確頗具挑戰性。採用稍快的速度的另一目的是不讓學生有太多思考換算的時間，以測試他們平日密集練習數字之後對數字互譯的反射能力。

### （三）進行步驟

- (1) 學期初進行前測（pretest）。
- (2) 錄製每週的練習材料給學生練習。學生每天練習，並按時將當天的練習錄音檔上傳給研究助理。
- (3) 學期末進行後測。
- (4) 後測之後，緊接著作問卷調查。
- (5) 寒假過後再使用前測的材料測試學生於停止練習一個月之後，數字口譯的能力還能維持多少，是否又會退步到原點（前測階段）。

每一步驟的具體方法分述如下：

(1) 前測：

開學第一週讓學生做前測的英譯中同步口譯錄音存檔。

(2) 錄製每週的練習材料：

英文錄音材料也取自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1934-2007)，中文則取材自吳冰主編的《現代漢譯英口譯教程》(吳冰等 2004) 的數字練習以及仲偉合主編的《英語口譯教程》等教材(仲偉合 2006；陳翔 2005)，選取滿是數字的演講稿或短文，有些則是一系列的短句(附錄 3)。*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的稿子由筆者以一分鐘約 120 個字的速度錄製成 MP3 檔案。由於本研究測試的焦點在英譯中的同步口譯，並且受試者中譯英口譯還非常有待琢磨，中文稿錄音的速度由筆者斟酌學生上課的程度決定，同步口譯的部分比一般會話速度稍慢，以避免練習材料過度困難。錄音內容逐步口譯和同步口譯的比例為 1：2，也就是逐步口譯 1 分鐘、同步口譯 2 分鐘的長度。單數週星期一三五三天練英譯中，星期二四兩天練中譯英；雙數週則相反。筆者錄音之後，將每週的練習檔案給受試者。學生從週一到週五每天練習約 15-30 分鐘之後，便將該天練習成果的 MP3 檔用電子郵件傳給研究助理。遲交者沒有分數，以確保學生確實照進度完成每天的練習。學生只要每天練習的時間夠長，就可把錄音檔交出來，並不需要練到完美才能錄音。因為練習的重點是每天花少量的時間持續天天練，而不是每次都花好多時間而影響學生長期堅持下去的意志力。

在本計劃的前導研究(pilot study)中，受試者作了一篇難度類似真正前後測演講的同步口譯，該演講的錄音速度是一分鐘 120 字。學生們反映一分鐘 120 個字有些快，但是還可以挑戰。而且學生們投票贊成平時練這個速度，目的就是練輕功的精神，平時練慣速度快的演說，一旦養成習慣和實力，將來更能應付不同速度的講者。但測驗的源語速度仍為一分鐘 110 個字，因為彰師大的同步口譯資格考的源語速度是這個速度，學生們希望藉這個密集練習也能順便準備資格考。扣除期中考及期末課業過重的幾週，受試者一共作了 13 週的數字練習。

(3) 後測：

本研究採用前測同一篇演講錄音做為後測材料以利比較。受試者在做完前測後，筆者不給稿也不討論。四個月之後受試者並不記得前測的內容，特別是滿天飛的數字。學生們表示實在不記得內容，有些人甚至對演講的主題都印象模糊。

(4) 問卷調查：

後測結束之後，筆者讓學生以不記名的方式回答了一份開放式的問卷(open-ended questionnaire)(附錄 2)，讓他們暢所欲言，以深入瞭解學生們在密

集練習之後的心得和感受。問題包括學生對這套密集訓練的看法、是否覺得有幫助、其優缺點為何、最需要改善和最好的一點各是什麼、是否曾覺得受不了而想放棄、是否有其他任何建議等等。

#### (5) 追蹤測驗：

寒假過後，用前測再次讓受試者作英譯中同步口譯，測試他們在假期中停止數字練習一個月之後數字口譯的能力還能維持多少，會不會又回到原點（即前測階段）。

### 肆、結果和資料分析

受試者同步口譯的譯文錄音的分析如下：十二分鐘的譯文中出現的前 50 個數字分為需要轉換位數（例如英文的「one billion」譯成「十億」）和不需要轉換位數（如英文的「five thousand」譯成「五千」）兩大類各 25 個。針對這 50 個數字作正譯（accurate interpretation）、漏譯（omission）、誤譯（inaccurate interpretation）、模糊處理（approximation）四項分析（Alessandrini 1990）。正譯的定義為數字完全翻對，漏譯為受試者漏翻某個數字，誤譯則為數字翻錯，而模糊處理指的是沒精準地翻出某數字，只是翻出大致的範圍（如「53 million」譯成「五千多萬」）。此外，如果一個數字帶單位，單位翻錯則整個算錯。從每位受試者在三次測驗中這四個變數的百分比（%）變化可看出這套數字口譯的練習材料和方法是否提高了他們數字口譯的正確性。

由於符合實驗資格的研究生人數極有限，結果只能作質的分析。個別受試者的實驗結果如下：

#### 一、甲生

表 1 為甲生的三次測驗成績。其前測的正譯的比例就高達 80%，而後測及追蹤測試中的正譯比例僅呈現微幅的波動而已（前後測的差別僅為 4%；而追蹤測驗與前測的差別為 6%）。由於正譯的比例已高，相對地他的漏譯、誤譯及模糊處理的比例均低，而且波動的幅度也很有限。甲生的進步情況呈現學習高原（plateau）的停滯現象。

表 1：甲生的三次測驗成績

甲生	全部 50 個數字		
	前測	後測	追蹤
正譯	40 (80%)	38 (76%)	43 (86%)
漏譯	2 (4%)	4 (8%)	1 (2%)
誤譯	6 (12%)	7 (14%)	4 (8%)
模糊處理	2 (4%)	1 (2%)	2 (4%)

## 二、乙生

表 2 為乙生的成績。他在前測的正譯比例只有 32%，經過 13 週的密集練習之後正譯提升了一成，但寒假過後卻又回到和前測一模一樣的比例 32%。乙生的漏譯頗為嚴重，50 個數字漏譯將近一半，高達 48%，後測結果顯示密集練習對他的漏譯毫無幫助。乙生的誤譯在前測為 20%，經過練習改善了一成，而寒假過後又稍稍退步，比前測好 6%。乙生從頭到尾沒有採用任何模糊處理的技巧。該生主要的變化是正譯和誤譯在密集練習之後改善一成，但遺憾的是進步的成果卻無法在休假後維持。

表 2：乙生的三次測驗成績

乙生	全部 50 個數字		
	前測	後測	追蹤
正譯	16 (32%)	21 (42%)	16 (32%)
漏譯	24 (48%)	24 (48%)	27 (54%)
誤譯	10 (20%)	5 (10%)	7 (14%)
模糊處理	0 (0%)	0 (0%)	0 (0%)

### 三、丙生

表 3 中丙生的進步是令人鼓舞的。他最大的變化在於正譯和漏譯。其他二者則無太大的波動。他的正譯在前測比例很低，只有 10%，但後測一口氣進步到 42%，並且在追蹤測驗時仍然高達 50%。在前測中他漏了一半以上的數字，然而後測改善了近三成，只漏 26%，追蹤測驗時持續改善，只漏 14%。丙生的成績顯示這套密集的數字練習對他是有效率的，而且進步的成果絲毫沒受到休息一個月的影響。

表 3：丙生的三次測驗成績

丙生	全部 50 個數字		
	前測	後測	追蹤
正譯	5 (10%)	21 (42%)	25 (50%)
漏譯	27 (54%)	13 (26%)	7 (14%)
誤譯	16 (32%)	15 (30%)	17 (34%)
模糊處理	2 (4%)	1 (2%)	1 (2%)

### 四、丁生

丁生的表現也不遑多讓。他也幾乎沒用到模糊處理的技巧，但其他三項的表現後測都比前測進步。正譯、漏譯和誤譯在後測分別改善了 36%、16% 和 18%。丁生和丙生不同之處在於寒假停止練習對他的進步有些影響，但成績並未回到前測的原點。三項變數的進步幅度分別維持了 14%、8%、4%。

表 4：丁生的三次測驗成績

丁生	全部 50 個數字		
	前測	後測	追蹤
正譯	17 (34%)	35 (70%)	24 (48%)
漏譯	19 (38%)	11 (22%)	15 (30%)
誤譯	13 (26%)	4 (8%)	11 (22%)
模糊處理	1 (2%)	0 (0%)	0 (0%)

## 五、戊生

戊生的表現和乙生較類似。他的正譯比例和乙生不相上下，在前測為 34%，後測也進步了一成，但這一成的進步卻沒法維持。他的漏譯比乙生少（乙生漏了將近一半），但他漏譯的比例在密集練習過後變化極小。誤譯也沒因練習的關係而有所改善。而他使用模糊處理的比例也不高。基本上這套數字練習在戊生身上並未發揮功效。

表 5：戊生的三次測驗成績

戊生	全部 50 個數字		
	前測	後測	追蹤
正譯	17 (34%)	21 (42%)	17 (34%)
漏譯	17 (34%)	18 (36%)	19 (38%)
誤譯	11 (22%)	10 (20%)	14 (28%)
模糊處理	5 (10%)	1 (2%)	0 (0%)

## 六、研究問題一

一週五天每天練習逐步口譯一分鐘同步口譯兩分鐘左右，內容含有許多數字的教材是否能提高口譯所研究生在英譯中同步口譯數字的正確性？

受試者的個別資料分析顯示五人中有一人達學習高原進步呈停滯狀態，其餘四人前後測的正譯比例都有進步，幅度分別為 10%、32%、36%、8%（表 6-1）。至於翻錯的部分，漏譯和誤譯改善一成以上的各有兩人。丙生和丁生漏譯分別改善了 28%和 16%；而乙生和丁生的誤譯則分別減少了 10%和 18%（表 6-2），另外戊生的模糊處理也減少了 8%。因此五人中有四人正譯的比例在經過密集練習之後提高，這是受試者較一致的結果。而翻錯的部分則每個人進步的模式各不相同，有些變數有明顯的進步，有些與前測差不多，但並沒有明顯退步者。因此從此次實驗的五名研究生的資料來看，本研究這套密集的數字練習有潛力提升英譯中同步口譯數字的正確性。

表 6-1：前後測正譯的差距

受試者	甲生	乙生	丙生	丁生	戊生
正譯差距	-4%	10%	32%	36%	8%

表 6-2：前後測錯誤的差距

類別/受試者	甲生	乙生	丙生	丁生	戊生
漏譯	4%	0%	-28%	-16%	2%
誤譯	2%	-10%	-2%	-18%	-2%
模糊處理	-2%	0%	-2%	-2%	-8%

## 七、研究問題二

經過一個學期左右持續的練習，若在寒假中停止練習，寒假後學生數字口譯的能力是否又會回到原點退步到前測的程度？

表 7-1 和 7-2 為追蹤測驗減去前測所得的差。由表 7-1 可見，學生在寒假停止練習之後五人中有三人正譯的比例還比前測高，分別是甲生 6%；丙生 40%和丁生 12%。前文已提過甲生呈現學習高原的情況，因此變化的幅度非常小，情況較特殊。剩下乙生和戊生二人則回到原點，正譯比例與前測一模一樣，但卻也沒有退步。



至於翻錯的部分，維持進步幅度較明顯的是丙生和丁生的漏譯以及戊生的模糊處理。其他的波動幅度很小。

基本上五人中有一人停留在學習高原，二人有進步，另兩人回到原點，由於受試者人數極有限，所以不宜有太多詮釋。這個研究問題需要有大一點的樣本，才能做出結論。回到原點的二人值得進一步探討其原因。

表 7-1：追蹤測驗與前測正譯的差距

受試者	甲生	乙生	丙生	丁生	戊生
正譯差距	6%	0%	40%	12%	0%

表 7-2：追蹤測驗與前測錯誤的差距

類別/受試者	甲生	乙生	丙生	丁生	戊生
漏譯	-2%	6%	-40%	-8%	4%
誤譯	-4%	-6%	2%	-4%	6%
模糊處理	0%	0%	-2%	-2%	-10%

## 伍、討論

### 一、測驗資料

由於本所符合實驗條件的受試者只有五人，因此得來的數據只能作質的分析，對兩個研究問題作初步的探討。此外，本實驗因整個練習過程密集，需要受試者相當大的投入，因此實驗結合同步口譯課程的作業，以該學科極重比例的成績作為鼓勵學生堅持到底以及認真交作業的誘因。本所的同步口譯課為中英雙向，所以練習材料也為雙向。但鑑於作有許多數字的同步口譯難度高，加上受試者中有幾位中譯英和英譯中有很明顯的落差，光練習一個學期，中譯英恐怕尚未成氣候，所以先測試英譯中的同步口譯的進步狀況。未來進一步的研究，也可考慮探討中譯英方向的成果。

本研究與 Her (1995) 一樣，也發現個別差異。參加實驗的五人中，甲生的數字口譯非常強，而且做同步口譯時聽到數字，他通常不需先將數字寫下，翻對的機率就很高。本研究在尋找測驗材料時，特別找了有些難度的演講，目的就是要避免甲生一開始就分數過高而看不出後來的進步情況。但結果發現甲生一開始的表現遠遠超過其他同學，正譯高達八成，可是勤練了一個學期之後卻呈停滯狀

況，還是一直停留在八成上下。可見數字口譯一旦到達相當高的正確度時，有些人要有明顯的突破可能要花更久的時間。

丙和丁生則有相當明顯的進步。丙生的正譯比例從 10% 一口氣進步到 42%，寒假過後還高達 50%。他的漏譯則由 54% 降到 26% 再降到 14%，因此丙生的進步情況是每個口譯老師所樂見的。丁生的進步也令人欣慰。正譯由 34%，一躍而升到 70%，寒假休息後也還維持在 48%。漏譯則由 38%，降到 22%，追蹤測驗維持在 30%。這兩位學生的進步肯定了這套練習的效果。

乙生和戊生的進步幅度卻都相當有限。兩者的正譯在後測的確進步了一成，但在追蹤測驗時，又都回到原點。乙生是實驗組五人中交作業情況最不理想的，較常需研究助理督促。原因是他有個全職的工作，因此影響了練習。乙生已是三年級學生，只剩一兩門課要修，一天 15-30 分鐘的練習他原本認為不成問題，而且也極有意願參與，但一學期下來還是發現受工作的影響。在整個實驗結束之後，筆者特別和乙生與戊生進行面談以深入瞭解原因。乙生表示他因全職工作常需工作到很晚，有時作業遲交是因為沒有耐心一口氣完成全部的錄音；當他翻得比較順暢時，隔天會比較願意繼續練習和錄音，若練得很不理想時，第二天的錄音會成為他的心理負擔，特別是工作累了之後更是如此。由乙生的例子可見積極專一練習的重要性，太多旁務和過度勞累，都會影響練習和其成效。戊生則是五人中英文的基本功較弱的一位，同步口譯的表現也相對較吃力。根據吉爾精力理論 (Gile 1995; 1997; 1999)，他可能在聽解和分析源語的任務、記憶的任務、以及組織和表達譯語的任務中的每個任務都需要消耗大腦的精力。任何額外精力的支出就可能導致精力分配失衡，所以她的數字口譯進步也較緩慢，而且不易維持。另外根據助理的紀錄顯示，戊生有時作業也遲交。面談時戊生表示他遲交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毅力，因為其他作業很多，有時實在不想好好練習和錄音，只想隨便交差了事。

針對第二個研究問題，寒假停止練習後，受試者的進步是否會回到原點的議題，仔細分析五人的個別表現，發現練習較不積極者和語言基本功較弱者，進步幅度較小，而且較不容易維持，這與一般學習原理一致。這五名研究生的實驗資料顯示不同程度的學生，投入的功夫和時間不同者成效各有不同。由於五人中程度高已達學習高原者除外，另兩人維持住了進步，而其餘回到原點的二人則因旁務太多或英文基本功較弱，因此，結合問題一與問題二的結果分析，基本上按部就班認真做練習的學生呈現練習有成效的趨勢。是以初步實驗結果支持這套數字密集練習的潛力，本實驗值得進一步跨校合作，透過更大的樣本才能作進一步的結論。此外，受試者的資料中，呈現一些有趣的模式，以下是有關哪種數字較易

出錯的詳細討論：

(一) 不需轉換位數 vs. 需轉換位數：

如前所述，由於受試者的模糊處理部分所佔的比例極低，所以不作進一步分析。其他三項結果又就不需轉換位數與需轉換位數區分，結果列於表 8。

表 8：不需轉換（位數）vs. 需轉換（位數）

	正譯		漏譯		誤譯	
	不需轉換	需轉換	不需轉換	需轉換	不需轉換	需轉換
前測	21%	6.5%	16.5%	27%	10%	15%
後測	30.5%	16%	13.5%	19.5%	5.5%	11.5%
追蹤	27.5%	13.5%	14%	20%	8%	16.5%

整體而言，實驗數據顯示在三次測驗中需要轉換位數的數字較容易出錯或漏翻。這個結果支持了鮑剛（2005）的理論，因「數級差異」所產生的干擾讓數字口譯更為困難。此結果也符合 Wang（2005）在論文中所提及吉爾（Gile）的精力分配模型（the Effort Model），在譯語的組織和表達方面，當數字互譯牽涉到位數的轉換時，便需要耗費大腦更大的力氣，因此較易出錯。所以學生們應努力練習位數轉換到幾乎能反射反應的地步，才能提高數字口譯的正確性並降低處理數字所需要的腦力（processing capacity requirement）和精力（劉敏華 1993；鮑剛 1999；梅德明 2000；Her 1995）。

(二) 無單位 vs. 有單位：

受試學生在三次測驗中有單位的數字翻對的比例都比無單位的數字低（表 9）。三次測驗的正譯平均，有單位的數字為 28.7%，而無單位的數字則高出一倍，達 59.9%。這個結果支持 Liu（2005）的結論，帶單位的數字會增長受試者的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當然也與吉爾的精力理論說法一致。

(三) 小數字 vs. 大數字：

大於 10,000 的數字在三次測試中正譯的比例都比小於 10,000 的數字低。三次正譯的平均，大數字為 27.9%，而小數字則高出一倍達 53.6%。實驗結果也與吉爾的精力分配理論一致。

(四) 數字密度低 vs. 密度高：

本研究採用的演講中有兩段數字特別密集。但出乎意外的是三次測驗中學

生翻對的比例並不低於整篇演講的平均（表 9）。經仔細分析發現這兩個段落有許多數字是需轉換的，像是百分比、年代、和 trillion（兆）。需作數位轉換的兩串數字則剛好都碰上相同位數的數字連續出現。其中一串是 90,000 和 65,000，另一串是 300,000、360,000、280,000 和 320,000，此發現與 Wang（2005）的資料相違。Wang 發現相鄰出現的數字會影響口譯的正確性，原因是由於需消耗較多的處理能力（processing capacity）。這結果較符合 Pellatt（2006）的說法，重複出現的數字譯出較易，可能是因為還留在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中的關係。可見相同位數的數字連續出現，也有類似的效果。

表 9：正譯的比例

	無單位	有單位	<10,000	>10,000	整篇演講	數字密度高的 2 個段落
前測	45.3%	17.7%	41.7%	15.5%	27.5%	33.3%
後測	71.9%	38.2%	64.3%	37.9%	49%	55.6%
追蹤測驗	62.5%	30.1%	54.8%	30.2%	41%	43.1%
平均	59.9%	28.7%	53.6%	27.9%	39.2%	44%

#### （五）訓練之前與之後部分譯文分析：

**原文一：**In 2006, U.S. GDP was 11.4 trillion dollars and China's was 2.65 trillion dollars. The World Bank statistics show that between 2003 and 2005, the U.S. economic growth contributed to 29.8% of world GDP growth, ranking first, while China contributed to 13.8%, ranking second. China's contribution to world GDP growth in 2007 is estimated at 16%. Economic stability and growth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 of the whole world.

#### 丙生前測：

在 2006 年，美國的 GDP 是十一萬一千美金，而中國是二萬四千美金，也因此美國的經濟成長也造就了世界 GDP 的成長。美國佔了全世界 GDP 的首位，而中國則貢獻了 13.8 兆的 GDP，佔世界排名第十二。而經濟成長以及穩定，特別是在中國的經濟成長及穩定，以及美國的經濟，對於世界的繁榮以及經濟成長也非常重要。

丙生後測：

在 2006 年，美國的 GDP 是 11.4 兆美金，而中國是 2.4 兆美金。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在 2003 年到 2005 年之間，美國的經濟成長造就了世界 29.3% 的 GDP，排名第一；而中國則貢獻了 13.8 個百分比，排名第二。因此中國在 GDP 的成長部份，2007 年據估計會達到 16%；而美國對於經濟成長以及整個世界的繁榮，也非常重要。

丙生追蹤測驗：

在 2006 年，美國的 G、GDP 11、11.1 兆美金，而中國是 2.1 兆美金。世界銀行顯示在 03 到 05 年之間，美國的經濟成長佔了 29.2% 的全球 GDP，是世界第一。而中國則佔了 13.8 個百分比，佔全球第二。中國對於世界 GDP 的貢獻成長，在 2007 年，據估計大約是 16%。而穩進、而經濟的穩定度在中國，對於美國來說也非常重要。對於美國的繁榮以及經濟的成長，對世界都是如此。

**分析：**丙生在前測數字不是翻錯就是漏譯，但後測中畫線部分顯示經過勤練之後訊息更完整，而且數字的準確度大幅提升。追蹤測驗中雖然畫線的三個數字出錯，但比起前測卻是小錯，因位數都翻對了，而且整個段落的訊息和後測一樣完整。

丁生前測：

在 2006 年，中國、美、中國的、的 GDP 是 6 兆美元。2002 年到 2005 年之間，美國的經濟成長，長了 28、29.8 的、佔了 29.8% 的全世界百分比，世界第一，而中國則是第二名。中國對於全球的 GDP 成長，在 2007 年預計是 16%，中國在、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穩定，對於全世界的經濟發展和繁榮是非常重要的。

丁生後測：

在 2006 年，美國的 GDP 是 11.4 兆美元，中國是 2.4 兆美元。世界銀行表、表示，在 2003 到 2005 年之間，美國的經濟成長將達到了、佔了全世界的 29.8%，世界第一；中國佔了全球的 13.8%，世界第二。中國對全球的 GDP 2007 年的成長，將會達到 10、16%。中國和美國的經濟成長非常的重要，對於全球來說也非常的重要。

#### 丁生追蹤測驗：

在 2006 年，美國 GDP 是 11.4 兆美元，中國是 2.56 兆美元。世界銀行顯示，在 2003 年到 2005 年之間，美國的經濟成長構成了全球的 28.、28.9% 的 GDP 成長，是全世界第一，而中國構成了在 2.38、2.38%。在 2007 年，中國的全、中國在全球 GDP 的比例大概是 16%。在中國和美國的 GDP，對於中、全球的繁榮經濟是非常重要的。

分析：丁生的前測顯示他的慌亂和勉強，因此譯文不太順暢，有點回溯 (backtracking) 的傾向，畫線部分的中文有些怪，數字也遺漏較多。在後測中 backtracking 仍時有所見，但訊息更為完整和正確 (劃線部分)。追蹤測驗還是比前測完整，雖然中文仍不夠順暢。

#### 乙生前測：

美國的 GDP.....。中國的 GDP 達到了二十五億。在 2003 及 2005 年，美國的經濟成長貢獻了、貢獻了世界經濟佔了、就對世界經濟佔了 29.3%。中、中國對 2007 年的 GDP 全球成長率就貢獻了 16%，這對全世界的經濟成長有極大的貢獻。

#### 乙生後測：

中國的 GDP 是 11.4 兆美元。美國的經濟、經、美國的 GT 對世界 GTP 成長，貢獻了 29.8%，排名第一。中國則是 2、24.1%。經濟的穩、中國的經濟穩定及中、美國的穩定，也對世、世界的成長、經濟成長是非常重要的。

#### 乙生追蹤測驗：

在 2006 年，美國的 GTP 達到了 1、11.4 兆。世界的統計數字指出，在.....，美國的貢獻佔世界 GDP 第一，而中國則是佔第二。在 2000 零年，中國的佔有率在明年約 16%。

分析：乙生在前測中訊息片片斷斷不連貫而且有好些遺漏，雖然 2003，2005、2007 年以及 16% 翻對了。後測中訊息稍微完整些，但數字只對了「29.8%」和排名「第一」兩個。而追蹤測驗中訊息仍有片段不連貫的問題。從全文整體的表現來看，乙生的英文基本功不弱但分神仍不成熟，所以同步口譯內容有些難度時，還是容易見樹不見林，顯得吃力。因此首要之務應先突破分神。以下的

原文二與三，因情況類似，就不再分析乙生的譯文和策略了。

**戊生前測：**

在 2006 年，美國的 GP、GDP 是 11.6 兆，中國的 GDP 大貴是、大約是 2、2 兆。2003 年到 2005 年，美國的 GDP 佔了世界的 29%，是世界第一；中國的 GDP 佔了世界的 13%，是世界第二。而 2007 年中國的 GDP，全世界佔、被預計佔 16%，所以中國的成長對於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影響。

**戊生後測：**

過去的 GDP，美國比中國多了很多。在 2003 到 2005 年間，美國的 GDP 佔了全球的 29.8%，是第一名；中國是 10、佔了 13.8% 的 GDP，是第二名。在 2007 年，中國的 GDP 將會被預測佔全球的 16%。這對中國來說，對全球的經濟或是全球的繁人都有、都有非常大的進步。

**分析：**戊生前測的劃線部分採用模糊處理，但在後測則較勇於挑戰更精準的數字。

**原文二：**In 1998, there were more than 90,000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the sciences, about another 65,000 graduate students pursuing degrees in medicine, and more than 300,000 in graduate studies in engineering.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there were almost 360,000 students studying the sciences, more than 280,000 studying medicine, and more staggering still, more than 1.3 million studying engineering. This does not even begin to count the 320,000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overseas.

**丙生前測：**

大約在 1998 年，有數萬個 中國學生就讀科技工程領域，另外則是就讀醫藥領域，再來則是在研究所攻讀科技工程領域。

在大學部，大約有三十、三萬六千名的學生就讀科技工程，其他也是讀醫藥等領域。不過、可見讀科技領域的學生非常的多。然後在海外也有許多中國學生就讀和電子工程、科技工程相關的領域。

**丙生後測：**

在 1988 年的時候，有超過九萬名的中國學生研讀科學，其中有二萬人就讀醫學，然後有三萬人是就讀工程。

在大學部的時候，有三萬六千名左右的學生就讀科學；然後有一百三十萬的大學生就讀工程相關科系。這也造成許多中國留學生到海外留學深造。

**丙生追蹤測驗：**

在 1980 年，大約有 16.5%的研究生就讀醫學，大約三十萬個人就讀工程。然後在大學部門裡頭，大約有三十六萬人研讀科學，比起二十二萬人左右的醫生、醫學生人數來得多。然後有三十多萬的人，就讀電子相關領域。

**分析：**丙生在前測中用了好幾個「許多」「非常多」「其他則是」等詞把數字模糊處理，其餘的則是漏譯或誤譯，簡而言之，他此時對數字的處理顯得很被動，招架不住。後測中丙生則完全沒用模糊處理的技巧，而勇敢地挑戰數字，雖然因數字來得密，所以還是有好幾個誤譯，但後測顯示丙生在訓練之後比較敢於挑戰數字。追蹤測驗也是如此。

**丁生前測：**

在 1998 年，有超過九十萬（誤譯）的人、中國學生學習西、學習科學；超過三十萬的人學習工程；有超過二百八十萬的人學習醫藥、醫學；有一、一百三十萬的中國學生學習工程。

**丁生後測：**

在 1998 年，有超過九萬的中國學生，學習科學；有二、有超過三十萬學生學習工程。

在大學生上，有超過三十六萬的人學習工程。更令人驚訝的是，有超過一百三十萬的大學生學習工程。這還不包括在海外學習的三十、三十二萬中國學生。

**丁生追蹤測驗：**

在 1998 年，有大約六千五百、六萬五千人學數學，有四、有四十萬人學工程；更令人驚訝的是，有超過、有一百三十萬人現在在學習醫學。這還



不包含了二百呢...二十萬在海外留學的中國學生。

**分析：**丁生在後測中譯出了更多的訊息和數字，三次測驗中畫線部分顯示回溯仍是個問題，表示有些數字的口譯還是無法成爲反射動作，脫口而出。

**戊生前測：**

無論是在硬體科技或是工程方面，都有許多人受此方面的教育。中國學生有 95%，大部份的大學生佔 95% 讀醫藥方面（摘要錯誤）。

有三十六萬學生、超過三十六萬學生、有三、三十六萬學生唸醫藥（誤譯，應是科學）方面，但是卻有超過百萬（模糊處理）的學生唸工程。

**戊生後測：**

有一、在 1998 年的時候，有超過九萬的人是、是唸科技的；然後有超過三萬人是唸工程；有三十六萬學生是學習科學，但是有二十八萬學生是學習、是學習醫學。這還沒有算到三十萬在海外學習的中國學生。

**戊生追蹤測驗：**

在、而在中國有六萬五千人學習醫學方面的，有三萬六千人、有三萬六千人學習醫學。而更驚人的是，有超過一百三十萬人學習工程。這還不包括、這還不包括三十萬在海外學習的學生。

**分析：**戊生前測大幅度漏譯，摘要也不正確。後測和追蹤測驗劃線部分是翻對的。三次測驗相較之下可見後測的譯文訊息較多，也較精準。

**原文三：** Because of China's remarkable growth, some people accuse China of taking away American jobs by expor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fact is, U.S. unemployment rate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round 4.5%, the lowest in history. Although 2.5 million manufacturing jobs were gone between 1996 and 2005, 15 million new jobs were created in the same period in the service sector, which accounts for 80% of the U.S. economy.

**丙生前測：**

因爲中國的成長，有人認爲中國會搶走美國的工作機會，但是事實上是，美國最近的失業是大約是在 4.25 個百分比，是史上最低的。即便有二百

五十個左、二百五十萬個工作機會流失，但是也是史上最低；不過在同期，也有數百萬的工作機會的增加，這對於美國經濟非常重要。

#### 丙生後測：

因為中國驚人的成長，有些人則指控中國奪取了美國的就業機會，因為他們出口許多產品到美國。但實際上，美國的就業、失業率是維持在 4.6%，是史上最低的。即便在 1996 年到 2005 年間，有五百五十萬的工作喪失，但是同期在服務業則增加了六百多萬的工作機會，這對美國經濟也是一大助益。

#### 丙生追蹤測驗：

因為中國驚人的成長，有人認為中國可能會藉由出口東西到美國，搶走美國的工作機會；但事實上，美國在最近的失業率大約是 4.9 個百分比，是史上最低。即便大約有二百五十萬個工作機會在流失當中，但是同時我們也創造出了一千五百萬個工作機會，這佔了美國經濟的 18% 左右。

**分析：**丙生在後測中聽到更多訊息（畫線部分），但訊息密時，正確譯出每個數字仍有困難。

#### 丁生前測：

因為中國的驚人成長，每個、很多人認為中國正在偷走美國的機會，因為中國出口太多東西到美國了。雖然有二百五十萬的工作機會，在 2005、1995（回溯又誤譯）年到 2005 年之間失去了，然而、但也會有、中國、中國對於美國也有非常、的（模糊處理）工作機會也有增加。

#### 丁生後測：

很多人認為中國正在搶中、美國人的工作，因為出口到美國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但是美國的失業率其實是歷史上最低 4.5%。雖然在 1996 年和 2005 年之間，有二百五十萬的工作喪失了，但是有、有一、一千五百萬的工作被創造了出來。

#### 丁生追蹤測驗：

因為這樣的成長，許多人指責中國正在搶走美國的工作機會，但事實上中

國的呢...美國的失業率在近幾年，是大約 4.5%，是歷史上最低的。雖然有、在 1、雖然在 1996 年和 2005 年之間，有二百五十萬工作消失了，但是在服務業當中，有超過一千五百萬的工作創造了出來。

**分析：**後測和追蹤測驗中的畫線部分是丁生在前測中沒翻，翻錯或模糊處理的。

**戊生前測：**

很、由於中國的快速發展，很多人指控中國偷、偷走了、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但是在最近這幾年，經濟成長率是 4.05%（誤譯，應是失業率是 4.5%），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低的成長率。有超過、有五千萬（誤譯，應是一千五百萬）的新工作被創造出來。

**戊生後測：**

因為中國的科技越來越進步，所以中國人開始跟美國人搶工作，但是近期美國人有 4.5%的經濟成長率，這是歷史上最低的成長率（譯文錯誤）。在 1996 年到 2005 年有許多的工作，有一千五百萬的新工作在這幾年被創造。

**戊生追蹤測驗：**

因為中國驚人的成長，有許多人指控中國拿走了美國人的工作，但是事實上是，中、美國的失業率在近年來是 4.5%，也是歷史上的新低。雖然有許、雖然在 1996 年到 2005 年有二十五萬的工作失去了，但是在此同時，在這個部門裡面，也有許多的新工作。

**分析：**這一段戊生在前後測都表現得不理想。嚴重漏譯，而且譯文錯誤。意外的是在寒假休息一個月之後，追蹤測驗卻比前後測完整，連貫，且較正確。戊生的英文基本功稍弱，表現較容易起伏不定，不夠穩定。這一段便是一例。

**小結：**以上三段譯文分析顯示，基本功已有一定程度的學生在專心和持續的練習之後較勇於挑戰數字，訊息也掌握得更完整更正確。但若是分神尚未突破者，數字的進步會受限制。而英文程度稍弱者，則可能需更長的練習時間才能有穩定的進步。

## 二、問卷

受試者在期末練習結束之後不記名回答了問卷（附錄 2）。所有的學生一致認為這個數字的密集練習有幫助，並且都推薦讓下一屆的學生繼續練習，他們回答的原因包括：「有練有差，會有動力」、「每天練習很有幫助」、「雖然練的時候很痛苦，但很值得」等等。兩位學生表示這套練習讓他們更能掌握數字；另兩人覺得每天的練習讓他們數字的轉換加快。問卷中的第五題問到學生最喜歡這套練習的哪一點，答案包括：「逼自己每天練數字」、「充滿挑戰性」、「練習完了之後又增加一點知識」、以及「數字多可以測試自己是否有進步」等。此外學生認為練習交完隔天老師提供演講原稿有絕對的幫助，因為可知道自己表現如何，以及錯在哪裡。

由於練習很密集，當被問及在過程中是否曾覺得受不了而想放棄時，一人說從來沒有，另四人表示有時的確會覺得很累很辛苦或受不了，特別是有其他的作業也要交時，或很累又聽不懂內容時，特別想放棄。但五人均表示老師的加油打氣很有幫助，讓他們能夠堅持到底。第四題問到這套練習最需改善的是哪一點，兩人回答沒有，兩人表示針對較難的詞可先給詞彙表，另一人表示也許可多一點有關台灣各方面的題材。問到這套練習的缺點時，回答包括「練習的時間比較不緊張，但真正錄的時候還是有點手忙腳亂」，「有時候沒精神作」，「若還沒錄音，一整天會把還沒錄音掛在心上」，另兩人則無任何表示。有趣的是，問卷最後一題問到對這套練習是否有其他任何建議，所有的學生都說沒有，或「so far so good」。整體來說，學生提出的負面意見很少。

總而言之，問卷中同學們對這個練習都抱著予以肯定的正面態度。有時會太累是大部分學生的心聲，但他們表示在老師的鼓勵下都能堅持到最後並且覺得有所收穫，因此他們的結論是這個練習絕對值得作。

至於練習材料的速度問題，前文提過在前導測驗中學生們投票決定平時材料的源語以較快的速度一分鐘 120 個字錄音，讓他們以練輕功的原理，平時練慣很快的速度，久而久之，較能應付各種速度的講者。三次測驗的速度則採用彰師大資格考試的同步口譯速度，源語為一分鐘 110 個字。追蹤測試做完之後，學生表示雖然測驗的速度比平時練習材料慢一些，但是這些有許多數字的材料，即使是一分鐘 110 個字，感覺上還是非常快，練了一學期的一分鐘 120 個字的速度並沒讓他們做起測驗來覺得游刃有餘。也許光是練 13 週還是不夠，更長的練習時間說不定會有不同的效果，或許如果不用數字特多的演講，而採用一般題材的演說，說不定這練習和測驗源語速度的落差會產生不同影響。平時以練輕功的原理，練速度很快的材料，是否最終能幫助學生應付各種速度的講者這個問題，是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有趣題材。

## 陸、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探討一套數字口譯的自我練習方法是否能提高口譯所研究生英譯中同步口譯數字的正確性。五名翻譯研究所口譯組的學生在一學期之中，一週五天，每天練習逐步口譯一分鐘同步口譯兩分鐘內容滿是數字的錄音材料。練習成果由前測，後測加以監測，並在寒假停止練習一個月之後，再度測試寒假過後學生數字口譯的能力是否又會回到原點，退步到前測的程度。實驗的結果顯示在後測中，五人中有四人的正譯比例比前測提高。而在追蹤測驗中，有兩人維持了正譯比例的進步，另兩人則回到原點，但回到原點的兩位學生中一人因旁務無法專心投入，另一人則可能因英文基本功較弱而進步較不易維持。基本上，實驗結果支持這套密集練習的潛力。

## 柒、研究限制和未來的研究方向

文中已數度提過人數過少是本研究的一大限制也是目前台灣各個翻譯研究所共同的問題。這個實驗不合適讓大學部的學生參與，因為本系大學部學生首先沒學過同步口譯，其次同學們英文基本功尚淺，再者學生們對如此密集辛苦的數字練習也無練習動機。在本實驗取得初步正面結果之後，下一步需要跨校合作，較大的樣本才能取得更具說服力的數據和結論。

##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王軍 (1996), 〈中英交替傳譯中繁複數字的筆記及傳譯技術初探〉,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第 6 期, 頁 52-58。

仲偉合 (2006), 《英語口譯教程》,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吳冰、戴寧、柯克爾、周燕和曾誠 (2004), 《現代漢譯英口譯教程》,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林郁如、雷天放和陳菁 (2006), 《口譯教程》,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周兆祥和陳育沾 (1995), 《口譯的理論與實踐》, 台北市: 台灣商務。

張維為 (1999), 《英漢同聲傳譯》,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陳翔 (2005), 《英語高級口譯技能訓練教程》,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許湘 (1999), 〈試論英語口譯中數字的譯法〉, 《常德師範學院學報》第 24 期第 6 卷, 頁 97-99。

梅德明 (2000), 《英語高級口譯資格證書考試高級口譯教程》,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劉和平 (2001), 《口譯技巧: 思維科學與口譯推理教學法》,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劉敏華 (1993), 《逐步口譯與筆記: 理論、實踐與教學》, 台北: 輔仁大學。

劉敏華、張武昌和林世華 (2005), 《國立編譯館委託研究計畫: 建立國家翻譯人才評鑑基準之研究第二期期末報告》。

鮑剛 (2005), 《口譯理論概述》,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鍾述孔 (1999), 《實用口譯手冊》,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英文部份：

Alessandrini, M. S. (1990), Translating numbers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3, 77-80.

Gile, D. (1995),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Gile, D. (1997),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s a cognitive management problem, In J.H. Danks, G. M. Shreve, S.B. Fountain, & M. K. McBeath (Eds.),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pp. 196-214),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Gile, D. (1999), Testing the Effort Models' tightrope hypothesis in simultaneous

- interpreting - A contributio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3, 153-172.
- Gotri, S. (2003), Figure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from French into Italia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SLMIT,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Bologna, Sede di Forlì, Italy, Abstract retrieved November 27, 2004, from <http://perso.wanadoo.fr/daniel.gile/Bulletin%2027.html>
- Her, E. (1995),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ining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of numbers with English as source language,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Teaching*, 81-101.
- Jones, R. (1998),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explained*,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Publishing.
- Liu, E. (2005), *Numbers Count - How Training, Presentation Mode, and Complexity Affect the Processing of Numbers in Interpretation*,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Pellatt, V. (2006), The trouble with numbers: how linguistic, arithmetical and contextual complexity affe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numbers, In M.Y. Cai (Eds.), *Professionalization in Interpreti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s in China* (pp.350-365),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Wang, H. Y. (2005), *Numbers as a quality variable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into Chinese SI*,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Wu, M. (2001),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strategic—a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teaching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6, 79-92.

## 附錄

### 附錄 1：測驗材料內容（節錄）

#### **The Middle Kingdom: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dress by DOUGLAS A. PATTERSON, President and CEO, Community of Science, Inc. Delivered in Shenzhen, China, October 14, 2000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me today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frastructure here in China - a process that will have far-reaching effects to better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Fir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host: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Shenzhen, who have done such a wonderful job preparing the facilities for our conference.

This is my first visit to China, and all of our hosts have worked together to make my stay both memorable and productive. I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

I am flattered to have been invited to address such an important group - one with a diverse membership but with whom I feel very comfortable.....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growing continuously and rapidly since you began reform and opening-up. This allows it to serve a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the prospe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for the growth of world economy. In 2006, U.S. GDP was 11.4 trillion dollars and China's was 2.65 trillion dollars. The World Bank statistics show that between 2003 and 2005, the U.S. economic growth contributed to 29.8% of world GDP growth, ranking first, while China contributed to 13.8%, ranking second. China's contribution to world GDP growth in 2007 is estimated at 16%. Economic stability and growth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 of the whole world.*

Consider these statistics.....



Several years ag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ublished a study that concluded that for every dollar an economy spends on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it will get back three dollars in economic growth.

If that's the case, then China has been investing wisely. Because since 1993, the number of computers in China per capita has increased by over 1,000 percent.

And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at figure, per capita, will increase over 212 percent more.....

By 1999 that figure had risen to nearly 100 percent a percentage higher than any other in the developed world.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Kingdom-based magazine, *The Economist*, China has more phone line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on earth besides the United States.....

Every day, 25,000 more Chinese become mobile phone subscribers and everyday 33,000 buy a new handset.

If a mere 8 million mobile phone users in Sweden and Denmark can provide Ericsson and Nokia a real-world laboratory to dominate this industry, what sort of opportunities will a laboratory of 43 million users provide Chinese engineers?

Again, in 1992, China exported a grand total of \$4 billion worth of high-technology products. By 1995, that figure stood at \$10 billion.

And in 2005, the last year in which I have figures, China exported \$200 billion in high-tech goods and services. Again, to say that China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should fall on deaf ears.

The engine for these exports is being driven by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citizens trained by y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tually, many trained by Western schools, each year 320,000 go to West, but only 100,000 ever return to China.)

One figure that gives me great encouragement is the percentage of your university students getting educations in both engineering and the hard sciences.

In 1998, there were more than 90,000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the sciences, about another 65,000 graduate students pursuing degrees in medicine, and more than 300,000 in graduate studies in engineering.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there were almost 360,000 students studying the sciences, more than 280,000 studying medicine, and more staggering still, more than 1.3 million studying engineering. This does not even begin to count the 320,000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overseas....

### 附錄 2：期末問卷

1. Do you think this intensive daily practice was helpful?  
No, please elaborate.  
Yes, please elaborate.
2.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pros and cons of this practice regime?
3. Would you recommend that the teacher continue to have students go through this practice?  
No, please elaborate.  
Yes, please elaborate.
4. What is the number one thing about the practice that needs to be improved?
5. What is the number one thing about the practice that you love?
6. In the process of the practice, were you ever overwhelmed and wanting to quit?
7. If yes, what have kept you going?
8. Was the encouragement the teacher provided helpful?
9. Is providing the text right after the practice helpful?
10. Any other suggestions?

### 附錄 3：練習材料範例

#### 同步口譯材料

擷取自：The United States: Capitalist model to the world *George Marotta*.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New York: Oct 1, 2002. Vol. 68, Iss. 24; pg. 781, 4 pgs

In March 2000, the U.S. stock market reached an incredible value of \$16 trillion dollars.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touched 11,700; the NASDAQ over-the-counter market vaulted to 5,050, and the S&P 500 Index reached 1,530. Never before had such massive wealth been created in only one short decade. Now, of course, we know that we were in a very large "bubble." Today, the value of all publicly traded stocks is "only" \$10 trillion. The Dow is below 8,603, the NASDAQ has shrunk to 1,324, and the S&P 500 Index is at 909.

At the close of World War II, the U.S. possessed two-- thirds of the world's productive capacity and also two-- thirds of the world's equity. Fifty-seven years ago, the United States found itself the strong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 a position previously held by Great Britain. In contrast, the Depression years of the 1930s were a disaster for our country. The economy was in shambles and unemployment hovered around 25 percent. In other words, one in four workers had no job. Then, preparations for war quickly eliminated that unemployment.....

#### 逐步口譯材料

擷取自 Economic future in the West: Continued economic boom in China or a bust about to happen?

*John F Copper*.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New York: Oct 1, 2002. Vol. 68, Iss. 24; pg. 777, 5 pgs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steel (in 1998; in 1978 it was fifth) and retains that status. It became the largest producer of coal (in 1989), cement (in 1985) and fertilizer (in 1978) and holds the number one rank in all of these today. It became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televisions in 1999; in 2001 it accounted for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output. It produces 40 percent of the air-conditioners in the world, 45 percent of the motorcycles and 40 percent of the DVD players. In all of

these it is growing.

It is expanding much faster in the production of cellular telephones (and uses more than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 “Deny Self for Self’s Sake”?

### Identity, Authorship, Print Culture, and Benjamin Franklin

游錫熙/ Joseph Hsi-hsi Yu

淡江大學英文學系 助理教授

Department of English, Tamkang University

#### 【摘要】

本文以晚近的研究重新評估富蘭克林，重新想像新的共和國誕生時，他建構身分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他面對十八世紀跨大西洋地區新時代出現時的回應。本文不以國家主義的方式去想像富蘭克林，而將他視為轉型中的人物，出生在一個變化中、涉及跨大西洋事物的新英格蘭。本文也將討論印刷文化在富蘭克林身上所造成的獨特身分。

【關鍵詞】 富蘭克林、認同、作者身分、印刷文化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reassess Franklin in light of recent scholarship. It proposes to re-historicize Franklin, to re-imagine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Franklin faced when he was fashioning or negotiating his identity in response to his disillusionment toward an imperial power (England) and the founding of a new republic (the U.S.) as well as in response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era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transatlantic regions. This article will not conceive of Franklin in nationalistic terms, but rather treat him as a transitional figure situated in a changing New England which was involved in transatlantic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will also discuss the unique situations that Franklin, as author and printer, faced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era. The emergence of print culture fostered Franklin’s career as a businessman and man of letters but also created a peculiar identity out of him.

【Keywords】 Benjamin Franklin, identity, authorship, print culture

## I. Introduction

“There has been a surprising surge of books about Benjamin Franklin recently,” one scholar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observes, “all attempting to tell the story of his remarkable life.”<sup>1</sup> Among the books that attempt to tell Franklin’s fascinating story are nothing less than six biographies: Edmund S. Morgan, *Benjamin Franklin* (2003); Walter J. Isaacson, *Benjamin Franklin: An American Life* (2004); Gordon S. Woo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Benjamin Franklin* (2004); Philip Dray, *Stealing God’s Thunder: Benjamin Franklin’s Lightning Rod and the Invention of America* (2005); Joyce E. Chaplin, *The First Scientific American: Benjamin Franklin and the Pursuit of Genius* (2006); and J. A. Leo Lemay, *The Life of Benjamin Franklin* (2006- ; two volumes published so far). On top of these biographies, there is also a wide array of critical studies—among them, David Waldstreicher, *Runaway America: Benjamin Franklin, Slaver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004); Lester C. Olsen, *Benjamin Franklin’s Vision of American Community: A Study in Rhetorical Iconology* (2004); Seymour Stanton Block, *Benjamin Franklin: Genius of Kites, Flights and Voting Rights* (2004); and Jerry Weinberger, *Benjamin Franklin Unmasked: On the Unity of His Mor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Thought* (2005). Coming out on the eve of his tercentennial birth (2006), these books and biographies attest to scholars and critics’ unflagging interest in Benjamin Franklin—a quintessential exemplar of the American success story, a versatile statesman and diplomat, an internationally-renowned scientist, and the author of America’s most widely-read autobiography, the immensely popular *Poor Richard’s Almanack*, and many other writings, as well as a man of vast controversies and contradictions. Most important of all, critics display an unabated interest in Franklin because his life is central to America’s idea of itself.

The tercentennial birth also marks a fitting point to re-examine and re-appraise Benjamin Franklin. Since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image of Benjamin Franklin has undergone innumerable changes in the American minds.<sup>2</sup> With the

---

<sup>1</sup> Joseph J. Ellis’s review of Gordon S. Wood’s *The Americanization of Benjamin Franklin*. Quoted from the back jacket of the book.

<sup>2</sup> For a summary account of the fluctuations of Franklin’s reputations, see Melvin H. Buxbaum, “Introduction,” *Critical Essays on Benjamin Franklin*, or Gordon S. Wood, “Introductio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Benjamin Franklin*.

publication of numerous new materials in recent years, his image will again come under close scrutiny.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especially, has unearthed an untold wealth of information about Franklin heretofore unknown to scholars. It is a huge, on-going project by the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e entire edition of which is estimated to reach 47 volumes. As of today, 39 volumes were published. Its completion is destined to help make great strides in Franklin scholarship.

Franklin, however, as numerous critics have pointed out, is a man of many masks,<sup>3</sup> and many scholars have undertaken to do more or less the same thing: unmasking Franklin. This is what one recent book aims to do. In *Benjamin Franklin Unmasked: On the Unity of His Mor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Thought*, Jerry Weinberger, as the title of his book suggests, proposes to unmask Franklin by exploring the “Unity of His Mor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Thought.” The title of the book’s conclusion “Will the Real Ben Franklin Please Stand Up?” reflects Weinberger’s as well as many scholars’ preoccupation: identifying the “real” Benjamin Franklin. Nevertheless, the result of Weinberger’s unmasking is a little disappointing. His conclusion is that “Franklin did wear masks and practiced an amazingly elusive art of writing” (Weinberger xiv), which does not contribute much toward Franklin criticism, but it goes to show that the true self is forever a slippery, or an elusive thing, always hidden from plain view, especially in Franklin’s case.

My article is not another attempt at discovering the “real” Benjamin Franklin. Drawing on recent scholarship and the pub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it proposes to re-historicize Franklin, to re-imagine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Franklin must have faced when he was fashioning or negotiating his identity in response to his disillusionment toward an imperial power (England) and the founding of a new republic (the U.S.) as well as in response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era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transatlantic regions. Critics tend to treat Franklin’s New England as either part of the British Empire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or part of the later United States. New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owever, was much more than that. As one critic in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observed on a different

---

<sup>3</sup> Edmund Morgan, for example, warns us that “Franklin was never the simple man he *enjoyed appearing to be*” (“Foreword” 7; my emphasis). Poor Richard also advises: “Let all Men know thee, but no man know thee thoroughly: Men freely ford that see the shallows” (Lemay, *Writings* 1229).

occasion, “New England was inextricably involved in the Atlantic transformation from an economy based on local production to one based on transoceanic mercantile capitalism and credit that fundamentally transformed conceptions of language, money, and self.”<sup>4</sup> My study of Benjamin Franklin will be based on this new conception: Franklin as a transitional figure situated in a changing New England which is involved in transoceanic enterprises. When examined from this perspective, Benjamin Franklin will take on a new significance. He will not just be America’s Ben, the shrewd and practical Founding Father whose face is etched on the \$100 bill; he is also a Renaissance man, capitalizing on his unique role as printer and author to promote the love of liberty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which was deeply implicated in transatlantic economy and politics.

## II. The Quintessential American?

Of the aforementioned six biographies, it can readily be perceived that Philip Dray’s *Stealing God’s Thunder* and Joyce E. Chaplin’s *The First Scientific American* approach Franklin as a scientist. Lemay’s is a colossal undertaking. This new biography of Franklin, when completed, will be an ambitious multi-volume project, the first two volumes of which, both published in 2006, covers Franklin’s career as a journalist (1706-1730) and as a printer and publisher (1730-1747). A comprehensive and very nearly exhaustive biography, it should be an indispensable work for later Franklin scholars and critics. Of the other biographies, Wood’s work is especially intriguing because it takes an unusual approach. “It was not the Franklin I knew—the American patriot,” Wood recalled his shocked recognition when he first began reading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in the 1970s. Alerting readers in his Preface with the caveat that “Franklin was not even destined to be an American,” Wood proceeds to tell the story of Franklin’s Americanization (Wood x). Wood’s biography, then, can be read as a thematic story about Franklin’s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journey from a staunch imperialist to a revolutionary, to one of the

---

<sup>4</sup> Ralph Bauer, “The Literature of ‘British America,’”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1.4 (Winter 2009): 823.

This is Bauer’s book review of Michelle Burnham’s *Folded Selves* (2007), a study of colonial New England writing.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sense, Wood, as one book reviewer has put it, “has written more of a biographical essay than a full-fledged life of Franklin.”<sup>5</sup>

In contrast to Weinberger’s *Benjamin Franklin Unmasked*, Wood’s book does shed significant new light on Franklin. His book reflects an important issue in Franklin criticism: the changing image of Franklin. For the sake of convenience, Wood’s book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uneven) parts: Franklin’s anxiety to become a gentleman, which makes up Chapter One, and the long and slow process of his Americanization, which comprises the remainder of the book. In “Becoming a Gentleman,” Wood distinguishes colonial American people into two types: “Many peopl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speaking world,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topmost ranks, still tended to divide the society into only two parts, a tiny elite of gentlemen on the top dominating the bulk of commoners on the bottom” (35). In Franklin’s words, this was a society of “the BETTER SORT of People” set against that of “the meaner Sort.” “This separation between gentlemen and commoners,” Wood proceeds to inform us, “which John Adams called ‘the most ancient and universal of all Divisions of People,’ overwhelmed all other divisions in colonial culture, even that between free and enslaved that we today find so horribly conspicuous” (35). Several instances in Wood’s biography, as well as 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demonstrate that Franklin felt anguished about being treated as a commoner in his early career. When he was considering marital prospects, for example, Franklin discovered that “the Business of a Printer being generally thought a poor one, I was not to expect Money with a Wife unless with such a one, as I should not otherwise think agreeable” (Franklin, *Autobiography* 128). Small wonder that people of “the Middling Sorts” like Franklin would find it imperative to become a gentleman. He finally achieved that status in 1748, at the age of forty-two, when he believed that he had acquired sufficient wealth and gentility, and he decided to retire from active business. To celebrate that memorable occasion, therefore, Franklin commissioned a portrait to announce the arrival of a new gentleman. Wood noted that there was none of the “famous Franklin simplicity of dress found in his later

---

<sup>5</sup> Unsigned review of *The Americanization of Benjamin Franklin*. Accessed 20 Sept. 2010  
<[http://brothersjudd.com/index.cfm/fuseaction/reviews.detail/book\\_id/1381/Americanizat.htm](http://brothersjudd.com/index.cfm/fuseaction/reviews.detail/book_id/1381/Americanizat.htm)>.

portraits”: “Although his dress is not as elegant as that of many colonial aristocrats, Franklin nevertheless stands in an aristocratic pose, stiff and mannered and wearing a dark green velvet coat and tightly curled brown wig, with his right arm extended to reveal the frilled ruffle of his silk sleeve” (57-58). In contrast to the image of “the Poor Richard moralist” or “the symbol of rustic democracy, and the simple backwoods philosopher” at the French court, Franklin in this portrait flaunts his upward mobility: becoming a gentleman. The class barrier, firmly entrenched in colonial culture, was difficult to break through, and Franklin felt entitled to commemorate the occasion of being a “full-fledged gentleman” in a conspicuous, ceremonious manner.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biography, Wood details the process of Franklin’s Americanization. Earlier in his life, Franklin had always been a fervent British imperialist. In 1751, he published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Peopling of Countries, Etc.,” in which he estimated that the population of America must at least be doubled every 25 years. At this rate, the population of North America “will in another Century be more than the People of *England*.” As Wood elucidates, this vision of the people in North America eventually outnumbering those in Britain was not anticipating the separation of the colonies from Great Britain. Instead, the growth of British subjects in America would only make the British Empire more powerful. As a “true-blue Englishman,” Franklin prided himself on being part of this great empire (Wood 71).

In 1757 Franklin was elected emissary of the Pennsylvania assembly—later he would also represent Georgia, New Jersey, and Massachusetts—and went to England to argue the assembly’s case of taxing proprietary estates with the Privy Council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 mission did not go smoothly, and Franklin’s stay in England turned out to be unexpectedly long: from June 1757 to August 1762, and again from November 1762 to March 1775. During this time, Franklin relished his stay in England, visiting ancestral homes and relatives, accepting dinner invitations on a daily basis, and establishing warm friendships with the English and Scottish intellectual circles. An internationally acclaimed scientist at that time, he was respected and welcomed everywhere he went. In fact, he enjoyed his stay in London to the extent that he entertained the thought of becoming “a Londoner for the rest of my Days.”

Two events, among others, transformed Franklin’s life: the Stamp Act and Franklin’s indictment before the Privy Council. Whe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needed more revenue to maintain the army in the colonies, the Parliament enacted the Stamp Act in 1765. Although Franklin objected to the imposition of a new tax, he was willing to make compromises and did not forese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olonists’ vehement reaction to it. In this, he was obviously out of touch with American opinion.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Act, he even named an ally and friend John Hughes as stamp distributor. The consequence was disastrous. It led to wild speculation that Franklin was the original proponent of the Act, and, with mob violence raging in the colonies, the mobs in Pennsylvania threatened to level his Philadelphia house. Some people even warned that “Franklin might be hanged in effigy” (Wood 112). His loyalty to the colonies openly disputed, Franklin was considered more English than “American.” It might be at this point that Franklin began to seriously question his own judgment and identity. And then, the affair of the Hutchinson letters finally led Franklin inexorably to his Americanization.

Thomas Hutchinson, lieutenant governor of Massachusetts in the 1760s, had written some letters to a British under-secretary, urging that stern measures, including “an abridgment of what are called English liberties,” be taken in America to maintain colonies’ dependency on Great Britain. Franklin managed to have the originals copied and sent the duplicates to the colonies. Unfortunately, these copied letters were indiscreetly publicized in the colonies, creating a public uproar in England and devastating Franklin’s reputation in British politics. In January 1774, Franklin was summoned before the Privy Council for a full-scale indictment, in which Solicitor General Alexander Wedderburn viciously abused him in front of a raucous crowd. After the indictment, Franklin approached Wedderburn and whispered in his ears: “I will make your master a LITTLE KING for this” (qtd. in Wood 147). A year later, he left England and was chosen, one day after his arrival in Philadelphia, delegate to the 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 From thence forward,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founding of a new republic, and a staunch imperialist turned into a fervent patriot.

Gordon Wood well documented Franklin’s life, grounding his analysis of Franklin’s decisions at critical moments upon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and adroitly handled historical archives. He traces Franklin’s progress from aspiring tradesman

to self-made gentleman to quintessential American. More importantly, he gives us a different story about the man who has become an American symbol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one book reviewer puts it, “In this brilliantly iconoclastic and utterly convincing reappraisal, Gordon Wood has shattered forever the comforting stereotype of Benjamin Franklin as the plainspoken, homespun American patriot, the cracker-barrel philosopher who dispensed dry quips and always exemplified middle-class values and democratic virtues.”<sup>6</sup> With the “crushing heap of retrospective myths,” Franklin is too readily assumed to be an undisputable patriot. It is precisely these “myths” that Wood sets out to dismantle: “We have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of images imposed on Franklin that have to be peeled away before we can recover the man who existed before the Revolution” (Wood 12). Wood “recovers” the pre-Revolutionary Franklin brilliantly.

Wood is also successful in deconstructing the image that Franklin is the exemplary figure who embraced “middle-class values and democratic virtues.” It is of course Franklin himself who constructed such an image in writings such as the *Autobiography*, *Poor Richard’s Almanack*, and the lik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Autobiography*, Franklin sets the tone of celebrating his rise from humble origins: “Having emerg’d from the Poverty and Obscurity in which I was born and bred, to a State of Affluence and some Degree of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 .” (Franklin 43). After he attained certain prominence in Philadelphia society, Franklin organized a group of artisans—calling themselves “the Junto”—who met weekly for learned conversation. Aiming at self-improvement, these middle-class businessmen also believed they could do good for and reform the society. In the *Almanack*, Franklin deliberately chooses a rural, folksy eccentric—Poor Richard—as his persona. Poor Richard peddles aphorisms that often display his aversion for kings or aristocrats: “Kings & Bears often worry their keepers,” “An innocent *Plowman* is more worthy than a vicious *Prince*,” “The King’s cheese is half wasted in parings: But no matter, ’tis made of the peoples [sic] milk” (Lemay, *Writings* 1186, 1193, 1197). Underneath these middle-class values, however, lies his 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becoming a gentleman and his relish for a patrician life—as a celebrity—during his lengthy stays in England and France. Being snubbed at his first marriage proposal

---

<sup>6</sup> Ron Chernow’s review of Wood’s book. Quoted from the back jacket of the book.

painfully reminded him of his lowly beginnings. Therefore, he conspicuously announced his retirement *as* a gentleman and ceremoniously celebrated the occasion. He enjoyed his English life so much so that he considered spending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there. In short, he was “too English” at that time. Likewise, when he served as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to the court of France in 1776, he immediately loved France, which, to him, was “the civilest Nation upon Earth.” He wrote in a letter: “I am here among a People that love and respect me, a most amiable Nation to live with, and perhaps I may conclude to die among them; for my Friends in America are dying off one after another, and I have been so long abroad that I should now be almost a Stranger in my own country” (qtd. in Wood 209). At that time, he was probably “too French.” Although often dubbed a village philosopher or leather-apron philosopher, Franklin often led a life that was quite contrary to his American middle-class beliefs or his Poor Richard philosophy of economy. In the *Autobiography*, various essays, and letters, Franklin expressed, time after time, his distrust of “mobs,” referring to them as “the unthinking undiscerning Multitude.” On top of that, Franklin was exceedingly critical of human nature. These, as one critic points out, reveal Franklin’s “undemocratic distrust of ordinary humanity and of the majority” (Silverman 246).

### **III. Lawrence, Weber, and Franklin**

The inconsistencies in his personality and identity lead to not a few heated debates about and indeed attacks on Franklin, although the debates and attacks, for the most par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his Americanness but with his middle-class values. Among his disparagers are a host of imaginative writers and creative artists, who flatly refuse to accept his Poor Richardisms. To them, Franklin embodies all those superficial bourgeois moneymaking values. Mark Twain, for instance, accused Franklin of having “early prostituted his talents to the invention of maxims and aphorisms calculated to inflict suffering upon 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all subsequent ages” (qtd. in Wood 4). It is of course D. H. Lawrence who launched the severest attack on Franklin: “Oh, Franklin was the first downright American. He knew what he was about, the sharp little man. He set up the first dummy American” (15). Lawrence taunted Franklin’s notion of the perfectibility of man and his list of virtues:

“This is Benjamin’s barbed wire fence. He made himself a list of virtues, which he trotted inside like a grey nag in a paddock” (17). Perhaps the differences can easily be resolved because Franklin and Lawrence have, as critic Ormond Seavey argues, “conflicting modes of consciousness” (Seavey 60). Looking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however, Franklin was born in an age when earning a decent livelihood was no easy task for a lot of families, and fine arts were certainly not much appreciated at that time. Besides, Franklin, as Herman Melville said, was everything but a poet. He wrote graceful prose in the Puritans’ plain style; he was, therefore, adept at essays and pamphlets, the genres flourishing in the age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making an enormous impact in promo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He even tried his hands at mock elegies, doggerels, and bagatelles, but he was no genuine poet. A butterfly could not inspire his poetic touch. In his 1758 “Preface” to *Poor Richard’s Almanack* (more commonly known as “The Way to Wealth”), he versified his idea of a butterfly:

*What is a Butterfly? At best*

*He’s but a Caterpillar drest.*

*The gaudy Fop’s his Picture just.* (Lemay, *Writings* 1300)

Nathaniel Hawthorne, on the other hand, viewed a butterfly very differently. In his “Preface” to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1851), Hawthorne commented on how an imaginative writer like him would dole out his moral purpose in a story or romance: “The author has considered it hardly worth his while, therefore, relentlessly to impale the story with its moral, as with an iron rod,—or, rather as by sticking a pin through a butterfly,—thus at once depriving it of life, and causing it to stiffen in an ungainly and unnatural attitude” (“Preface,” *House* 2). For Hawthorne, a butterfly is not just a caterpillar or fop dressed up; it is symbolic of an artistic work. It inspires beauty, creation, and imagination, with which to “dress up” the moral of a story so that it will not stiffen or rigidify in an ungainly or unnatural manner. Poetic temperament (or “conflicting modes of consciousness”) may have accounted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ranklin and Hawthorne, but it also takes nearly a hundred years before that poetic temperament could develop on the U.S. soil which Hawthorne considered too barren to fertilize a romance. He complained about this situation in his “Preface” to

*The Marble Faun*: “No author, without a trial, can conceive of the difficulty of writing a Romance about a country where there is no shadow, no antiquity, no mystery, no picturesque and gloomy wrong, nor anything—but a common-place prosperity, in broad and simple daylight, as is happily the case with my dear native land” (“Preface,” *Marble* 3). In Franklin’s days, even “a common-place prosperity, in broad and simple daylight” was yet to be imagined.

Another famous attack on Franklin comes from Max Weber. In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4-1905), Weber asserts that Franklin embodies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almost classical purity.” Basing his argument on “The Way to Wealth,” Weber considers Franklin’s economic view as a philosophy of avarice: “The peculiarity of this philosophy of avarice appears to be the ideal of the honest man of recognized credit, and above all the idea of a duty of the individual toward the increase of his capital, which is assumed *as an end in itself*. Truly what is here preached is not simply a means of making one’s way in the world, but a peculiar ethic” (16; my emphasis). Weber proceeds to comment on Franklin’s utilitarianism: “Now, all Franklin’s moral attitudes are coloured with utilitarianism. Honesty is useful, because it assures credit; so are punctuality, industry, frugalit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they are virtues” (17). He then concludes by relating his discussion of Franklin with the Protestant ethic: “The earning of money within the modern economic order is, so long as it is done legally, the result and the expression of virtue and proficiency in a calling” (18). In other words, to be financially successful bespeaks God’s blessing upon an individual.

Weber summarizes eigh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or more generally modern Euro-American—economic condition with great acumen. More importantly, he deftly weaves his narrative of the condition with the social and religious milieu at that time. Nonetheless, his judgment of Franklin is decidedly too one-sided, considering he bases his understanding of Franklin on his reading of “The Way to Wealth” alone. “The Way to Wealth” is a subtle and complicated text which allows for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ae in the preface create ambiguity. The almanac-maker Richard Saunders claims to have authored the preface, but prefers to let his alter-ego “Poor Richard” peddle his worldly wisdom in his stead. Poor Richard in turn “overhears” Father Abraham “hawking” his aphorisms—the new-age

secular sermon—in the marketplace. All the while, publisher Franklin remained behind the scene, secretly basking himself in delight because the almanacs were doing very well and he could gratify his vanity of being quoted and admired in anonymity. In all this displacement of identiti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locate the “author.” It is a tour de force. Perhaps Franklin does this complacently, but not without a tinge of conscious self-critique. The last paragraph especially leaves room for ambiguity: “Thus the old Gentleman ended his Harangue. The People heard it, and approved the Doctrine, and immediately practised the contrary, just as if it had been a common Sermon; for the Vendue [i.e. auction or sale] opened, and they began to buy extravagantly, notwithstanding all his Cautions, and their own Fear of Taxes” (Lemay, *Writings* 1302). This passage could of course be read as Poor Richard’s satire on the common herd: knowing what is good for them, they simply cannot act on that information. Nevertheless, it could also be argued that Poor Richard is poking fun at himself in good humor. If so, the entire incident could take on a different significance. To take Poor Richard as Franklin himself and conclude that Franklin’s—or Poor Richard’s—goal in life is money as an end in itself are incautious. Franklin retired at the age of forty-two and dedicated his remaining life to civil service. Besides, as his life in London and Paris could attest, he was certainly not one who did not know how to enjoy life. Weber’s reading of Franklin is cut-and-dried. He fail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nuances or ambiguities of literary works, and he probably does not appreciate Franklin’s humor or satire.

Notwithstanding the attacks, Lawrence identifies Franklin as a practical and rational being, product of the Enlightenment era, the iconoclastic thinking of that historic age empowered individuals, like Franklin, to dare to “conceiv[e] the bold and arduous Project of arriving at moral Perfection” (*Autobiography* 148). Weber recognizes the emergence of the economic man—with Franklin as a prime example—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lready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transatlantic economic system, especially in its trade with the home country. As a shrewd businessman, Franklin was able to seize on the opportunity and turn it to his advantage. He was not, however, a mere economic man, but a man with a vision. As a British imperialist, he was able to foresee the importance of North America in the British Empire, as was indicated in the aforementioned essay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Peopling of Countries, Etc.” Moreover, as an Enlightenment thinker, he could also envision himself, in our words today, a citizen of a global village, as the James Cook incident demonstrates. For critic Jim Egan, he was a man of “antipodean cosmopolitanism.”

#### **IV. Exchange of Goods, Rationality of Commerce**

Captain James Cook, a British explorer, navigator and cartographer, made three voyages (1768-1771, 1772-1775, and 1776-1779) to the Pacific Ocean during which he surveyed the coast of New Zealand, charted the eastern coast of Australia, and discovered the Sandwich (Hawaiian) Islands. He made one of the earliest European encounters with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Cook commanded HMS *Resolution* on his last voyage, but was murdered by natives in Hawaii. Just before his last voyage in 1776 when the Revolutionary War was at its height, Franklin, then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at the court of France, wrote a letter (“Passport for Captain Cook”) to “all Captains and Commanders of armed Ships by Commission from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w in war with Great Britain,” recommending that “in case the said Ship . . . should happen to fall into your Hands, you would not consider her as an Enemy . . . but that you would treat the said Captain Cook and his People with all Civility and Kindness, affording them, as common Friends to Mankind, all the Assistance in your Power, which they may happen to stand in need of” (Lemay, *Writings* 927). Franklin made the recommendation because he believed that Cook’s undertaking was truly laudable in itself, “as the Increase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facilitat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stant Nations, in the Exchange of useful Products and Manufactures, and the Extension of Arts, whereby the common Enjoyments of human Life are multiply’d and augmented, and science of other kinds increased to the benefit of Mankind in general” (Lemay, *Writings* 927).

For Frankl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mon Enjoyments of human Life” and “the benefit of Mankind in general” far outweighed the interest of one single nation, even though the interes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meant the survival of that nation, whose future still hung in the balance, depending for its independence on the outcomes of the war still rag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Britain. For critic Jim Egan, the incident has an even more profound significance. Franklin

not only believed that the increase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thanks to Cook's voyages, would facilitat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stant nations; he also wishe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stant nations could eventually transform the British people from imperialists to people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Exchange of useful Products and Manufactures, and the Extension of Arts," Egan contends in his "Turning Identity Upside Down: Benjamin Franklin's Antipodean Cosmopolitanism," Franklin was hoping that the British people would eventually come to view people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or people of North America?) "as part of a single, uniform human nature in that they would respond to exchange in precisely the way that emerging eighteenth-century economic theory would predict any person would respond" (212). In this way, encounters with people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would be "a way of making British subjects over into cosmopolites" (216).

Paul Giles, however, would take exception to Egan's projection of Franklin as an idealist. In "Antipode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anklin, Twain, and the Sphere of Subalternity," Giles first acknowledges Franklin's "internationalist gesture": "As fellow citizens [Franklin and Cook] of the Enlightenment they shared a belief in the open pursuit of exploration and knowledge for the universal benefit of mankind, and it was this sense of being engaged in a common intellectual project that motivated Franklin's subsequent effort to obtain a passport for Cook. . ." (25). Nevertheless, he immediately revises this gesture: "But whereas Franklin in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ended to deploy his cosmopolitan idiom with an exuberant iconoclasm to challenge entrenched dogma and prejudice, during the last 20 years of his life he became less confident about the uses of rationalism in the public sphere" (26). Giles drives home his point by comparing Franklin's 1751 article "On Transported Felons" with a similar piece, "On Sending Felons to America," in 1787. In the former piece, Franklin, while mocking the mother country's policy of transporting felons across the Atlantic, couches his rhetorical figure in terms of "colonization as a benign parental structure" (26). Giles then notes that Franklin's satire became, quoting John Updike, "more savage and Swiftian" as America got closer to war with Britain. After the war America gained its independence. Franklin remembered the days when the mother country showed "her parental Tenderness" by emptying her jails into the habitations of America "*for the BETTER Peopling . . . of the Colonies*" (Lemay, *Writings* 1142; original italics and

capitalization). Franklin thus suggested discharging America’s debt to the mother country by transporting America’s felons to Britain. This latter piece was written in the context when Franklin reflected back from a post-war situation. In it, Franklin “effectively highlights the brutal pre-war conditions of dom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 center and periphery, which, as he now acknowledges, always structured this imperial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 (27). This article is, therefore, based around “a recognition of colonization as power” (26). By then, Franklin had realized that British ships’ voyages to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were not meant for scientific undertakings only. Facing the grim possibility that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might be los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lready entertained, even before Cook’s last voyage, the notion of using Australia or New Zealand as substitute dumping grounds for felons. In the latter article, therefore, Franklin came to “a more somber understanding of colonization as both a consolidation of hierarchical authority and an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ubalternity” (28).

In his essay Giles compellingly modifies Egan’s idealistic gesture of Franklin. That, however,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Egan is wrong. J. L. Leo Lemay once observed: “Though pessimistic and cynical about human nature, he was also idealistic” (Lemay, *Life*, II, 200). Franklin has many different sides. Although he is not someone who would embrace the notion of “a single, uniform human nature” (Egan 212), he does display his idealism in many of his writings. Whatever their differences, however, both Egan and Giles ground their analyses in transnational contexts. Giles specifically stresses this point: “The larger point is that the global range of Franklin’s cultural agendas can only be understood in something other than merely nationalistic terms” (33). Gordon Wood does an excellent job in excavating the little-known Franklin, but he still conceives of him in nationalistic terms. Weber can envision Franklin as a pioneer in an eighteen-century transatlantic economy, but for him Franklin is nothing more than an economic man. With literary critics like Egan and Giles, future Franklin scholars should be ready to sail into transoceanic territories.

Both Egan and Giles often discuss Franklin in terms of exchange, as Myra Jehlen before them has also done. Jehlen sees Franklin as a figure during a period of “ideological transition.” Comparing the works of Franklin and Rousseau, Jehlen

contends that the “*Autobiography* and the *Confessions* recount the birth of modern selfhood, recapitulating in their phylogeny the ontogeny that transformed feudal continuitie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to free-market dialectics” (504). The paramount thing for an individual is to formulate rules to navigate oneself in the free-market system. For Franklin, virtues like truth, sincerity, and integrity are “not rules of conduct but rules of the game,” and the large purpose of these rules is “the formulation of a moral ideology that can both regulate and enable the exercise of modern power, both that of the individual and of the productive market” (510). All virtues—especially Christian values—are, in this sense, socially instrumental or utilitarian. Franklin constantly rephrases common expressions in term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alking about the ends of conversations, for example, Franklin states: “And as the chief Ends of Conversation are to *inform*, or to be *informed*, to *please* or to *persuade*, I wish wellmeaning [sic] sensible Men would not lessen their Power of doing Good by a Positive assuming Manner that seldom fails to disgust, tends to create Opposition, and to defeat every one of those Purposes for which Speech was given, to wit, giving or receiving Information, or Pleasure” (Franklin 65; original italics). What Franklin is doing here, according to Jehlen, is a re-interpretation or redefinition: “All the definitions here and all the considerations are matters of exchange. Humility has developed from a posture before God to a stance that permits a man to trade goods with other men: that way, in giving one access to what others have produced, Humility becomes no longer the opposite but the complement of a Vanity that quickens one’s own production” (Jehlen 509; original capitalization). Franklin redefines “Humility” and “Vanity” in terms of economic production or the trade of goods. For Jehlen, Franklin’s concept of virtue “is a political matter,” and the *Autobiography* “is unabashedly a work of ideological persuasion” (514).

Jehlen’s assessment of Franklin sounds surprisingly like that of Weber, defining Franklin basically in economic terms. In contrast, Giles and Egan employ the idea of exchange in its various significations. Giles notes Franklin’s universalist circumference where New Zealand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in a common universe of trade and communication, for “a mutual exchange of benefits” (Lemay, *Writings* 672), but he proceeds to remind us that by 1787 Franklin “understands antipodean exchange more in relation to power” (Giles 28). Egan also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for Franklin of “the power of products circulating in networks of exchange” (Egan 214). He maintains that “Franklin casts the New Zealanders as part of a single, uniform human nature in that they would respond to exchange in precisely the way that emerging eighteenth-century economic theory would predict any person would respond” (212). Moreover, Egan combines his discussion of the idea of exchange with that of circulation: “Franklin . . . uses the figure of circulation to justify his scheme for exchange with New Zealand. . . . The introduction of circulation as a culturally defining figure, as how a culture conceives of itself, represents a positive good in and of itself for Franklin” (214-15). Egan adds interesting dimensions to Franklin’s idea of exchange. However, to delimit the idea of exchange to its application in commerce only is too narrow.

### **V. Exchange of Ideas, Rationality of Printing and Writing**

Franklin was, first and foremost, a printer and an author. Apprenticed to his brother James at the age of twelve, Franklin was closely involved with the printing industry most of his life. Submitting his Silence Dogood essays secretly to the *New England Courant*—his brother’s newspaper and one of the earliest in Boston—at the age of sixteen, Franklin exerted his public influence through his writing all his life, since he was not much of an orator, which seemed to symbolize the transition of the old oral culture into the new print culture. Franklin’s life was interwoven with the history of writi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hether in authoring it or in publishing it. He observed in the *Autobiography*: “Prose Writing has been of great Use to me in the Course of my Life, and was a principal Means of my Advancement” (Franklin 60).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forum,<sup>7</sup> writing and printing assum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disseminating ideas and knowledge. Franklin, as author and printer, advanced and facilitated the dissemination. For him, therefore, printing serves as a means to economic exchange as well as a means to cultural exchange. The idea of exchange, in Franklin’s case, leads to the exchange of ideas.

---

<sup>7</sup> For an account of this point, see Lewis P. Simpson, “The Printer as American Man of Letters”; or Michael Warner, *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 Publ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especially Chapter 1.

In his “Benjam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and Republican Print Rationality,” Grantland S. Rice suggests that in the *Autobiography* we can detect a certain alignment of “the activity of public writing with eighteenth-century theories of commerce” (48). Although Rice does not specify what type of alignment that is, it seems evident that both—public writing and commerce—are associated with the idea of exchange: exchange of ideas and exchange of goods respectively. In their discussions on these two kinds of exchanges, critics often suggest that Franklin believed in the existence of something transcendent in these exchanges which would eventually transform the public sphere 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one of the aforementioned quotations, for instance, Jim Egan suggests Franklin was hoping that,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of distant nations or exchange of useful products and manufactures, the British people would eventually come to view people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s part of a single, uniform human nature in that they would respond to exchange in precisely the way that emerging eighteenth-century economic theory would predict any person would respond” (Egan 212). There seems to be a “magical power of exchange” here (Egan 212). Or, to take another instance, in his *Life of Benjamin Franklin*, J. A. Leo Lemay thus concludes his discussion of *Poor Richard’s Almanack*: “The shrewd businessman-printer and man of letters, Benjamin Franklin, transformed himself into the naïve, simple, henpecked, humble lover of astrology and of learning, Poor Richard. The Third Realm was moving from the world of Milton, Swift, Bayle, Voltaire, and Hume to the poor farmer, in great part because of the ‘*democratic literacy inherent in the technology of print*’” (*Life*, II 191; my emphasis). The technology of print, through its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will contribute to democratic literacy. In other words, democratic literacy is attainable through what Grantland Rice calls “the rational virtues of an objectifying commercial print culture” in his essay (45). The idealistic Franklin, the Enlightenment man, believed in the impalpable existence of “the rational virtues” not only of the commercial print culture but, it can be inferred, of commerce as well because of their capacity of objectification. It was Franklin’s conviction that the exchange and circulation of ideas and goods would eventually increase the benefit of humankind in general because of their “rational virtues.” This is the idealistic Franklin speaking, not the one who feels “undemocratic distrust of ordinary humanity and of the majority.”

How does Franklin, as printer and author, achieve “rational virtues,” and at what price?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career as a printer, Franklin stated in “Apology for Printers” (1731): “Printers are educated in the Belief, that when Men differ in Opinion, both Sides ought equally to have the Advantage of being heard by the Publick; and that when Truth and Error have fair Play, the former is always an overmatch for the latter” (Lemay, *Writings* 172). Like his contemporaries in the Age of Reason, Franklin believed that truth would always prevail over error. He then proceeded: “Being thus continually employ’d in serving all Parties, Printers naturally acquire a vast Unconcernedness as to the right or wrong Opinions contain’d in what they print; regarding it only as the Matter of their daily labour; They print things full of Spleen and Animosity, with the utmost Calmness and Indifference, and without the least Ill-will to the Persons reflected on” (Lemay, *Writings* 172). Written by a 25-year-old who received only two years of formal education and published 280 years ago, “Apology” displays Franklin’s precocious wisdom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ethics of newspaper publishing. His belief in truth and his tenets of “fair Play” and “Unconcernedness” or “Indifference” do not have to give much ground even today.

Franklin the author had a different concern. In the *Autobiography*, he told us that he came by a copy of John Bunyan’s *Pilgrim’s Progress* in Dutch on his first voyage to London. Franklin was impressed with Bunyan’s manner of writing: “Honest John was the first that I know of who mix’d Narration and Dialogue, a Method of Writing very engaging to the Reader, who in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finds himself as it were brought into the Company, and present at the Discourse” (Franklin 72). Franklin imitated this “Method” in his *Autobiography* partly because it adds a personal touch to the writing. In his other writings, however, he adopted a different approach. Michael Warner argues that Franklin often hides behind a screen. In *Poor Richard Almanack*, for instance, Poor Richard is “the pseudonymous screen for B. Franklin, Printer” (78). In Chapter 3 of his book (“Franklin: The 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 of the Man of Letters”), he discusses Franklin’s strategy in the preface to the 1736 almanac. In his previous prefaces, Poor Richard has been predicting, up to the exact hour and minute, the death of Titan Leeds, another competing almanac-maker. When Leeds in turn accuses Poor

Richard of being a fictitious character, Poor Richard defends his existence: “But as long as I know my self [sic] to walk about, eat, drink and sleep, I am satisfied that *there is really such a Man as I am . . .* for if there were no such Man as I am, how is it possible I should appear publicly to hundreds of People, as I have done for several years past in print?” (Lemay, *Writings* 1199; original italics). On top of that, Poor Richard goes out of the way to disarm people’s suspicion that he is Benjamin Franklin the printer: “I need not, indeed, have taken any Notice of so idle a Report, if it had not been for the sake of my Printer, to whom my Enemies are pleased to ascribe my Productions; and who it seems is as unwilling to father my Offspring, as I am to lose the Credit of it” ((Lemay, *Writings* 1199). Warner argues that Franklin is playing a game here; his strategy is to let his writing “stray onto the page unaffiliated: “The game Franklin typically plays with his personae often take this form: a fantasmatic [sic] self-splitting or self-objectification that results in a concealed or absent agent behind a manipulated surface” (78). According to Warner, Franklin achieves “a fantasy of being-in-print” (74). Franklin was unwilling to father the offspring; instead, he allowed Poor Richard to take the credit. The advantage of this strategy is that he could enjoy anonymity while reaping the benefits. In the process Franklin the author recedes into a baffling array of endless images because he used hundreds of personae. Self-objectification is attained at a price.

Poor Richard advises in the 1735 preface: “Deny Self for Self’s sake” (Lemay, *Writings* 1198). Denying oneself here probably means abstaining from enjoying desired things, but it could easily be read figuratively to refer to Franklin’s strategy in writing to achieve self-objectification or to his codes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He famously talked about his “Habit of expressing my self in Terms of modest Diffidence” in the *Autobiography*: “never using when I advance any thing that may possibly be disputed, the Words, *Certainly, undoubtedly*, or any others that give the Air of Positiveness to an Opinion; but rather say, I conceive, or I apprehend a Thing to be so or so, It appears to me, or I should think it so or so for such and such Reasons, or I imagine it to be so, or it is so if I am not mistaken” (Franklin 65). These gestures of self-negation, as Michael Warner maintains, “foreground the self only to eliminate it from discourse. . . . It is as though the personal is, for literal intellection and rational society, a necessary postulation, nothing more” (Warner 81). Grantland Rice argues that “Warner’s account elides Franklin’s anxieties about the objectifying



tendencies of print culture as well as his fear of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 print sphere evacuated of authors” (48). Franklin’s denial of self works so successfully that his self strays onto the pages and is hardly traceable. His pursuit for “rational values” leads to dispersal of the self into the text.

Franklin was a publisher and an author, and it was often difficult for him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Franklin the publisher of newspapers maintains a policy of “Unconcernedness” or “Indifference.” Franklin the publisher of almanacs, however, hides behind Poor Richard and sells his worldly wisdom with “quiet aggressivity.”<sup>8</sup> As an author, he uses personae such as Mrs. Silence Dogood and Miss Polly Baker to achieve objectification, but Mrs. Silence Dogood and Miss Polly Baker exude strong and fascinating personality. As hard as he tries to hide himself, some personality of Franklin’s or his personae’s still captivates our attention. His personality resembles his pride: “In reality there is perhaps no one of our natural Passions so hard to subdue as *Pride*. Disguise it, struggle with it, beat it down, stifle it, mortify it as much as one pleases, it is still alive, and will every now and then peep out and show itself” (Franklin 160; original italic). When his personality peeps out, the objectification that he strives to achieve evaporates. The rationality of print culture creates a peculiar identity out of Franklin, effecting a split between the publisher and the author.

## **VI. Conclusion**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ilence Dogood essays, Mrs. Silence Dogood—sixteen-year-old Franklin’s first persona—relates the story of how she came into the world: “At the time of my Birth, my Parents were on Ship-board in their Way from *London to N. England*” (Lemay *Writings* 5; original italics). Silence Dogood’s “Entrance into this troublesome World,” as well as Franklin’s, is symbolic: a journey from the old world to the new. Benjamin Franklin was born into what Felicity Nussbaum calls the “global eighteenth century,”<sup>9</sup> and it was an age in which many epoch-making social and historical events occurred: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

<sup>8</sup> Kenneth Silverman’s words in describing how Franklin addresses readers in the *Autobiography* (Silverman 232).

<sup>9</sup> See Felicity A. Nussbaum, ed. *The Global Eigh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03).

arrival of capitalism and modern economy, the emergence of print culture and growing universal literacy, the arising of the metropolis, the appearance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forum,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ower, transoceanic commerce, voyages and explorations, and so on. In an era of “ideological transition,” Franklin strove to fashion a new identity for himself and his nation. Before he eventually emerged to be what Perry Miller calls a massively symbolic figure of the nation, he underwen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n aspiring artisan to a gentleman of wealth and leisure to an internationally acclaimed scientist and intellectual, from a mere almanac publisher to “a tolerable English Writer” (Franklin 62), whose *Autobiography* has become a must-read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Franklin is a transitional figure in an age of radical and sweeping changes. Although widely believed to have invented the American identity, he himself had his own share of identity crisis: being an Englishman or American and his “fantasy of being-in-print.” To do him justice, all inconsistencies or contradictions in his personality or identity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one of his last comments on politics in 1789, he wrote: “God grant, that not only the love of liberty, but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rights of man, may pervade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so that a philosopher may set his foot anywhere on its surface, and say, ‘This is my country’” (qtd. in Nye xvii-xviii). This highly idealistic Franklin should be placed alongside Weber’s man of avarice whose aim in life is “the increase of his capital, which is assumed *as an end in itself*.” Critic William Shurr once observed: “The actual Franklin needs to be decanonized” (Shurr 447).<sup>10</sup> The occasion of his tercentennial birth marks a good point to decanonize him. In addition, it is time to stop conceiving of Franklin in purely nationalistic terms. Situating him in a transatlantic or transoceanic trajectory would allow us to achie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verse roles Franklin played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The unique situations of

---

<sup>10</sup> See Shurr, “‘Now, Gods, Stand Up for Bastards’: Reinterpreting Benjam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In this essay, Shurr argues that Part 1 of the *Autobiography* should stand as a separate work of literature. He boldly challenges traditional readings of Part 1: “Thus the *Autobiography Part 1* may be an accidental classic, the attempt of an aging father, seriously embattled by enemies and engaged in dangerous sedition, to insure the concern of his successful and politically powerful son” (446). One need not agree with him completely, but some of his points in the essay are worth investigating.

**“Deny Self for Self’s Sake”?**  
**Identity, Authorship, Print Culture, and Benjamin Franklin**

---

New England in that era enabled Franklin to envision himself as a world citizen, not just a British subject or an American national.

---

本論文於 2011 年 5 月 3 日到稿，2011 年 6 月 14 日通過審查。

### Works Cited

- Bauer, Ralph. "The Literature of 'British America.'" Book review.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1.4 (Winter 2009): 818-35.
- Buxbaum, Melvin H., ed. *Critical Essays on Benjamin Franklin*. Boston: G. K. Hall, 1987.
- Egan, Jim. "Turning Identity Upside Down: Benjamin Franklin's Antipodean Consciousness." *Messy Beginnings: Postcoloniality and Early American Studies*. Ed. Malini Johar and Edward Watt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2003. 203-22.
- Franklin, Benjamin.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2<sup>nd</sup> ed. Ed. Leonard W. Labaree, et al.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P, 2003.
- Giles, Paul. "Antipode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anklin, Twain, and the Sphere of Subalternity."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0.1-2 (Spring/Summer 2007): 22-50.
- Grantland, S. Ri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uthorship in America*.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7.
- Hawthorne, Nathaniel. "Preface."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The Centenary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Ed. William Charvat, et al. Vol. II. Columbus: Ohio State UP, 1962-97. 1-3.
- . "Preface." *The Marble Faun: Or, the Romance of Monte Beni*. *The Centenary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Ed. William Charvat, et al. Vol. IV. Columbus: Ohio State UP, 1962-97. 1-4.
- Jehlen, Myra. "'Imitate Jesus and Socrates': The Making of a Good America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89.3 (1990): 501-24.
- Lawrence, D. H.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1923.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71.
- Lemay, J. A. Leo, ed. *Benjamin Franklin: Writings*. N.Y.: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7.
- . *The Life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1: Journalist 1706-1730*. 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 2006.
- . *The Life of Benjamin Franklin, Vol. 2: Printer and Publisher 1730-1747*. 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 2006.
- Morgan, Edmund S. "Fore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 *The Autobiography of*

- Benjamin Franklin*. Ed. Leonard W. Labaree, et al.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P, 2003.
- Nye, Russel B., ed.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Writings by Benjamin Frankl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58.
- Seavey, Ormond. “Benjamin Franklin and D. H. Lawrence as Conflicting Modes of Consciousness.” *Critical Essays on Benjamin Franklin*. Ed. Melvin H. Buxbaum. Boston: G. K. Hall, 1987.
- Shurr, William H. “‘Now, Gods, Stand Up for Bastards’: Reinterpreting Benjam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American Literature* 64.3 (1992): 435-51.
- Silverman, Kenneth, ed. *Benjamin Franklin: The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Writings*. N.Y.: Penguin, 1986.
- Simpson, Lewis P. “The Printer as American Man of Letters.” *The Brazen Fac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Consciousness in America*. Athens & London: U of Georgia P, 1997.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he Printer as Man of Letters: Franklin and the Symbolism of the Third Realm” in *The Oldest Revolutionary: Essays on Benjamin Franklin*, ed. J. A. Leo Lemay (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 1975).
- Warner, Michael. *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 Publ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Mass., & London: Harvard UP, 1990.
-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German ed. 1904-1905. Trans. Talcott Parsons. 1930. London & N.Y.: Routledge, 2005.
- Weinberger, Jerry. *Benjamin Franklin Unmasked: On the Unity of His Mor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Thought*. Lawrence, Kansas: UP of Kansas, 2005.
- Wood, Gordon S. *The Americanization of Benjamin Franklin*. N.Y.: Penguin, 2004.

## 華勒斯《兒童》中的人物命名研究

王秀文/ Hsiu-wen Wang

文藻外語學院法文系 助理教授

Département de Français,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 【摘要】

姓名在小說中不只是人物的稱號，它同時也是語言符號，具有「內涵語碼」(code connotative)功能，可以使文本主題化。本文引自包戴爾理論，分析朱勒·華勒斯的《兒童》(*L'Enfant*)，探討該自傳體小說中人物姓名的類型、命名之語言和文化動機，如何可以塑造出受虐兒童人物、強悍母權和父權形象，進而揭露十九世紀當時家庭、學校和社會的陰暗面。

### 【關鍵詞】

華勒斯、《兒童》、人物姓名類型、語言命名動機、文化命名動機

### 【Abstract】

The name in a novel is not just the title of a character. It is seen as a linguistic sign, with the function of “connotative code”, which may provide a theme for the text.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use Yve Baudelle’s theory in analyzing Jules Vallès’s autobiographical novel *The Child*.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typology, the language and the cultural meanings of the name in the work of Jules Vallès. We will then discuss how the author applied these to shape the images of the suffering child figure, and the authoritative mother and father. Furthermore, the dark sides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 were revealed as well.

### 【Keywords】

Vallès, *The Child*, typology of the name, language meaning, cultural meanings

## 一、前言

自從盧梭《懺悔錄》(*Les Confessions*) 出版以來，十九世紀法國作家更熱衷於自我形象的摹寫，小說敘述模式多以自述年少時期的成長歷程為主題，這類型童年書寫也因此成為法國自傳文學(*autobiographie*)、家庭小說(*roman familial*)和成長小說(*roman d'apprentissage*)的基調，同時造就了兒童人物的黃金年代。作家通過書寫「我」的再現，自我肖象投射在分身身上，無論是動態或者靜態描寫，從人物身份、登場方式、動作、表情、對話，到敘述者聲音的選擇與轉換、敘述情節進行刪減、保留、增添等等，自傳書寫體是在「我是他人」(*Je est un autre*)的路上，審視自我、找尋自我。

按照勒賈諾(Lejeune, 1996: 28)所說，小說家對於主角姓名的改寫與否，形成自傳與自傳小說的界定。姓名是構成「人物標籤」要素之一，自傳小說作者對於人名詞彙的擇取形式，或以全名，或以縮寫，或以匿名出現，出於仿真(*mimésis*)考量，也是玩弄修辭構思巧妙之所在。就姓名圖騰所具有的社會意義而言，透過人物各式稱號的分析，可以發掘十九世紀兒童人物所處社會地位的演進。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十九世紀法國社會歷經拿破崙政權的殞落以及兩次革命，政治局勢動盪不安，隨著社會變革、中產階級興起，自傳體小說人物命名的趨勢，亦從初期深含著宗教哲思色彩的《雷諾》(*René*)、富有貴族氣息的《阿朵夫》(*Adolphe*)，一直到中期強調父系家庭機制的《路易·朗伯》(*Louis Lambert*)、《亨利·布魯拉的一生》(*La vie de Henry Brulard*)，再到晚期《小東西》(*Le Petit Chose*)、《紅蘿蔔頭》(*Poil de Carotte*)，顛覆傳統命名形式，選擇以日常詞彙為名，缺少父姓、家庭歸屬名，這些物化、邊緣化綽號的出現，成為孤苦無依孩童的標籤，都讓後期兒童人物命名系統更為豐富。

十九世紀晚期的法國文學作品之中，朱勒·華勒斯(Jules Vallès, 1832-1885)的自傳三部曲《兒童》(*L'Enfant*)、《高中生》(*Le Bachelier*)和《起義者》(*L'insurgé*)，分別以他童年、青少年和成年生活為藍圖。其中，首部曲被視為探討親子關係的重要著作之一。華勒斯因1871年巴黎公社事件，而流亡至英國，這段期間他開始投入寫作生涯，在《兒童》中，作者描述童年時期受制於獨裁、專制的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裡頭提及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多達上百個，作者在虛擬和真實之間徘徊，運用命名權寓意人物身份、性別、社會階級以及未來的命運。本文引自包戴爾的姓名學論述，探討華勒斯《兒童》小說中人物命名之類型、語言命名動機和文化命名動機，分析人物姓名及其形象塑造之間的關係。

## 二、包戴爾姓名學理論

人物姓名學的理論，最早出自於二十世紀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967)所提出的命名「動機」(motivation)一詞。西方對人物姓名學的研究在早期多半以詞彙學的方式進行分析，自六十年代結構主義以來，語言學家開始研究「指稱」(référence)，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77)將符號學的概念應用於文本分析上，他認為文本中的詞和詞組具有「內涵語碼」(le code connotative)的功能，而人物姓名這個專有名詞本身，正是可以使文本主題化的一個重要語碼。

事實上，小說人物的姓名，這個符號由「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組成，在文本的功能上，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八十年代，符號學家亞蒙(Philippe Hamon)從奎馬斯(Greimas)的敘事結構繼續發展，將小說中的人物分為三種類型：指稱性人物(personnages-référentiels)、指示詞人物(personnages-embrayeurs)和重覆性人物(personnages-anaphores)。亞蒙進而將人物姓名納入其人物效果理論(l'effet-personnage)之中，他的理論架構可分為人物「存在」(l'être du personnage)和人物「行爲」(le faire du personnage)兩部分。人物「存在」以分析人物姓名(le nom)和描述人物特質(les qualifications)為主，而人物「行爲」則是探討主題(les thèmes)和角色系統(les rôles actantiels)，姓名學研究成為解讀詩意文學作品的方法之一。

此外，包戴爾(Yves Baudelle:1989)在研究巴爾札克(Balzac)、普魯斯特(Proust)和賽林納(Céline)筆下人物姓名的著作中，提出一套更有系統的方法學，來剖析文本專有名詞詞彙背後「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係，這套論述讓姓名學理論的架構更趨於完整。包戴爾認為，命名的「語言動機」(la motivation linguistique)是構成人物性格的主要元素之一，可包含三種類型：姓名的可讀性(lisibilité du nom)、姓名的聯想(associations du nom)以及姓名的摹擬(mimologie du nom)。小說家藉由字音直接反應字義、字音和字義的聯想(名字上增字、減字、替代)或者字音與字義的摹擬觀念等手法，玩弄文字遊戲，反映小說人物的性格、外表、社會階級、甚至是命運。另外，戴勒博(Daniel Delbreil)在分析阿波里納(Apollinaire)小說中的人物時，提出對人物姓名進行文化性層面的探討，他認為有許多人物姓名是出自於受洗名，因此命名的「文化動機」(la motivation culturelle)，應探討這些受洗名的命名意涵，將人物和聖經裡的使徒，進行文化上的比較和詮釋。

## 三、《兒童》人物姓名類型

人物姓名在閱讀過程中經常被忽略，然而它卻是讀者對紙上人物外在的最基本認知。透過這個語言符號，小說人物躍然於文本之外，與真實人生有了連繫，



讓讀者對文本虛擬世界，產生了聯想、認同等移情作用。《兒童》是以第一人稱寫成，華勒斯透過他的分身雅克·范德拉(Jacques Vingtras)，敘述童年時期生長於勒畢昂沃列(Le Puy-en-Velay)、聖愛亭(Saint-Etienne)、南特(Nantes)到巴黎的成長之路。

《兒童》中的人名詞彙有的是真實名，有的是替代名(nom substitué)。真實名指的是真有其人、真有其名；而替代名指的是真有其人，作者改編其名。雖然主角與作者並不同名，但是我們看到他周遭人物姓名多數是出自真實名。小說中提及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共有一百零八個。這些人物姓名的類型可以分為姓氏(patronymie)、名字(prénom)、綽號(surnom)和匿名(anonymat)四類。

第一類型是姓氏(patronymie)。人物姓氏在文本中具有提供地理資訊功能，它可以反映人物的出生地。正如杜周(Dauzat)在姓名學字典所說的，姓氏和名字可以是源自於地方名、受洗名、職業名和綽號四類。《兒童》以真實地名為小說背景，除了勒畢昂沃列之外，富爾扎克(Vourzac)、費爾羅(Farreyrolles)、修德羅(Chaudeyrolles)、馬度瑞(Martouret)、聖山克(Sansac)以及勒畢昂沃列的邦尼克街道(Pannesac)等等，這些專有名詞都是地圖上可以找到的鄉村城鎮地名，它們成為文本真實性的標記之一。每個地區對於姓氏命名組成的方式，亦有所不同。蒂絲妮(Sylvia, 1990: 78) 研究《兒童》中的地名(la toponymie)和法國南部農村命名的特色。她指出姓氏字尾-*eau* 是源自於法國中南部之中，這類型人物的姓氏有巴蘭朵(Balandreau)、拉波(Larbeau)和柏侯(Boireau)，字尾-*in* 則是源自於地中海地區的人物姓氏有杜凡(Turfin)、布尼蘭(Brignolin) 和格蘭(Grelin)。另外字尾-*ol*、-*al* 是出自法國中部(Massif Central)，這類姓氏則有德洛帕(Dropal)、戴杜尼(Destougnal)和德維諾(Devinol)；字尾-*ard* 姓氏人物有貝格尼亞(Bergougard)、蘇倚雅(Souillard)、歐莎(Haussard)；以及源自於奧克語字尾-*as* 的人物姓氏有范德拉(Vingtras)和夏德納(Chadenas)。

事實上，蒂絲妮的人名地名研究中並沒有對姓氏字首有所闡釋，在《兒童》中的地方名包括常見於法國南部的姓氏開頭 *Cail-*和意指出生於小村莊附近的字首 *Chail-*，這類型人物分別有夏利武(Chaillu)、卡倚歐湯(Caillotin)。此外，根據杜周(1989:21)的姓名學字典，法國中南部在字尾上經常使用-*y*，這類型的人物姓氏有莫里(Moly)、杜力(Doizy)和安東羅里(Anatoly)。地方名的姓氏還有香雷爾(Chanlaire)意指「老鷹的活動領域」(champ de l'épervier)；蘇倚堯(Souillard)指的是「骯髒的地方」；而歐莎德(Haussard) 意指「房子」。另外，法博爾(Fabre)源自於奧克語，也是法國中南部常見的姓氏。除了地方名之外，法文姓氏也可以是受洗名，在小說中，這類型的姓氏並不多見，只有凡松(Vincent)和卡尼耶

(Garnier); 姓氏可以顯示人物職業, 以職業名命名的人物有杜倚埃(Toullier)是制瓦商(tuillier), 而姓名可以也是綽號名, 例如: 比松(Pichon)是由十字鎬(petit pic)而來, 因此成爲工人的綽號; 而羅里歐(Lauriol)是法國庇里牛斯省(Midi)中一種鳥的綽號, 傑路羅(Jaluzot)由是妒嫉(Jaloux)而來。

第二類型是名字(prénom), 法文的名字可以用來區分男女性別, 除了地方名以外, 例如: 路易(Louis)後面加-e 就成爲女性名露易絲(Louise), 強(Jean)後面接-ne 就成爲珍妮(Jeanne)。此外, 名字和姓氏一樣可以是受洗名, 《兒童》中這類型的受洗名很多, 例如: 主角雅克(Jacques)、安東尼(Antoine)、查理(Charles)、強(Jean)、大衛(David)、喬瑟夫(Joseph)、亨利耶特(Henriette)、路易斯(Louise)、歐珍妮(Eugénie)和皮耶爾(Pierre)。名字可以反映某一地區的命名文化, 華勒斯透過這層特性, 運用人名符號的堆砌, 貼切地勾勒出法國中南地區農村取名特色。在書中第二章節裡頭, 我們可以發現勒畢昂沃列這裡名字稱呼的特色, 習慣省略頭音節的方式稱呼。亞美麗姑姑(la tante Amélie)簡稱爲美麗姑姑(la tante Mélie), 而亞波蓉妮表妹(la cousine Apollonie)則簡稱爲波蓉妮(la Polonie)。在鄉村地區, 有時候爲了讓許多相同名字有所區別所產生出來的不同稱號, 取名規則多數爲口語化, 同時表示命名者和受名者之間親密、熟悉關係。例如, 農村地區習慣在受洗名的字尾加上不同的後綴, 來當作暱稱(hypocoristique)。按照姓名學家杜周(Dauzat, 1989: 338)所說, 雅克這個名字的暱稱有-ot 成爲雅戈(Jacquot), 也有加上-ou, 就像雅克的姑姑瑪利(Marie)則成了瑪利蝴(Mariou), 他的表妹亞波蓉妮則暱稱他爲雅克努(Jacquinou)。後綴字除了-ou 之外, 農村地區方言使用的後綴還包括 -ouni, -on (Disegni, 1990: 78), 這些字尾具有「指小」、「通俗」之意。

第三類是綽號(surnom), 不同於姓氏是社會地位的表徵, 綽號是人物的另一種代稱, 華勒斯運用後綴字加上職業名形成另一種綽號命名特色, 像書中次要人物牧牛的皮艾尼(Pierrouni le vacher) 和擠牛奶的江妮冬 (Jeanneton la trayeuse) 就是一例。而這種多重稱呼的方式, 還可以在人物姓名前面或後面加入綽號、職業、甚至是某一身體特徵, 呈現呼喚者和被呼喚者之間的熟悉。小說中雅克在介紹其他家鄉人物登場, 像行乞的戴梭旭(Déssosé le mendiant)、務農的傅羅蒙(Florimond le laboureur)、矮仔鞋匠「鬍鬚」(Moustache le petit cirreur), 這些次要人物名字雖然只出現在文中一次, 但是這些名字符碼的聚合, 儼然成爲鄉村形象之一。

第四類姓名類型是暱名(anonymat): 小說家對於次要人物有時會以暱名方式將人物真實姓名作完全或者部份的隱藏。《兒童》中, 華勒斯直接以人物職業作爲其姓名, 例如: 監獄的看守(geôlier)、頑童(polissons)、酒鬼(buveurs)、小酒館

老板(cabaretier)、工友(lampiste)等。這些次要人物雖無足輕重，多從事社會中下階層工作，它們的聚合呈現社會不同的面貌。對於真實名的呈現方式，除了擇一名字之外，作者爲了部份隱藏真實人物身份，會以縮寫方式介紹人物登場。例如：雅克高中拉丁文老師和法文老師，分別以「狄某某」(D\*\*\*)和「恩某某」(N\*\*\*)出場。

#### 四、人物姓名的組合和登場方式

人物姓名不僅止於介紹人物的身份，它的登場方式和敘述的技巧也有相當的關係。《兒童》中姓名的組合方式，可分爲單一稱呼法、完整稱呼法和多重稱呼法。對於小說中的次要人物，華勒斯多採用單一稱呼法，也就是小說人物僅以姓氏、名字或者綽號出現於文本。這些次要人物，姓氏前面會加入某某先生、某某小姐或者某某女士，代表中產階級的尊稱並象徵其社會地位，像范德拉太太(Mme Vingtras)、小雅克樓下鄰居巴蘭朵小姐(Mlle Balandreau)、蘇佩羅先生(M. Soubeyrou)、學校老師羅利業先生(M. Laurier)、索德先生(M. Sother)、維勒塔先生(M. Viltare)、畢雄先生(M. Pichon)等等。

這些單一稱呼法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范德拉太太(Mme Vingtras)。事實上，《兒童》是一部刻畫惡母形象的小說，華勒斯並沒有沿用自己真實母親朱莉·巴絲卡(Julie Pascal)的姓名，只凸顯她配偶的姓氏，讀者始終無法得知她的名字。范德拉太太(Mme Vingtras)看似無足輕重的命名方式，卻是書中的靈魂人物，她代表著強悍母權形象。透過小雅克的敘述視角，她展現出將丈夫、孩子牢牢掌握在她的控制之中。在家中她的教育名言是「不要寵小孩。」(p.114) 她嚴厲的管教，以暴力高壓方式來訓服、操控雅克的一舉一動。雅克是家庭暴力的犧牲者，他始終以「我母親」來稱呼，如果我們說暱稱是表示歸屬於某一群體的另一種代號，表示呼喚者與被呼喚者，命名者與被命名者之間的關係，那麼范德拉太太不像家族中其他人膩稱自己的小孩「雅克努」(Jacquinou)。雅克在家中沒有綽號，也沒有小名，他母親總是稱呼他的名字或者「我的孩子」、「我的兒子」，所有格形容詞「我的」，象徵一種佔有慾和控制慾，母子之間的稱謂顯現出可支配/被支配者的關係。

除了上述之外，單一稱呼法可以表示社會階級上的差異性，也就是在姓氏之前加上他們的職業頭銜。例如：海尼根校長(le proviseur Hennequin)、杜凡教授(Professeur Turfin)、學監蘇倚堯(le pion Souillard)和費雷神父(l'abbé de Feller)。單一稱呼法用於稱呼名字時，則多半是表示稱呼者和被稱呼者之間熟識的關係。例如：小說第二章節一一列舉雅克父母雙方家族成員，這些次要人物包括羅莎妮阿

姨(*la tante Rosalie*)、馬麗芙阿姨(*la tatan Mariou*)、亞美麗姑姑(*la tante Amélie*)、亞妮絲姑婆(*Grand-tante Agnès*)、喬瑟夫舅舅(*l'oncle Joseph*)、姜舅舅(*l'oncle Jean*)、亞波蓉妮表妹(*la cousine Apollonie*)，以及之後提到的瑪格麗特表妹(*la cousine Marguerite*) 都是根據華勒斯童年生活原型所取名。這些人物一出場伴隨著他們的名字、內外特徵描述以及在家族之中的輩份。我們可以看到行輩稱呼的方式是在名字前面加上稱謂，以便說明他們和主角之間的關係。

完整稱呼法，指的是姓氏和名字一起出現，這類的稱呼法通常是人物初次登場向別人自我介紹或者是正式介紹他人時才會出現在文本中。例如：主角雅克·范德拉(*Jacques Vingtras*)、安東尼·范德拉、(*Antoine Vingtras*)、賽里娜·卡尼耶(*Mlle Céline Garnier*)和露易絲·雷歐(*Louise Rayau*)。

至於多重稱呼法，指的是完整姓名加上綽號。在《兒童》中，雅克除了有完整姓名之外，作者還借用其它「指稱性人物」(*personages-référentiels*)來比喻主角不同歷程的成長，他並且常用貶意的綽號來形容主角地位邊緣化的情境。雅克自比為「小東西」(*Le petit chose*)，每天下午時間一到便挨母親一頓毒打；而在一場為兒童舉辦的嘉年華會中，母親幫他打扮的像身穿「笨蛋小孩」(*L'enfant aux cornichons*)，在外人的眼裡，他可笑的服裝讓他被戲稱為「小花椰菜」(*le petit Choufoux*)，以為他是來廚房幫忙。在學校，他受到同學的排擠，被嘲笑是「發育不良的矮子」(*avorton*)、「阿茲特克人」(*aztèque*)。除了雅克之外，多重稱呼法也在其它次要人物身上可以看見，例如：作者將市集中小人物的名字和綽號放在一起，生動地描寫他們的日常職業(行乞的戴梭旭：*Déssosé le mendiant*、務農的傅羅蒙：*Florimond le laboureur*、牧牛的皮艾尼：*Pierrouni le vacher* 和擠牛奶的江妮冬：*Jeanneton la trayeuse*) 和身體特徵(矮仔鞋匠「鬍鬚」：*Moustache le petit cirreur*、瘦子強：*Jean le Maigre*、多毛的畢農：*Bugnon le Velu*)。

此外，小說中人物姓名的登場方式和時機，可以決定情節節奏快慢，製造不同的文本效果。有些小說家喜歡讓人物先登場，姓名之後再登場，這種知其人不識其名的延遲命名法(*dénomination tardive*)，讓讀者對劇情的期待不斷升高，可以製造出懸疑和延遲(*réticence à nommer*)的文本效果。《兒童》不同於傳統自傳多是由成人敘述過去，華勒斯夾雜著兒童口吻，由小雅克以現在式敘述他童年遭遇，透過他的眼光，我們可以看到人物姓名登場的另一特色，經常是伴隨著他的形貌或者行為特點一起出現，人物臉譜的描寫，帶有孩童俏皮、幽默、戲謔意味。而這種立即性效果(*l'effet immédiat*)，也形成了小說的敘述策略，讀者在認識人

---

<sup>1</sup> 這部份專有名詞的借用在文化命名動機上說明。

物的同時，彷彿也加入他們的日常之中。例如：小說第二章節中，亞美麗姑姑(*la tante Amélie*)登場時，華勒斯以矛盾修辭學(*oxymore*)手法來形她個性上的特徵：「我的美麗姑姑是啞巴，此外，她很聒噪，很聒噪!<sup>2</sup>」(p. 148) 接下來的描述更生動有趣，整個敘述節奏突然變得快速且鮮明，彷彿是用來強調她聒噪特質：

「她的眼睛、額頭、嘴唇、手、腳、神經、氣勢、肌肉、皮膚，全身都在擺動、喋喋不休、提問、回答(…)」<sup>3</sup> (p.148)

事實上，亞美麗這個受洗名源自日耳曼，在法國偏遠鄉間廣為流行，它指的是從事「勞動」、「工作」之人，小說中她從事手工工作。如果說這個名字所衍生出來的意思具有動態的、忙碌之意，那這層活潑好動的特性似乎被展現在她的肢體語言上。華勒斯喜愛將人物姓名，搭配他們的內外表特徵，玩弄修辭文字遊戲，因此每位人物登場的時間雖然短暫，卻令讀者可以瞬間掌握他們每個人的特色。

## 五、人物命名語言動機

從 1876 年起，華勒斯開始投入文學創作生涯，根據自己不幸的童年撰寫三部曲，他最初並沒有使用本名，而是署名拉修薩德(*La Chaussade*)，投稿於期刊《世紀》(*Le siècle*)。1879 年，小說正式發行，和其它自傳體小說家的矛盾心理一樣，華勒斯在小說中雖然沒有標示任何時間，他雖想書寫自我卻又不敢承認身份，企圖與主角雅克保持距離，因此小說中他保留自己姓名的第一個字母，將主角命名為雅克·范德哈(*Jacques Vingtras*)，讓讀者不難去聯想到兩者之間的關係。

就語言學角度而言，人物姓名這個專有名詞，如同亞蒙所言，「專有名詞在小說中不僅可以反映出字義的豐富性，突顯人物所象徵”意義”的分散或聚集處，它在情節上扮演關鍵性角色，可以凸顯所描述物品之字義地位<sup>4</sup>。」(Hamon, 1998: 135) 人名符碼的聚集因此成了突顯文本主題的策略之一。

<sup>2</sup> 原文如下：「Ma tante Mélie est muette, -avec cela bavarde, bavarde !」由筆者翻譯。

<sup>3</sup> 原文如下：「Ses yeux, son front, ses lèvres, ses mains, ses pieds, ses nerfs, ses muscles, sa chair, sa peau, tout chez elle remue, jase, interroge, répond ; (...)」由筆者翻譯。

<sup>4</sup> 原文如下：「Un nom propre, dans un texte romanesque, est non seulement un lieu sémantique très riche, foyer de dispersion ou de regroupement du « sens » d'un personnage, mais peut être également un objet doté d'un statut sémantique défini, jouant un rôle défini dans l'intrigue.」由筆者翻譯。

然而，這部自傳小說中所有人物姓名並非全是真實名，有些姓名是經過部分改寫、甚至是杜撰出來的。這些替代名的由來，並非源自於天馬行空，而是來自於真實名的變形。命名之語言動機則是藉由字音字義的聯想，將這類人名變形與真實人名相近，讓姓名呈現「完全可讀性」(la lisibilité du nom)以及「部份可讀性」(la transparence voilée) 的特色，卻不影響讀者從中辨認其意。所謂完全可讀性指的是人物姓名這專有名詞沒有經過修改，讀者可以直接從名字當中立即辨認出人物的內外特徵。在《兒童》中，這類型名字通常是以綽號出現，例如：瘦子強(Jean le Maigre)、多毛的畢農(Bugnon le Velu)。綽號本身包含身體特徵以及職業性質，藉以呈現人物的外在特徵。

而人物姓名的部份可讀性，指的是人物本身的姓名經過部份的變形改造(les métaplasmes onomastiques)，可以由不同「詞組」(syntagme) 所組成，可分解成幾個可辨認的字(morphèmes reconnaissables)，姓名本身也因此成為不同修辭學的集中地。小說中有些次要人物的姓名是利用字彙的连接(mot-valise)而形成的，例如：學監蘇倚堯(le pion Souillard)，則是由動詞「骯髒」(souiller)加上具貶意的形容詞尾-ard 所構成的。雅克的同學而他的另一位同學馬杜盛(Matoussaint)則是由「我的」和「萬聖節」兩個法文單字組成，現實生活中華勒斯的同學名叫夏盛(Chassin)，在小說中作者保留名字的韻腳，改寫成馬杜盛(Matoussaint)。此外，貝格尼亞先生 (M. Bergougnard) 的兒子波拿方杜(Bonaventure)，他的名字也是完全可讀的，它是由「好」、「冒險」兩個法文單字所組成，他是父親暴力下的犧牲品，從受到暴力虐待的受害者成為施暴的加害者，他動手欺負弱小、剪斷貓的尾巴、拔光小鳥的羽毛，殘忍的行徑與他父親如出一轍，他只能在戰勝弱者身上獲得滿足和成就感。

至於移動變形 (par déplacement ou l'anagramme)，指的則是人物姓名的組成由移動字母或者音節排列順序所組成，例如：利卡德(Ricard)的姓名則是源自於單字「愛吵鬧」(criard)。華勒斯以「反用法」(l'antiphrase) 呈現人物名字及其性格完全相反，小說中利卡德有八個兄弟姐妹，他們因為愛吵鬧和愛罵髒話而常被揍，唯有利卡德，「他挨打的原因正是他一言不發，總是安安靜靜<sup>5</sup>。」(p.251)

接下來我們探討《兒童》中人物姓名字音、字義和字形方面的語言動機。就名字的字音聯想上，雅克的名字與「耳光」、「巴掌」(claque)和擬聲詞「叭」、「啪」、「喀嚓」(clac)同韻腳。事實上，華勒斯賦予這個名字受虐形象意涵，「暴力」一直是整本小說所探討的重要主題之一，在家中雅克經常被范德拉太太

---

<sup>5</sup> 原文如下：“On le fouette, lui, parce qu’il ne dit rien et se tient tranquille.” 由筆者翻譯。

毒打一頓，母親代表著一種否定，她扮演壓迫者的角色，毒打自己的小孩，她一登場便讓讀者看到一個惡母暴力的形象，她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便是：「雅克，我要揍你。」(p.141) 甚至主角自述：「我母親很開心，當她賞我一巴掌時，她很興奮。」(p. 257) 孩子的身體是母親的一部份，懲罰小孩其實也是懲罰母親本身。雅克不只是家庭暴力下的犧牲者，他同時也是學校體制下的受害者。在學校，他經常遭受自己的父親和其他老師處罰。學校是個階級制度分明的地方，雅克是貧窮底下的犧牲者，因為他是窮人之子，因此常受到高中另一位討厭窮人的杜凡教授(M. Turfin)欺壓，雅克給了他「杜凡是吝嗇鬼，杜凡是蠢蛋<sup>6</sup>。」(p.245) 小說中：「他輕視學監、輕視窮人，虐待公費生，還經常嘲笑那些穿著隨便的人<sup>7</sup>。」(p.242)

此外，范德拉先生既是雅克的父親，同時也是他學校的老師，這種雙重的身份反而讓主角承受著比別人更多的壓力、更多不公平的待遇。因為他是范德拉之子，以父之名反而讓主角受到更多的屈辱。主角必須時時忍受別的同學嘲笑自己的父親；此外，他覺得自己就像「苦役犯的兒子」一樣，每天晚上學校負責開關燈的工友，因為討厭他父親而毒打他一頓；他默默承受這一切，把挨打當成是一件「待完成的任務」。此外，由於他父親只是學校的學監(pion)，所以當雅克被維戴爾教授之子打時，校長基於「尊重階級制度」，要他去向維戴爾教授一家人道歉。高中時，雅克就讀於他父親的班上，因為他父親的懦弱，不敢得罪「權貴之子」，所以每當他的同學發出聲音時，范德拉先生總是假裝以為是他兒子惡作劇，因此打他出氣。

字音的聯想還包括雅克中學的兩位老師羅利業先生(M. Laurier)和蘇巴松先生(M. Soubasson)。現實生活中作者中學經濟學老師羅帝埃先生(M. Rodier)，這個名字源自於奧克語(Occitan) 中意指「灌木叢」、「紡車」等職業之意，作者將他改名為羅利業先生(M. Laurier)，名字字義與植物「桂冠」同名，而在字音上又可聯想到 l'orier (Disegni, 1990: 80)，or 是金子，而 ier 是職業的後綴，可以解釋為「黃金製造商」。至於蘇巴松先生，他善長舞蹈、拳擊，教授體育，文中他的名字，讓人聯想到與他的形象頗為符合。華勒斯善用疊韻法(l'alliération)，將名字讀音 Soubasson 中的[da][ba][sa][son] 這些音節重覆在描述人物外表之中，讓人物臉譜的描寫更顯節奏和音樂性：

<sup>6</sup> 原文如下：「Turfin pignouf. Turfin crétin.」由筆者翻譯。

<sup>7</sup> 原文如下：「Il a du mépris pour les pions, du mépris pour les pauvres, maltraite les boursiers et se moque des mal vêtus.」由筆者翻譯。

「這是一位老兵，酗酒、打老婆，游起泳來像條魚一樣敏捷，得過救生員金牌，(…)」(p.302)

華勒斯善於在父權人物的名字中放入相同的音節，藉此揭示他們的虛偽、醜陋面和粗俗特性。法文字母 gn，在音標中是發出鼻音[ɲ]，書中這類名字有多毛的畢農(Bugnon le velu)、貝梏尼亞(Bergougnard)、布農藍(Brignolin)、戴蘇尼亞(Destougnal)、樂尼亞尼亞(Legnagna) 等等。對作者而言，貝梏尼亞先生(M. Bergougnard)殺害自己的親身女兒，正是象徵虛假、專制的父權人物。而雅克住的巴黎寄宿學校原名為樂梅尼昂(Lemeignan)，華勒斯將它改名為「樂尼亞尼亞」(Legnagna)。雅克因為討厭這個地方，因此把他取名為 *gnagnagna*，重覆音節讓名字嘲諷意味更為濃厚。

除了字音上的聯想外，人物姓名在字義上的聯想部份，我們僅列舉范德拉這個姓氏和雅克的小學老師畢雄作為例子。華勒斯杜撰范德拉(Vingtras)姓氏的動機，似乎具有寓意之用。姓氏范德拉(Vingtras) 賦予主角反叛的使命。蒂絲妮(Sylvia, 1990: 92-94) 對於雅克·范德拉(Jacques Vingtras) 有諸多的詮釋。她認為作者藉由字音直接反應字義，讓人聯想到擬聲詞「啪嚓」(patatras)和動詞「勝利」(vaincre)。小說中呼應這個暗示，「雅克，抄一百遍! 啪嚓!我的一堆書就此掉在地上<sup>9</sup>。」(p.244) 擬聲詞「啪嚓」(patatras)象徵「墜落」，在這部家庭小說中，主角的地位一直是居於最卑微的位置。至於動詞未來式「勝利」字音相近，意思彷彿是「雅克，你一定會戰勝。」(Jacques, tu vincras) 這層聯想確實符合雅克一生的命運，姓名預言出他一生的軌跡，同時預言出他的未來人生的結果，他始終在對抗著不公義之事。范德拉太太一直希望他的兒子成為一個「先生」(monsieur)，這種母權的專制和控制欲展現在穿著上，她母親一直希望將他穿得像紳士一般，親手替他縫製禮服。即便雅克到巴黎唸書時，她依舊不忘寄全新的褲子給他。事實上，在整部小說中衣服代表母權的控制欲，雅克最終替自己買了全新的衣服，這個舉動象徵斷絕母親對他身體的支配權，尋求獨立自主。

另外，雅克的小學老師畢雄先生(M. Pichon)，讓人聯想到「鱗」，因為這個名字是英文單字「豬」(Pic)和法文單字「豬」(cochon)兩個字的結合，在文本中，

---

<sup>8</sup> 原文如下：「C'est un ancien soldat, qui boit beaucoup, qui bat sa femme, mais qui nage comme un poisson, et a une médaille de sauvetage.」由筆者翻譯。

<sup>9</sup> 原文如下：「- Vingtras, cent lignes! Patatras! mon paquet de livres qui dégringole et fait un tapage d'enfer!」由筆者翻譯。



這個人物的個性和他的名字正符合。「畢雄。和僕人走在一起-壞習慣是不愛乾淨- 會讀經典作品<sup>10</sup>。」(p.249)

除了字音、字義以外，華勒斯對於人物姓名的字形似乎也有所偏好，我們發現作者對父權的厭惡表現在命名上，字母 B (*mimographie*) 對他來說，被賦予和父姓深層的象徵意涵。在書中字母 B 開頭的人物名字或者姓氏最多，有貝格尼(Bergougnard)、貝禮本(Beliben)、布農藍(Brignolin)、柏侯(Boireau)、布松(Buzon)、巴提斯特(Baptiste)、巴拿貝(Barnabé)、波拿方杜(Bonaventure)、波甘(Boquin)、巴迪瓊(Badigeot)、布尼勇(Bugnon) 等等。華勒斯將字母 B 象徵「男性」，多具貶意。姓氏貝格尼(Bergougnard)，由字首 *ber-* 所組成，讓人聯想到英文的「熊」(bear)，象徵權勢。而字尾 *-ard*，和英文字 *hard* 同韻腳，都是用來比喻人物父權之意。事實上，字母 B，表示一種爆炸聲或者一種聲音，例如：聲音(*bruit*)、炸彈(*bombe*)、砰(*Boum*)、吵雜聲(*Brouhaha*)。作者巧妙地將這個字母的原意，用挪揄滑稽的手法去展現范德拉先生的婚外情。布農藍太太登場時，她的出現總是和聲音 *Boum, boum, hi hi* 或者吵雜聲(*brouhaha*) 連在一起。「星期天，熱鬧滾滾<sup>11</sup>。」(p.256) 談鋼琴時，「彈到重音節時，她會用力按著**砰**。輕音節時則是輕柔地彈著**噠**。**砰砰噠噠**<sup>12</sup>。」(p.254)

## 六、人物命名文化動機

小說家在塑造人物時，姓名不僅可以表明人物身份，就情節敘述而言，它出現的形式和情節的佈局鋪陳有著相當密切關係。對華勒斯而言，即便是一位次要的人物，他都喜愛將名字做字音、字義、字形上的聯想。因此，人物姓名往往自成一個詞義，有的能從語意上輕易看出，有的則必須參考當時的文化背景。在人物命名的文化動機上，我們列舉小說中「指稱性人物」(*personages-référentiels*) 和受洗名(*noms de baptême*)的借用，比較書中人物和這兩者之間相似或者相異之處。

《兒童》中華勒斯借用「指稱性人物」(*personnages référentiels*)，這些專有

<sup>10</sup> 原文如下：「« PICHON ». Se commet avec les domestiques- a des habitudes de saleté- sait ses classiques.」由筆者翻譯。

<sup>11</sup> 原文如下：「Le dimanche, c'est un brouhaha !」由筆者翻譯。

<sup>12</sup> 原文如下：「A la fin de chaque morceau, elle en arrache un *boum* grave du côté des notes graves et un *hi* flûté du côté des notes minces. *Boum, boum, hi, hi...*」由筆者翻譯。

名詞成爲另一種符碼，不用言喻便能讓讀者明白主角的處境或者心境，這種互文性也提供一種比喻的借境遊戲。例如：被家人處罰關在房間時，雅克自比爲「魯賓遜」(Robinson Crousoé)，事實上，十九世紀小說家經常借用魯賓遜這位指稱性人物來象徵主角在情感上孤兒的處境。在《兒童》中，雅克多次爲母親不認他所苦：「我母親不想認我；我開始相信我是孤兒<sup>13</sup>。」(p.166)「然而，當我出現在她眼前時，我會得到什麼待遇？她會認我嗎？萬一她不認我呢！<sup>14</sup>」(p.212) 真實生活中，華勒斯有七位兄弟姐妹，然而他將《兒童》一書中的家庭簡化爲一個微型結構，探索父親、母親和孩童互動之間的三角關係。就像其他家庭小說所暴露的問題一樣，主人翁往往缺乏父母其中一方的關愛，受到冷漠的對待，因此想與自己的原生家庭徹底切離，在潛意識中開始編織自己的身世，爲了擺脫父親的姓氏，幻想自己擁有另一個身份地位，在踏上尋找自我身份、自我價值的路途中，其實是想從現實生活失落的家庭溫暖之中得到補償。姓氏成爲親子血緣關係不可切割的標記，主角無法摒棄姓名的宿命，這揮之不去的夢魘。《兒童》情節正是典型的成長小說情節，故事一開頭，雅克自述童年是在母親的挨打中長大，他因此懷疑自己並不是母親所生，當他父親試圖幫他做一輛玩具車，卻不慎割傷自己，這一幕被母親指控爲「弑父」(un parricide)，同時也點出書中家庭衝突情節。

此外，這種孤兒情節讓雅克在自述臉譜時，不只一次的用「動物嘴臉」(museau)來形容自己的外表，這種將人形動物化的變形比喻，投射出身體上無法負荷家庭所帶來的心理壓抑及焦慮。「我彷彿像脫了繩索的動物在原野上，低語呢喃，像山羊一樣跳躍(…)」<sup>15</sup> (p.164) 雅克渴望形體上的變化，想異化爲其他動物，在親子關係緊張和無法溝通的困境之中，成爲無法解釋自己身份的另一種退縮和逃避。在接下來的家庭革命中，華勒斯運用其他指稱性人物象徵他成長啓蒙歷程上的轉變：主角從最初楚楚可憐的「仙度拉」(Cendrillon)，被人嘲笑到轉變成爲「西塞羅」(Cicéron)、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從順從到叛逆，到冒簽父親之名，奪下父權的象徵。

另一位人物，雅克的姑婆，同時也是他的教母亞妮絲(Grand-Agnès)，大家也

---

<sup>13</sup> 原文如下：「Ma mère ne voulait plus me reconnaître ; je commençais à croire que j'étais orphelin !」由筆者翻譯。

<sup>14</sup> 原文如下：「Mais quand je reparaitrai devant elle, comment serai-je reçu ? Me reconnaîtra-t-elle ?」由筆者翻譯。

<sup>15</sup> 原文如下：「Je me fais l'effet d'un animal dans un cahmp, qui aurait cassé sa corde ; et je grogne, et je caracole comme un cabri (...)」由筆者翻譯。

稱她為「貝亞德」(Béate)。這個稱號與名字具有一致性，反映當地習俗和歷史。亞妮絲原本就具有「純潔」、「貞潔」之意，而「貝亞德」這個別稱係指「受到上帝祝福之人」，它也是指在宗教上有所奉獻之人。按照貝雷(Bellet, 1990: 1507)所說，「貝亞德」在文化上指的是十七世紀以來的位於勒畢昂沃列這地區的宗教團體，她們猶如半個修女(demi-religieuse)，負責從事教人讀書識字的工作。

至於受洗名的借用，我們以雅克、小露易絲(Louissette)和他父親安東尼(Antoine)這三位人物的名字作為舉例。華勒斯選擇雅克這個名字，具有多重意義，就文化命名動機而言，「雅克」常出現於十七世紀的童話故事裡，之所以成為農夫的代名詞，是因為它源自於 1358 年中古世紀的扎克雷事件(Jacquerie)，這是一起農夫起義反抗政府的事件，大寫的雅克(Jacques Bonhommes) 因而成為法國農夫的綽號。十九世紀許多鄉村務農人家，普遍皆以此命名，一方面作者借用此名反映家族務農的條件，同時象徵起義反叛的意思。此外，小說中強烈的呈現出農夫/中產階級二元世界的衝突，如果說農民階級在巴爾扎克和斯湯達爾筆下代表的是粗暴、奸詐的形象，華勒斯卻賦予他們健壯、勤奮、務實、善良純樸的鄉土性格。雅克是農夫名，同時也象徵一種對土地的熱愛，儘管當時農民生活條件困頓，然而不同於他的父親一直企圖擺脫務農命運，主人翁嚮往和他的祖父、馬莉蜩阿姨的先生以及喬瑟夫叔叔(l'oncle Joseph)一樣成為農夫。「如果我可以留下來，可以成為一介農夫的話？」(p.235)《兒童》中學校是社會的縮影，也是家庭暴力另一場景的延伸，雅克的成長啟蒙同樣讓他受到許多挫折，這些挫折來自於象徵父權權威的教師人物。因此小說中專制父權的虛偽，和農民自然、不做作的性格，儼然形成強烈對比。

另一方面，就人物命名的文化動機而言，雅克本是受洗名，讓人聯想到聖經中的兩位使徒：大雅克(Jacques le Majeur)以及小雅克(Jacques le Mineur)，前者是西庇太(Zébédé)的兒子，他和弟弟約翰被耶穌收為門徒，被稱為「雷電」，他也是第一個殉道的使徒，而後者是阿斐爾(Alphée)的兒子，也是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最後為耶穌殉道，被電鋸鋸死；在宗教上，「雅克」的引申意具有受難意味濃厚之意。十九世紀中期的法國文學作品裡，許多小說家似乎也喜歡借用這個受洗名來比喻兒童人物所遭遇的艱困處境。例如：都德《小東西》(*Le petit Chose*, 1868) 中的雅克，是一個愛哭、軟弱的人物，而另外一本小說《雅克》(*Jack*, 1876)，以英語名形式出現(Jack)，主角命運同樣乖舛。因此，在十九世紀雅克這個名字多了另一層文學內涵，成為受虐兒童類型(L'enfant victime)的代名詞。

事實上，在十九世紀後期的家庭小說中，不幸兒童人物總是忍受著大人世界

的虛偽和不完美，身體上承受著苦痛，他們是家庭、學校和社會制度下的犧牲者。華勒斯的自傳三部曲最初是以主角姓名「雅克·范德哈」(Jacques Vingtras)作為標題。但是作者的用意似乎並非僅只想投射自身的童年，1879年，他將作品改名為《兒童》，企圖將個人不幸童年，投射成當時所有悲慘兒童的命運，正如小說開頭題詞所言：「此書獻給那些童年時期，在學校受到老師粗暴對待而煩悶，或者在家中遭到父母親毒打而流淚的人<sup>16</sup>。」因此，《兒童》一書並非只有描寫雅克或者像利卡德這些受虐兒童人物，然而除了主角從受虐轉而反叛家人之外，其他受虐孩童的命運卻是不一樣的。小說中第十九章節描述另外一位人物小露易絲(Louissette)，她是貝枯尼亞先生的女兒，華勒斯靈感源於他自己的妹妹馬莉·路易絲(Marie-Louise)，不過他替她改名為小露易絲(Louissette)，這個受洗名字尾以-et結尾，加上陰性字尾-ette，象徵「弱小」的意思，這類兒童人物包括雨果悲慘世界中的柯賽德(Cosette)，通常是弱勢的一群，她們無力反抗大人，只能順從命運的安排，而在小露易絲被他父親殘暴地打死的這一幕，也是她唯一出現在書中的一幕，這個次要人物雖沒有一句台詞，默默登場也默默下場，她臨死前對於父親暴力的極度不安、恐懼，是整部作品當中，除了雅克以外，華勒斯想要表達不幸兒童的另一中心人物。

另外，雅克的父親，安東尼·范德拉(Antoine Vingtras)的名字與使徒同名。這個名字初次登場是在他自己的生日(la fête de Saint-Antoine)上，華勒斯將聖安東尼、節慶和殺豬慶祝這三者關係連繫在一起。在聖經中，有許多使徒皆名為聖安東尼，他們多為修士。文學中，福樓拜曾寫過《聖安東尼的誘惑》(la Tentation de Saint-Antoine)，裡頭描寫聖安東尼受到魔鬼的引誘，這個受洗名反映「苦行」、「禁欲」等主題。不過華勒斯賦予安東尼這個名字一種反諷的價值(valeur antiphrastique)。他筆下的安東尼是一位汲汲追求於名利的父親，因為受到某人的庇護，因而獲得升遷，一家人得以搬到聖愛亭(Saint-Etienne)，但是他受不了誘惑，雅克親眼目睹他父親與同事之妻柏妮歐蘭太太(Mme Brignolin)有著曖昧關係。作者嘲諷安東尼披著教授的糖衣，卻無法抵抗外在的誘惑，父親之名也是虛偽的代名詞。

---

<sup>16</sup> 原文如下：「À tout ceux qui crevèrent d'ennui au collège ou qu'on fit pleurer dans la famille, qui, pendant leur enfance, furent tyrannisés par leur maîtres ou rossés par leurs parents je dédie ce livre.」由筆者翻譯。

## 七、結論

華勒斯筆下人物的姓氏，多詳實的反映法國南方地區命名特色，此外他對於名字的音、形、義皆具考量，善用疊韻法，除了鋪陳人物姓名的動機之外，其命名哲學亦多充滿許多嘲諷和幽默的特色，透過姓氏、名字、綽號等不同形式的稱呼，讓人物描寫更栩栩如生，展現姓名符號語言形象上的生動性和豐富性。

此外，華勒斯的三部曲本身是一部「戰鬥文學」(Littérature de combat)。人物姓名圖騰具有社會意義。姓氏不僅呈現出主角的家庭地位，它同樣象徵社會地位，透過主角的眼光和所遭受到的際遇，揭露社會不公平。雅克所要面臨的不僅是家庭問題更是整個社會教育的問題。雅克之名不僅是暴力家庭底下犧牲者之名，同時也象徵十九世紀後期文學中兒童人物對家庭、學校和社會不公義一面不再只是默默承受，力量的反撲、反叛。當小說的尾聲，主角爲了反抗父母親的專制和暴力，最後終於保衛自己，吶喊著：「我捍衛兒童的權利，就像其他人捍衛人權一樣<sup>17</sup>。」(p.383)這句經典的對白同時也道出了華勒斯寫作的企圖：作者賦予其自傳體小說另一層的時代背景之意義，主人翁雅克的成長啓蒙之路，從壓迫兒童內心深處的慾望，他內在的「我」，渴望轉變成「無性別」的動物，逃離家庭、學校和社會的枷鎖，從這些困境之中找到解放自我之路，「無姓」中逐漸找到自我、肯定自我生存的力量，從父母親的手中奪回人類生存的自主權。

---

本論文於 2011 年 3 月 29 日到稿，2011 年 5 月 24 日通過審查。

---

<sup>17</sup> 原文如下：「Je défendrai les DROITS DE L'ENFANT, comme d'autres les DROITS DE L'HOMME.」  
由筆者翻譯。

## 八、引用書目

- Barthes R. et al.(1977), *Poétique du récit*,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Baudelle Y. (1989), *Sémantique de l'onomastique romanesque*, thèse pour le doctorat nouveau régime, 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Paris III.
- Dauzat A. (1989), *Dictionnaire étymologique des noms de famille et prénoms de France*, Paris, Larousse.
- Delbreil D.(1999), *Apollinaire et ses récits*, Didier-Erudition.
- Fonagy I. (1980), *La métaphore en phonétique*, *Studia phonetica*, n ° 16, Didier.
- Hamon P. (1983), *Le personnel du roman. Le système des personnages dans les Rougon-Macquart d'Emile Zola*, Genève, Droz.
- Lejeune P. (1996), *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Massin (1993), *La lettre et l'image*,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 Saussure F.(1967),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itions Payot.
- Silvia D. (1991), *Le nom propre dans L'Enfant*, in « Lectures de L'Enfant de Jules Vallès », Actes et colloques, 29, Editions Klincksieck, pp. 78-106.
- Vallès J. (1990), *Oeuvres Complètes II*, présenté par Roger Bellet,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Editions Gallimard.

# Traduisibilité et intraduisibilité

## Une étude interculturelle du concept de romantisme

陳麗娟/ Chen, Li-chuan 賈瑪琍/ Marie-Paule Chamayou 江 灝/ Chiang, Hao  
淡江大學法文系 助理教授 巴黎高等翻譯學院 教師 輔仁大學法文系 碩士生

Department of French, Tamkang University

ESIT –École Supérieure d’Interprètes et de Traducteurs, Paris

Department of French, Fu-Jen University

### 【摘要】

翻譯是一種語際間的符號轉換，旨在將原文信息忠實地傳達給目的語言的接收者。然而，不同民族各有其語言符號傳遞的方式，因此如何正確地傳遞信息，成為跨文化溝通之成功關鍵。本文將由「浪漫」詞彙於中文、法文、英文、德文四種語言的定義出發，來了解他們對於該詞彙的解讀異同性，並輔以其他翻譯實例，進而討論文化詞彙的翻譯可能性、翻譯技巧及原則。

### 【關鍵詞】

翻譯、可譯性、不可譯性、溝通、信息、符號、傳遞、跨文化、浪漫

###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a text-switch between languages, with a purpose of accurately carrying the message content from the speaker’s source language to recipient’s target language. Since speakers from different racial groups use different ways to communicate, it is critical to consider how message content can be translated accordingly and appropriately for a successfu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present study will illust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ssue through discussing the word “romantic” or “le romantism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word is given unequivocally by Chinese speakers in some Asian countries (e.g., Taiwan and China) versus French or German speakers in Europe. The researchers will discuss this case from a holistic view of four languages: Chinese, French, English, and German, to examine the

disparate interpretations while supplemented with more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issue and principles of semantic translatability.

**【Keywords】**

translation, translatable, non-translatable, communication, message, symbol, conveyance, intercultural, romantic



La traduction dite pragmatique, c'est-à-dire non littéraire, porte sur des textes. Elle relève donc du domaine de l'écrit. Elle est un acte de communication qui permet à un émetteur de communiquer un message à un récepteur ne parlant pas la même langue. La traduction est donc une opération sur le message et non sur la signification de chacun des termes constitutifs de ce message.

Partant de ce constat, tout serait donc transférable en traduction, à condition que l'on s'entende sur les enjeux et les modalités du transfert, que l'on ne s'obnubile pas sur les mots, que l'on dépasse le plan purement linguistique pour s'attacher non pas à reproduire la matérialité des formes mais leur valeur discursive et l'effet produit sur le lecteur. Cet effet étant par essence non verbal, rien ne s'oppose en principe à sa recréation dans une autre langue par des moyens équivalents qui lui sont propres<sup>1</sup>.

Autant pour la traduction de textes, discursifs. Mais qu'en est-il par exemple de ce terme isolé à la forte charge sémantique qui surgit à intervalles réguliers dans le discours oral d'un locuteur taïwanais dès lors qu'il parle de la France, que ce soit dans sa langue maternelle ou en français, lorsqu'il s'adresse à son locuteur dans cette langue : le terme 浪漫 *langman*, dont l'équivalent attesté par tous les dictionnaires bilingues est « romantisme » (nom) / « romantique » (adjectif) ? Lorsque le locuteur taïwanais parle du romantisme à un Français, loin de lui l'idée d'expliciter ce à quoi il fait référence. Or, face à lui le Français non au fait de l'environnement culturel actuel des Taïwanais est dérouté, ne comprenant pas pourquoi il entend associer le romantisme à la France. Dans cette situation, aucun des deux locuteurs ne songe à la possibilité de s'exprimer en mettant l'accent sur la valeur discursive et non sur la valeur linguistique du terme. S'ils veulent aller plus loin, ils doivent donc faire un long effort d'explicitation complémentaire.

Effectivement, « si chaque langue [...] représente une vision du monde spécifique, si les langues ne sont pas des nomenclatures, depuis Saussure, l'équivalence des mots ne correspond en aucun cas à l'équivalence de visée de chaque langue. » (Oseki-Dépré : 113).

Certes, l'information est transmise sous une forme précise, mais cette forme n'atteint pas la pensée en tant que telle, elle est dans une certaine mesure structurée en surface et non en profondeur. A l'évidence, il n'existe pas de coïncidence sémantique exacte entre les termes « romantique » / « romantisme » d'une part et le terme 浪漫

---

<sup>1</sup> Fortunato Israël, « La notion d'intraduisibilité : mythe ou réalité ? », cours de traductologie de l'ESIT

*langman* d'autre part, alors même que le second est une traduction directe du premier, un transcodage. Résultat : le malentendu interculturel s'installe. Le locuteur français ne comprend pas ce à quoi le locuteur taïwanais fait référence et le locuteur taïwanais ne comprend pas pourquoi le locuteur français ne comprend pas ce à quoi il fait référence. Le traduit et donc précédemment traduisible est donc devenu, pour l'heure et à l'épreuve des faits, intraduit.

La traduisibilité semble donc trouver ses limites là où commence l'ignorance des choses. Or, conserver la substance du contenu constitue l'essentiel de tout acte de communication.

Si nous avons choisi ici d'étudier le terme « romantisme » / « romantique », c'est parce que, selon nous, il impose au locuteur taïwanais un transcodage du fait de sa forte charge sémantique ; il ne viendrait pas à l'idée de ce locuteur de faire une périphrase pour parler du romantisme (浪漫 *langman*) et éviter de prononcer le terme. Ce terme fait apparaître à l'évidence un problème de communication récurrent entre locuteurs taïwanais et locuteurs français. En effet, à Taïwan mais aussi chez ses voisins (Chine, Japon, Corée, etc.), ce terme est étroitement associé à la France. Tel n'est pourtant pas le cas en France, où le terme, comme nous le verrons, est associé soit à certain espace-temps, soit à une certaine atmosphère, qui n'est pas nécessairement celle que se représentent les Taïwanais puisque les Français ne comprennent pas le rapport existant entre leur pays et le romantisme.

Le problème étant récurrent, nous avons pensé qu'il serait intéressant de jeter des bases susceptibles par la suite de mieux circonscrire la nature du problème de communication et donc du problème interculturel. Aussi plus concrètement avons-nous choisi d'étudier la signification du concept de romantisme dans différentes langues ainsi que la représentation qu'en ont les Taïwanais.

Voilà pourquoi nous analyserons les définitions données par les principaux dictionnaires unilingues en chinois, français, anglais et allemand, afin de cerner les significations données à ce terme et à ses dérivés lexicaux majeurs dans chacune de ces langues. Par cette étude, nous espérons d'une part pouvoir décrire avec davantage de précision le fossé interculturel existant entre les Français et les Taïwanais quant à ce concept de romantisme si présent à Taïwan, d'autre part pouvoir dégager une réflexion sur le problème de l'intraduisibilité liée à l'interculturel.

## **Perception et définition du romantisme dans différentes langues**

### En français d'abord...

Parmi les définitions données au terme, les dictionnaires s'accordent pour notamment désigner par le nom « romantisme » un courant artistique né en Europ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d'abord en Angleterre et en Allemagne, et qui s'est ensuite développé au début du XIX<sup>e</sup> siècle en France comme réaction à la règle classique et au rationalisme des Lumières.

Selon le dictionnaire Petit Larousse (2008, p.898), le romantisme « s'élabore contre la tradition académique et néoclassique et fait triompher la spontanéité et la révolte là où dominaient froideur et raison. Après les espoir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face au matérialisme de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l'individu réclame son droit à la subjectivité, au rêve.»

*Le 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TLF, (p.1227) complète cette première définition : mouvement et courant intellectuel,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 qui « visait à renouveler les formes de pensée et d'expression en rejetant les règles classiques et le rationalisme, en prônant la nature, le culte du moi, la sensibilité, l'imagination, le rêve, la mélancolie, la spiritualité, en réhabilitant le goût contemporain, la couleur locale, la vérité historique ».

Enfin, Wikipédia explique que « ce courant se caractérise par une volonté d'explorer toutes les possibilités de l'art afin d'exprimer les extases et les tourments du cœur et de l'âme : il est ainsi une réaction du sentiment contre la raison, exaltant le mystère et le fantastique, et cherchant l'évasion et le ravissement dans le rêve, le morbide et le sublime, l'exotisme et le passé. Ses valeurs esthétiques et morales, ses idées et thématiques nouvelles ont influé sur d'autres domaines, en particulier la peinture et la musique.<sup>2</sup> »

Mais lorsqu'on passe aux définitions de l'adjectif « romantique », on se rend compte que ce terme renferme une abondance de significations. Le TLF, dictionnaire français contenant le plus grand corpus linguistique, liste une vingtaine d'entrées pour le terme. Ainsi, trouver quelqu'un « romantique » ne signifie peut-être pas qu'il vous apporte toujours de belles roses pour la fête des amoureux...<sup>3</sup>

En français, le terme « romantique » date du XVII<sup>e</sup> siècle, précédant de fait

---

<sup>2</sup> <http://fr.wikipedia.org/wiki/Romantisme>

<sup>3</sup> Voir le tableau en annexe

l'apparition de sa forme nominale « romantisme ». « Romantique » signifie d'abord tout ce qui évoque l'atmosphère d'un roman par son caractère fortement fictif. Le terme peut aussi être lié à la chevalerie médiévale et à des paysages naturels inspirant poètes et artistes. Il désigne également des personnes très sentimentales qui manquent d'attitude réaliste, ce qui n'est pas un compliment. Et dès l'apparition de l'école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 du romantisme, « romantique » renverra à tout ce qui présente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 romantisme et qui se rapproche du temps du romantisme.

... et en anglais, allemand, chinois

En anglais, le terme *romantic* partage la plupart des sens du français, mais l'« enrichit » avec l'idée d'« amour ». Selon le grand dictionnaire Oxford (p.65), être romantique peut vouloir dire « traitant d'une histoire d'amour » (*treating of a love affair*). Par la suite, ce terme perdra cette signification d'origine en anglais. Être *romantic*, c'est : un petit baiser à son amant, un repas à la chandelle, des fleurs offertes à une jolie fille...

En allemand, *romantisch*, équivalent du français « romantique » désigne tout d'abord une appartenance au romantisme tel qu'il a été décrit précédemment. Puis, par dérivation, le terme vient qualifier ce qui est empli de sentiments, passionné, idéalisant, rêveur, faisant rêver. Une troisième définition du terme qualifie ce qui est pittoresque, sauvage, attrayant. Ces définitions rappellent celles données au « romantique » du français. Cependant, nous constatons que l'adjectif qualifie très souvent une personne ou une relation sentimentale et est aussi utilisé pour décrire des chansonnettes, des aventures et la mode, ce qui correspondrait plutôt au *romantic* de l'anglais.

En chinois, deux termes coexistent pour « romantique » : 浪漫 *langman* et 羅曼蒂克 *luomandike*. Le premier terme faisait déjà partie du lexique chinois mais servait initialement à qualifier une personne ne se laissant pas contraindre par les règles sociales. Cette signification première n'a plus cours dans le chinois moderne. Le second terme est une transcription sonore du terme anglais *romantic*. Mais un glissement s'est opéré et 浪漫 *langman* a largement remplacé 羅曼蒂克 *luomandike* pour désigner le concept. Le chinois populaire a absorbé la signification de l'anglais pour désigner quelqu'un comme étant *romantic*, mais dans le sens du petit baiser à son amant, du repas à la chandelle, des fleurs offertes à une jolie fille... Mais le terme 浪漫 *langman* est également devenu un adjectif servant à décrire un paysage

pittoresque.

En allant plus loin...

En étudiant les dictionnaires français, nous n'avons pris connaissance d'aucune explication directement liée à l'amour alors qu'en anglais, le terme *love* est immédiatement introduit dans les entrées lexicologiques.

Mais la langue française attribue plus d'une signification au terme « romantique ». Ainsi, le TLF (p.1226) explique que « romantique » peut avoir trait à tout ce qui « évoque la pâleur, la longue chevelure, le costume des romantiques ou qui évoque l'esthétique de l'époque romantique, notamment ses jolies femmes un peu mièvres ». Ces deux significations n'existent pas dans d'autres langues. D'où la diversité sémantique mais aussi la complexité communicative du terme.

Pour enrichir la discussion sur le caractère polysémique du terme « romantique », nous pouvons également nous appuyer sur le point de vue de Jacques Barzun, spécialiste américain d'histoire culturelle, qui a recueilli l'utilisation du terme « romantique » dans nombre de textes et discours, tous genres confondus. Dans son livre *From dawn to decadence* (2001), l'auteur retrace l'évolution historique et linguistique du terme.<sup>4</sup>

---

<sup>4</sup> “The use of romantic in English goes back to the 17C when it was used to denote imagination and inventiveness in storytelling and, soon after, to characterize scenery and paintings. It served as a synonym to harmonious, picturesque [...] These tales are often about love and adventure, as contrasted with epic narratives or satires. In French today the word for novel is still roman, while in English a romance is one kind of novel and by further extension one kind of love affair. On this account romantic gets used to denote the blissful state and character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next step comes when the affair, the romance, has ended unhappily. Romantic at that point takes on a clutch of new meanings: illusory, foolish, unreal, incapable of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downright stupid – quite as if the previous situation had had no existence and value while it lasted. Clichés such as “romantic scheme”, “incurable romantic” come into circulation [...]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18C in Germany and England, Romantic generated the -ist form to designate those dissatisfied with the neo-classic style and enthusiastic about new forms in art and thought. None of the motley meanings of romantic gives any help in understanding that outlook. [...] The one link between the temper of the period an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is that Romanticism validated passion and risk. The two are inevitably connected; but as we shall see, they neither exclude reason, nor overlook the real. On the contrary, the spirit of

Ainsi, le premier usage du mot « romantique » en anglais remonterait au XVII<sup>e</sup> siècle, désignant imagination ou invention, et plus tard tout ce qui est beau, pittoresque, pour la peinture et le paysage en particulier. Il était alors synonyme d'harmonie. Ce terme renverra également à des histoires d'amour ou d'aventure et à ce que l'on appelait alors des « romances ». « Romantique », au départ positif, prendra plus tard un sens péjoratif ; du beau et de l'élégance, il passera à la stupidité et à l'irréalisme. Au cours de la dernière moitié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ce mot prendra une forme « -ist » pour signaler ceux qui sont contre le style néo-classique, faisant l'éloge des nouvelles formes d'art et de pensée. Cette multifonction du terme ne facilite ni sa compréhension ni sa réception. Malgré tout, dans « romantique », nous décelons toujours un esprit d'aventure.<sup>5</sup>

Dans un autre ouvrage, *Classic, romantic and modern* (1975), Barzun énumère les significations du terme, dont l'abondance lexicologique est extraordinaire. Ce qui est « romantique » peut être attrayant, exubérant, réaliste, irrationnel, matérialiste, futile, notable, révolutionnaire, pittoresque, nordique, stupide, etc.<sup>6</sup>

Le terme « romantique » est donc prolix et présente une grande « complexité » sémantique. Une telle polysémie peut provoquer un manque de pertinence et seul le contexte permet alors d'actualiser la signification voulue. Mais lorsque nous disons cela, nous nous plaçons dans un contexte avec des locuteurs présentant un bagage culturel identique. Le problème demeure entier lorsque ce bagage diffère : la polysémie et l'aspect « multifonctionnel » du terme varient plus ou moins d'une langue à l'autre et font donc souvent obstacle dans le dialogue interculturel.

### **Suggestions et conclusion**

La traduction du culturel exige un choix pertinent de l'expression pour une transmission réussie du sens. Et cela grâce à une profonde compréhension de l'évolution lexicologique du terme et à une interprétation fidèle à partir du contexte culturel. Nous voyons bien que le terme romantique connaît une polysémie étonnante et porte une charge culturelle très forte.

Dans la pratique de la traduction du culturel, plusieurs problèmes de

---

adventure in Romanticism aims at enlarging experience by exploring the real." [ *Ibid.*, pp. 467-468. ]

<sup>5</sup> *Ibid.*

<sup>6</sup> *Ibid.*, pp. 155-158.

non-équivalence ont été relevés (Chen Hongjuan 陳虹娟 2009, Li Chen 李晨 2009) :

1. Absence de lexique équivalent. Ainsi des termes 陰 *yin*, 陽 *yang*, 氣 *qi*, spécifiques à la médecine chinoise traditionnelle.
2. Codage et association culturellement différents des termes. Ainsi, le « chien » dans la langue chinoise comporte souvent un sens péjoratif : 走狗 *zougou* (chien qui marche : laquais, valet), 狗奴才 *gounucai* (chien + valet, laquais), 狼心狗肺 *langxingoufei* (le cœur d'un loup, les poumons d'un chien : être cruel et perfide)... Or en anglais, cet animal arbore une valeur plutôt positive : *lucky dog* (quelqu'un qui a de la chance), *a gay dog* (quelqu'un de très heureux), *top dog* (quelqu'un qui a du pouvoir). Un autre exemple, le dragon pour les Chinois symbolise l'empire ; or dans les sociétés occidentales, il représente souvent le malheur et le diable.
3. Les couleurs. En chinois, le rouge symbolise le soleil, le bonheur ; en anglais, cette couleur est souvent associée à la violence et au sang versé. Le vert, en anglais, est souvent associé à l'innocence, à une personne sans expérience ; or nous ne trouvons pas ces significations en chinois. 紅茶 *hongcha* (thé rouge) pour les Chinois est appelé par les Français et les anglophones « thé noir ».

Les chercheurs et praticiens qui se sont penchés sur cette question dans le cadre de la traduction écrite ont proposé des solutions, lesquelles ont tendance à considérer la traduction comme un act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ord 1991) ou un acte de coopération interculturelle (Holz-Manttari, 1984:17). Daniel Shaw (1988) a créé le terme de « transculturation » pour remplacer celui de traduction. D'autres chercheurs sont partis de la traduction du sens ou de la forme pour proposer deux nouveaux courants de traduction : l'aliénation (*source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 et l'adaptation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 Lawrence Venuti (1991), tenant de l'aliénation, pense que l'acte de traduction devrait conserver l'originalité de la culture du texte-source. Il insiste sur le fait que les lecteurs ont l'intelligence et l'imagination pour comprendre la culture source et que de ce fait, le texte traduit sera enrichi des modes d'expression de la culture source et de l'échange interculturel. Eugene Nida (1964), tenant de l'adaptation, estime que la traduction devrait au contraire se rapprocher des lecteurs en trouvant des équivalences possibles entre les deux langues.

Les chercheurs de ce courant pensent que le texte traduit devrait être à la portée des lecteurs et que l'acte de traduction doit viser à faire comprendre aux lecteurs le texte-source de façon la plus naturelle possible.

Un troisième courant part du principe que ces deux courants ne doivent pas être contradictoires mais complémentaires. La traduction d'une culture à l'autre nécessite une variété de techniques et de méthodes. Les deux approches sont, selon le contexte et le contenu, conjointement valables pour rendre le texte traduit accessible et facilement compris par les lecteurs tout en gardant l'originalité culturelle du texte-source (Lefevere, 1992: 16).

Dans le cas qui nous occupe, la traduction du terme « romantique » dans un texte écrit ne saurait se contenter d'une seule méthode. Revenons en détail à l'analyse de Jacques Barzun, qui dans *Classic, romantic and modern* a proposé une liste d'occurrences pour *romantic*. On pourrait adopter les propositions de traduction de ce terme, par exemple :

(Les traductions en chinois sont celles de Hou Bei 侯蓓 dans la traduction en chinois de l'ouvrage précédemment cité, la première traduction fait un pur transcodage avec 浪漫 *langman*, la deuxième est une proposition actualisée, faite par la traductrice, Hou Bei.)

1. « Tiny glints of gold make dull hair romantic. »  
→ 「金製的小髮夾讓呆板的頭髮變得浪漫。」  
→ 「金製的小髮夾讓呆板的頭髮變得頗有魅力。」
2. « A new shop [...] on the third floor [...] specializes in women's clothes that are romantic and utilitarian at the same time. »  
→ 「一間新的商店 [...] 專營兼具浪漫和實用的女性服裝。」  
→ 「一間新的商店 [...] 專營兼具裝飾和實用性的女性服裝。」
3. « This explains why, for example, so frequently good writers suffer shipwreck in politics [...] why people otherwise talented conduct a romantic policy, which shows a lack of practical psychology [...] »  
→ 「例如，這解釋了為何有這麼多的優秀作家在政治上翻船 [...] 為何另具別才的人實施了一種浪漫主義的政策，表現出缺乏應用心理學的知識。」  
→ 「例如，這解釋了為何有這麼多的優秀作家在政治上翻船，為何另具



別才的人實施了一種徒勞無功的政策，表現出缺乏應用心理學的知識。」

4. « There is, secondly, among the ideological factors, the conservative heritage of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 whether Lutheran Protestantism, Hegelianism, or romanticism. »

→「其次，在意識形態的因素之中，還有德國政治思想保守的傳統，無論是路德教義、黑格爾主義或是浪漫主義。」

→「其次，在意識形態的因素之中，還有德國政治思想保守的傳統，無論是路德教義、黑格爾主義或是浪漫主義的保守思想。」

5. « I have conceived a romantic idea of educating and adopting her; as we descend into the vale of years our infirmities require some domestic female society. »

→「我曾經有過教育和收養她的浪漫的念頭，因為我們那時陷入了低谷，我們的虛弱得尋求一些來自家庭女性的陪伴。」

→「我曾經有過教育和收養她的空想，因為我們那時陷入了低谷，我們的虛弱得尋求一些來自家庭女性的陪伴。」

Les bonnes propositions de traduction ne reprennent donc pas toujours le terme romant langman. C'est l'actualisation du terme dans son contexte qui permet de trouver une solution adéquate, loin du pur transcodage.

Pour la traduction française, on pourrait avoir recours aux mêmes principes, par exemple (voir l'annexe) :

1. « Ô cette tête, qui avait été belle avec sa pâleur chaude et ses longs cheveux romantiques. »

→「啊，這曾經美麗的頭顱，那樣暖熱的蒼白，還有那一頭浪漫的秀髮。」

→「啊，這曾經美麗的頭顱，那樣暖熱的蒼白，還有那一頭飄逸的秀髮。」

2. « J'ai horreur des couchers de soleil, c'est romantique, c'est opéra. »

→「我很怕看日落，很浪漫，如同歌劇一樣。」

→「我很怕看日落，太狂烈，如同歌劇一樣。」

3. « Ce cimetière, très vaste, est ainsi devenu un lieu remarquable [...] les amoureux y font des promenades romantiques. »

→「這寬廣的墓園成了一處寶地 [...] 情人在此浪漫地散步。」

→ 「這寬廣的墓園成了一處寶地 [...] 情人在此閒適地散步。」

Ces exemples de traduction montrent que pour expliciter la pertinence significative, il faut entrer dans le contexte et choisir le « bon mot ». Le romantique n'est donc pas toujours 浪漫 *langman*. Ces quelques exemples de traductions contextualisées démontrent par ailleurs à quel point « romantisme » et 浪漫 *langman* peuvent être dissociés, du moins à l'écrit.

L'étude du terme « romantisme » pourrait ainsi se poursuivre : comment les autres pays non-européens, tout autant éloignés de l'esprit du romantisme, perçoivent-ils cette valeur « romantique » ? Par exemple le Japon, où la francophilie et la curiosité pour l'Europe sont prégnantes.

**Traduisibilité et intraduisibilité**  
**Une étude interculturelle du concept de romantisme**

**Annexe :**

	Définition	Usage / Exemple	Langue *
1	qui évoque l'atmosphère ou les personnages d'un roman par son caractère fortement imaginaire (1675)	<i>Je m'étais fait, du cloître, de sa solitude et de son silence, les idées grandes ou romantiques que mon active imagination pouvait enfanter.</i> <sup>7</sup>	Français, anglais, allemand
2	qui évoque les descriptions des romans par son charme pittoresque (1776)	<i>Des nymphes et des satyres chantent dans une grotte qu'il faut peindre bien romantique, pittoresque.</i> <sup>8</sup>	Français, anglais, allemand
3	qui trouve son inspiration dans le Moyen Âge, la chevalerie, le christianisme (1784)	<i>Selon une femme de génie, qui, la première, a prononcé le mot de littérature romantique en France, cette division qui a précédé l'établissement du christianisme.</i> <sup>9</sup>	Français
4	qui présente les caractères du romantisme (courant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 qui se rattache à l'esprit, au temps du romantisme (1807)	<i>À Londres [...] Chateaubriand [...] s'imprègne des grands thèmes romantiques qui sont à la racine de son génie, la beauté de la nature, le déisme, la mélancolie de l'éphémère, la croyance aux fantômes.</i> <sup>10</sup>	Français, anglais, allemand
5	qui évoque la pâleur, la longue chevelure, le costume, etc. des romantiques	<i>Ô cette tête, qui avait été belle avec sa pâleur chaude et ses longs cheveux romantiques.</i> <sup>11</sup>	Français

<sup>7</sup> Madame Roland, *Mémoires particuliers*, t. 1, 1820 [1793], p. 34.

<sup>8</sup> Chénier, *Bucoliques*, 1794, p. 251.

<sup>9</sup> Hugo, *Odes et ball.*, 1828, p. 11.

<sup>10</sup> Morand, *Londres*, 1933, p. 191.

<sup>11</sup> Verlaine, *Œuvres complètes*, t. 5, Confess., 1895, p. 166.

6	qui évoque l'esthétique de l'époque romantique, notamment ses jolies un peu mièvres	<i>Le mauvais goût allemand, qui étale aux devantures des pâtisseries de Bâle de romantiques pièces montées.</i> <sup>12</sup>	Français, allemand
7	qui évoque les sites, les moments particulièrement recherchés des romantiques, les objets privilégiés de leurs descriptions	<i>J'ai horreur des couchers de soleil, c'est romantique, c'est opéra.</i> <sup>13</sup>	Français
8	qui a ou qui dénote un tempérament sentimental, passionné, une propension marquée à la rêverie mélancolique, à l'inquiétude métaphysique	<i>Ce cimetière, très vaste, est ainsi devenu un lieu remarquable [...] les amoureux y font des promenades romantiques.</i> <sup>14</sup>	Français
9	[péj.] qui manque de réalisme, qui fait prédominer le sentiment, l'idéal sur les considérations pratiques	<i>Hubert a décidé de s'engager pour l'Indochine. C'est sans doute une romantique vue de l'esprit.</i> <sup>15</sup>	Français, anglais, allemand

Cette case indique les sens existant dans chacune des langues

<sup>12</sup> Lorrain, *Sens. et souv.*, 1895, p.272.

<sup>13</sup> Proust, *Sodome*, 1922, p. 812.

<sup>14</sup> L. de Vilmorin, *Retour Érica*, 1946, p. 11.

<sup>15</sup> Vialar, *Bête de chasse*, 1952, p. 115.

## Références bibliographiques

### Français

- Fedorov, A. (1953), *Introduction à la théorie de la traduction*, Moscou. *Le Petit Larousse* (2008), Paris : Larousse.
- Martin, J. (1982) : « Essai de redéfinition du concept de traduction », *Meta : journal des traducteurs /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vol. 27, n° 4, p. 357-374. (voir aussi <http://id.erudit.org/iderudit/003588ar>)
- Mounin, G. (1976), *Linguistique et traduction*, Bruxelles.
- Oséki-Dépré, I. (1999), *Théories et pratiques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Armand Colin, p.113.
- Söll, L. (1971) : « Traduisibilité et intraduisibilité », in *Meta : journal des traducteurs /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vol. 16, n° 1-2, 1971, p. 25-31. Voir aussi le site : <http://id.erudit.org/iderudit/004199ar>
- Sumner-Paulin, C. (1995) : « Traduction et culture », *Meta : journal des traducteurs /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vol. 40, n° 4, p.548-555. (voir aussi <http://id.erudit.org/iderudit/003802ar>)
- 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1971-1994), v.14, Paris : CNRS.

### Anglais

- Barzun, J. (2001) : *From dawn to decadence*. New York, Turtleback Books.
- (1975) : *Classic, romantic and modern*.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lz-Manttari, J. (1984) : *Translatorische Handeln, Theorie and Method*, Helsinki.
-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1987), Essex (England) : Longman.
- Nida, E. (1964) :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 Noam Chomsky (1965) :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Nord, C. (1991) :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Amsterdam Atlanta, GA.
- Shaw, R.D., (1988) : *Transculturation : The Cultural Factors in Translation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Tasks*, William Carvey Library, Pasadena, California.
-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89),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enuti, L. (1991) : “Translation as a Social Practice ; or, The Violence of Translation”, Papers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Humanistic Dilemmas : Translation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6-28 September, Now York : State University.

### **Allemand**

*Duden Das große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zehn Bänden.* 3., völlig neu be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 Herausgegeben vom Wissenschaftlichen Rat der Dudenredaktion. Mannheim/Leipzig/Wien/Zürich: Dudenverlag, 1999.

*Brockhaus-Wahrig Deutsches Wörterbuch in sechs Bänden.* Herausgegeben von Gerhard Wahrig, Hildegard Krämer und Harald Zimmermann. Wiesbaden/Stuttgart: F.A. Brockhaus /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0–84.

### **Chinois**

《大辭典》(1985)，臺北市：三民。

《中文大辭典》(1973)，臺北市：華岡。

陳虹娟 (2009)，〈文化差異和不可譯性〉，《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 29 卷，第 10 期，頁 102-103。

李晨 (2009)，〈文化預設中幾種不可譯的情況〉，《天津市經理學院學報》，第 4 期，頁 57-58。

郭建中 (2003)，《文化與翻譯的情況》，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賈克·巴森 (2006)，《從黎明到衰頹》，臺北市：貓頭鷹。

---- (2005)，《古典的，浪漫的，現代的》，侯蓓譯，江蘇教育出版社。

**【Résumé】**

La traduction est un acte de communication qui permet à un émetteur de communiquer un message à un récepteur ne parlant pas la même langue. Or, certains termes imposent néanmoins un transcodage du fait de leur forte charge sémantique. Tel est le cas du terme « romantisme » notamment, objet du présent article. Pourquoi avoir choisi d'étudier ce terme en particulier ? Parce qu'il fait apparaître à l'évidence un problème de communication récurrent entre locuteurs taïwanais et chinois d'une part, et locuteurs français d'autre part. Dans la première partie de notre exposé, nous évoquerons les problèmes rencontrés actuellement dans des situations de communication et par la suite, nous analyserons les définitions données par les principaux dictionnaires unilingues en chinois, français, anglais et allemand, afin de cerner les significations données à ce terme et à ses dérivés lexicaux majeurs dans chacune de ces langues. Par cette étude, nous espérons d'une part pouvoir approcher avec davantage de précision le fossé interculturel existant entre les Français et les Taïwanais quant à ce concept de romantisme si présent à Taïwan, d'autre part pouvoir engager une réflexion sur le problème de l'intraduisibilité liée à l'interculturel.

**【Mots-clés】**

traduction, traduisibilité, intraduisibilité, communication, message, code, transmission, interculturel, romantisme

# La pluralité de l'étude du voyage et du roman dans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et littéraire

楊淑女/ Shu-Nu Yang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助理教授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Yu Da University

## 【摘要】

爲了繼續發展文化策略教學，本文將邁進多元文化與跨學科，結合小說及旅遊主題之教學法。

首先根據預估，文化創意將是最有前景產業。將文化融入語言，將是結合語言學習與文學文化的複數學習。其次根據調查，臺灣法語學習者的動機傾向旅遊方面。如果旅遊與文學結合，所有相關課程著重多元文化習得，學習者可發展跨學科能力，亦將負有傳承多元文化的使命。

## 【關鍵詞】

多元文化、法國文學、小說、旅遊、教學法、教育、法語、文化創意

## 【Abstract】

For continuing to develop the cultural strategy in the French teaching, I move this strategy toward the multi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he themes such as travel and the novel in the cultural and literary creation.

First, according to the prevision, cultural creation industry is the most popular in the futur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teachers, we could associate the language with the culture in the class in which the language learning combines language cultural and literary creation.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Taiwanese learners are motivated by the travel for learning French. So all activities and references concerned in class could constitute the pedagogic method.

This teaching strategy is toward multicultural acquisition, and the learners develop their interdisciplinary competence through the plurality study. And the



objective of French course is to organize with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o take charge of the mission of the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long term.

**【Keywords】**

multi-culture, French literature, novel, travel, pedagogy, teaching, cultural creation

## 1. Introduction : La pluralité de l'espace culturel

D'après Richard Dawkins (1941-), par rapport au gène qui reproduit les créatures de l'univers, le mimeme (similaire à 'même') est considéré comme la ressource de la réplication de la culture humaine. Cette réplication d'une mémoire à une autre mémoire est une sorte de transmission d'une génération à une autre génération comme des gènes qui perpétuent une race.

La langue fait partie de cette réplication culturelle chez la tribu et chez le peuple, même entre les différents peuples.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secondes prend en charge cette transmission culturelle et langagière d'une personne à une autre personne, d'un pays à un autre pays et d'une génération à une autre génération. En Asie, l'apprentissage des langues secondes vise à promouvoir les échanges et la communication entre les pays différents. L'apprentissag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 exemple a en général pour objet d'enrichir amplement la connaissance pluriculturelle et plurilinguistique des apprenants. Comme 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 a bien écrit : « Si on voulait comprendre l'homme, éviter de s'enfermer dans l'introspection, ou se contenter de considérer une seule société- la nôtre-, (...) je voulais qu'on se penchât sur les expériences culturelles les plus différentes et les plus éloignées de la nôtre. »<sup>1</sup>

Si nous regardons en arrière l'histoire humaine, la culture et la langue ne sont jamais en uniformité. La diversité agrandit par contre l'espace langagier et culturel. C'est ainsi que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secondes peut apporter une contribution à l'humanité. A notre époque, la mondialisation nous fait réfléchir sur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secondes. A Taïwan, comme au Japon, l'anglais est prépondérant dans l'apprentissage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Depuis l'école primaire jusqu'à l'université, il est obligatoire d'apprendre l'anglais pour communiquer avec les étrangers, pour s'informer sur les messages du monde et pour réussir sa carrière. De cette façon, les apprenants ne sont pas toujours attirés par cette langue ou par cette culture. Souvent, des apprenants chinois ou taïwanais ont du mal à comprendre et se sentent obligés d'apprendre l'anglais. Ils n'ont pas de choix.

Inévitablement c'est la puissance du pays qui décide de la prépondérance de la langue, mais qui ne peut pas décider de l'importance des autres langues dans le

---

<sup>1</sup> Lévi-Strauss C., *De près et de Loin*, P.106

monde. Grâce à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secondes, la diversité langagière et culturelle nous fait atteindre l'interaction communicative. C'est-à-dire, nous rendons moins possible de communiquer dans une seule langue. L'anglais peu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intermédiaire communicatif dans le commerce, dans les domaines spécifiques ou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mais il ne peut jamais remplacer l'interaction directe entre la langue maternelle et la langue cible. Car sans la troisième langue, nous ne parvenons pas à communiquer au plus haut niveau.

J'insiste donc sur l'interaction directe en communication langagière. Elle permet d'avoir la connaissance directe du pays cible. Nous devons prendre en considération parallèle les autres langues avec tolérance et respect. La culture est un arbre de vie. Elle pousse de la terre avec tous les branches qui se nourrissent de la même racine et qui respirent le même air du ciel. Les espaces culturels de tous les peuples ont la même racine qui présente l'originalité de la culture mondiale et tous font partie de la culture du monde. L'interaction de communication à la base de cette égalité et de la relation de l'espace culturel est conçue comme une étude importante à faire sur l'environnement de l'humanité.

Revenant sur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secondes, comme j'ai fait une recherche sur la stratégie culturelle dans l'orientation de l'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pour des étudiants universitaires qui choisissent le cours de français à option libre et pour des stagiaires dans des écoles privées, j'ai cité que beaucoup d'étudiants taiwanais veulent apprendre le français pour des raisons différentes. D'après les questionnaires : c'est la musicalité de la langue, la chanson, le cinéma, la mode, le football et la cuisine. En ce moment, les jeunes ont l'occasion de connaître les autres langues grâce à la diversité culturelle, aux médias et a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 L'image de la France dans le monde se manifeste par la richesse et la variété de sa culture.»<sup>2</sup>

Cette recherche a pour but d'orienter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vers l'étude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sens actif et créatif. Cela permet aux apprenants la mise en oeuvre de leurs acquis dans des cas concrets dans le cadre de travaux pratiques de synthèse, et dans l'application du français dans un voyage d'étude, mais cela nous permet également de concrétiser l'association entre la localisation et la mondialisation

---

<sup>2</sup> Shu Nu Yang, *La stratégie Culturelle dans l'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p. 136

en perspective.

J'ai cité également dans le texte à propos de la stratégie culturelle, que si l'on choisit celle que l'on ne pratique pas, la motivation doit être étudiée d'une autre manière : le besoin d'échange culturel, et l'appréciation personnelle prime sur l'utilitarisme: Dans ce cas, je souligne deux études interdisciplinaires de cette interaction culturelle qui sont donc marquées ci-dessous :

1.1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 Elle nécessite l'inter-connexion dans le contexte de l'originalité culturelle pour créer la pluralité de l'espace culturel.

1.2 L'étude du voyage et du roman: C'est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et la pluralité des études touristiques et littéraires.

Ainsi, en mettant l'accent de la stratégie culturelle dans la pédagogie, je propose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intégrée dans le cours du français. En priorité, c'est le voyage d'étude qui pousse à faire cette recherche. Et à partir de cette étude, nous faisons toutes les activités créatives et littéraires pour que les apprenants se trouvent dans le centre de son propre intérêt pluriculturel en développant leur compétence personnel.

## **2. La pluralité dans le voyage**

Avant de traiter le sujet sur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en thème de voyage, nous allons parler du voyage d'étude dans la postmodernité. Cette dernière se caractérise par la pluralité de l'espace et du temps. John Tomlinson (1932–2005) traduit la complexité de connexion dans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1999), et David Harvey (1935-) relève la métaphore de la compression de l'espace-temps. Anthony Giddens (1938-) pense également que la modernité fait changer toute relation entre le temps et l'espace. Puisque la distance spaciale ne pose plus de question pour la communication grâce à tous les moyens technologiques, nous recevons tous nos messages sur le champ en vivant dans la pluralité de l'espace et du temps qui est compressée à proximité de nous.

James Clifford (1945-) a bien dit que la culture est un voyage. Car la mobilité donne naissance à une culture, par laquelle la création du système symbolique et langagier se réalise dans un échange actif. Ainsi la culture est aussi un symbole de la

route. Nous parcourons avec nos jambes la route et nous agrandissons l'espace de notre mémoire avec notre regard. La mobilité de notre action construit notre espace de l'humanité.

On peut dire que le voyage crée la culture. Depuis la tour de babel, les hommes sont dispersés dans le monde et ils n'arrêtent pas de se déplacer d'un endroit à un autre en formant les tribus et en établissant les communautés. Tous ces voyages sont des noyaux de vie qui font pousser la civilisation non seulement dans le système social mais également dans le système langagier. A travers ces voyages, la pluralité de l'espace et du temps forme la pluralité de la culture et de la langue. A l'époque ancienne, le voyage avait pour but d'aller à la guerre, de passer la vie de l'expulsion ou de faire l'exploitation. A notre époque, le voyage atteint le plus haut niveau d'échange dans tous les domaines avec ses multi-fonctions. C'est une étude importante à faire pour l'homme postmoderne, car le voyage porte le symbole de la pluralité comme ci-dessous :

1. Le symbole de la route et de la connexion.
2. Le symbole de la liberté.
3. Le symbole de la mobilité et du dynamisme
4. Le symbole de l'immobilité et de la contemplation

Antoine Berman a cité dans *l'Epreuve de l'Etranger* que chez l'homme, le voyage n'est pas pour limiter « les angles de son individualité, mais pour élargir sa vision, donner à son esprit plus liberté et de pluralité interne... »<sup>3</sup> En l'occurrence, la mobilité du regard devient une force dynamique du monde. Elle lie un espace à un autre espace, et une histoire à une autre histoire. Avec l'esprit spontané et l'imagination sans limite, nous devenons le créateur de la pluralité de l'espace et du temps. Le voyage porte également l'image de l'immobilité et de la tranquillité, durant lequel la contemplation nous conduit à porter la réflexion sur nous-mêmes et sur la vie. Par exemple, en prenant l'avion ou le bus, nous sommes obligés de nous asseoir dans un espace serré ou de regarder l'extérieur par la fenêtre. Pour un certain nombre de voyageurs, sortir de chez eux n'est pas pour animer la vie mais pour trouver le

---

<sup>3</sup> Antoine Berman, *l'Epreuve de l'Etranger*, p.80

calme intérieur. Celui-ci pourrait être une force suprême qui redonnerait de la vivacité à la vie.

Selon mon sondage sur la motivation de l'apprentissag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l'étude de voyage attire les apprenants taïwanais plus que les autres études pour plusieurs raisons :

1. L'étude interdisciplinaire comprend l'art, la géographie, l'histoire, la littérature.
2. Les sujets différents comprennent le moyen de transport, la cuisine, la mode, les achats, la fête et la spectacle.
3. La connaissance interculturelle et la comparaison culturelle entre le pays natal et le pays visité.
4. L'enrichissement spirituel ainsi que matériel.
5. L'agrandissement de la mémoire spatiale par le regard et par la caméra.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secondes devrait adapter une méthode pour réaliser cette notion dans l'orientation d'apprentissage.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et langagière réalise cette application. Face à la tendance de mondialisation, nous nous demandons comment le local peut s'adapter à la mondialisation et comment nous pourrions bien profiter de la proximité de la pluralité spatiale et temporelle ? Taïwan est une île où il est facile de s'enfermer et en même temps d'être changé par l'influence extérieure. Depuis des années, le gouvernement a réclamé la localisation et l'apprentissage obligatoire des dialectes à l'école primaire. Nous avons envie de trouver les moyens d'associer la globalisation et la localisation. C'est encore un long voyage à faire. Pourtant,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à Taïwan que je propose a pour objet de trouver la méthode de cette association, et de l'intégrer dans la classe. De cette manière,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s'adapte à la postmodernité. Nous disons que l'homme postmoderne dans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secondes se manifeste par une grande ouverture et dépasse un transfert référentiel vers une action de structuration.

### **3. La pluralité dans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D'après l'idée originale venue de mes deux recherches précédentes : *Le développement du projet de la création langagière à travers la culture humaniste en thème de voyage* et *Le développement du projet de la création langagière à travers la structure de l'image*, j'envisage de développer une méthode qui fasse partie intégrante du projet pédagogique dans le cours qui dure pendant un an et qui est constitué de quatre étapes :

1. Des études théoriques, des travaux pratiques concernant les références documentaires sur le thème du voyage en France comme les endroits touristiques, les célébrités, les spécialités et l'histoire locale ;
2. Des travaux pratiques concernant les références documentaires sur le thème du voyage à Taïwan comme les endroits touristiques, les célébrités, les spécialités et l'histoire locale ;
3. La comparaison entre les deux villes et l'atelier d'écriture à propos de l'adaptation de l'histoire ou des nouvelles locales en toutes sortes de formes littéraires ;
4. Enfin, la dernière étape consiste en une création langagière et culturelle comme une carte postale, un manuel touristique, un souvenir, un dessin animé ou la création d'un website. Cela permet de prendre l'initiative d'associer la langue et la culture dans l'enseignement et l'apprentissage.

Avant de commencer les travaux pratiqu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choisir deux villes ou deux régions plutôt similaires d'un certain côté. L'une se situe à Taïwan (Taïpei par exemple), l'autre se situe en France (Paris par exemple). De cette façon, ils peuvent faire eux-mêmes le développement du plan touristique. Je les choisis comme exemple pour quelques raisons :

1. Toutes les deux villes se situent au nord du pays.
2. Elles sont les capitales du pays.
3. Il y a des musées, des grands boulevards et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4. Beaucoup de spectacles et de personnages célèbres.
5. Elles se caractérisent par la diversité culturelle.

## 6.Des histoires et des nouvelles à raconter.

La similarité entre ces deux villes nous facilite les travaux pratiques pour l'apprentissage des langues secondes. Ils consiste en quatre étapes proposées ci-dessous :

### Première étape :

1. Rédiger des références documentaires sur la ville de Paris.
2. Collecter des histoires locales et intéressantes pour les réécrire.

### Deuxième étape :

1. Rédiger des références documentaires sur la ville de Taïpei.
2. Collecter des histoires locales et intéressantes pour les réécrire.

### Troisième étape :

1. Faire les cartes de ces deux villes avec les noms, les dessins et les descriptions.
2. Ecrire des nouvelles, des poèmes ou des pièces de théâtre à partir les collections d'histoire locale à Paris et à Taïpei.

### Quatrième étape :

1. Faire de la création touristique comme un souvenir ou une carte postale en référence à votre écriture.
2. Créer un website ou un manuel pour la publicité et la présentation touristique.

Quant à la liste d'entraînement linguistique sur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 la voici ci-dessous :

1. La visite : l'église, le temple, le parc de loisir, le musée, le palais.
2. Le commerce : Le grand marque, la spécialité, le souvenir. .
3. Le personnage : les hommes politiques, le littéraire et l'aristocrate.

Après cette activité de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et langagière, je résume ci-dessous quatre points concernant l'acquisition culturelle et langagièr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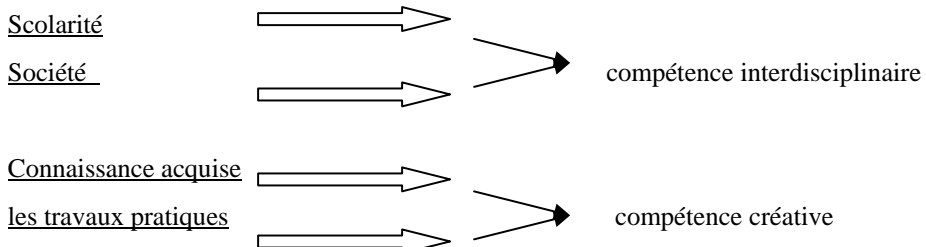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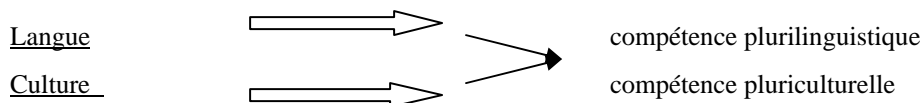
1. Comparer deux espaces éloignés dans les pays différents permet aux apprenants de s'engager dans la pluralité de l'espace.
2. Réécrire les histoires françaises et chinoises permet aux apprenants de vivre dans la pluralité du temps.
3. Faire des créations artistiques et des publicités touristiques permet aux apprenants d'appliquer ceux qu'ils ont appris dans les étapes précédentes.
4.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permet aux apprenants de pratiquer le français et de susciter l'intérêt pour la culture française ainsi que pour la culture de son propre pays.
5. Avec l'atelier d'écriture et celui de la création artistique, la classe ne représente plus simplement un atelier ou une salle de cours mais un chantier du monde où l'on peut travailler avec nos mains dans la pluralité de l'espace-temps.

Finalement, les apprenants doivent remettre leurs devoirs au professeur soit sur papier ou sur un CD. Le professeur peut aussi leur demander de faire des exposés dans la classe.

L'association entre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et la création langagière dans le cours interculturel peut faire des apprenants préparer leur future carrière. D'un côté, l'atelier de la création culurelle intégrée dans le cours fait partie de l'entraînemnt langagier. D'un autre côté,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initiée par l'étude du voyage permet aux apprenants de retrouver l'esprit dynamique et l'imagination authentique. En fin de compte, je conclus cette partie qui constitue les multifonctions de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et langagière dans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secondes sur les trois points ci-dessous :

Figure 1





On pourrait dire que l'homme postmoderne dépasse un transfert référentiel vers une action de structuration. Et les apprenants des langues secondes doivent en plus avoir la capacité de créer sur le plan culturel et langagier pour préparer leurs futures carrières et pour s'enrichir de la connaissance culturelle et langagière.

#### 4. Pluralité dans le cours interdisciplinaire de 3 L -

Le cliché d'exotisme et le champ d'imagologie

Pour réaliser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l'étape est commencée par l'étude du voyage du roman comme les deux mimemes pour la transmission culturelle. D'un côté des professeurs, la méthode pédagogique dans le cours est divisée en trois modèles importants : le modèle culturel, le modèle langagier et le modèle personnel.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have been consistently advanced. Each embraces a particular set of learning objectives for the student of literature. These are: The cultural model, the language model, the personal growth model.”<sup>4</sup>*

De cette façon, deux études censées être les moyens de transmission culturelle et langagière : le roman et le voyage sont proposés ici pour apprendre la langue française dans le cours. A travers le roman et le voyage, les deux études interdisciplinaires qui peuvent être considérées comme les deux mimemes, les apprenants élargissent l'ampleur de leur connaissance pour le pays cible.

Surtout dans les oeuvres romanesques, l'accumulation des noms de lieux, de personnages, d'anecdotes et d'événements historiques enrichit le champ d'imagologie et la connaissance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L'expression lexicale et grammaticale est une fontaine pleine de ressources prête à être exploitée par les professeurs et les apprenants. Spécifiquement, la compétence littéraire peut être formée et associée à la compétence langagière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seconde :

---

4 Carter R., Michael N. Long, Teaching Literature, p.7

*'Our main point here is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creative uses of language in the making of literature and to note that literary competence i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ability to perceive how patterns of language reinforce the message. (...)'<sup>5</sup>*

Trouver le message langagier dans l'oeuvre littéraire est une création culturelle. D'après mon sondage précédent, le voyage est le thème le plus populaire chez les apprenants. Le texte littéraire lié au voyage développe le champ d'imagologie et enrichit la connaissance de culture française. Car « l'image de l'Autre sert à écrire, à penser, à rêver autrement. »<sup>6</sup> Même le cliché d'exotisme sert aussi à être une méthode pédagogique et à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créative chez les apprenants.

Le cliché et le stéréotype, d'un côté, sont beaucoup critiqués à cause des formes figées liées aux médias modernes. Cela ne peut pas éviter les préjugés et peut cacher la vérité derrière l'image ou l'opinion. D'un autre côté, ils sont considérés comme une synthèse de l'expérience humaine qui nécessite d'être présentée explicitement. Nous employons cette synthèse pour la pédagogie des langues secondes qui s'oriente dans le cliché des pays étrangers avec l'expression exotique qui est plutôt positive. « Les cours de français comme moyen de réexploiter les stéréotypes pour les dépasser. »<sup>7</sup> Le champ d'imagologie est donc une manière de dépasser les clichés qui sont réexploités par les professeurs et les apprenants.

A propos du voyage en France, les apprenants taïwanais placent Paris en tête de leur destination idéale. « Ses caractéristiques multinationales, multirégionales et originales attirent les gens, (...). La présence de Paris (...) mesure le degré d'intérêt culturel des apprenants et indique la potentialité de l'enseignement linguistique. »<sup>8</sup> Le cliché d'exotisme joue donc un rôle initial dans l'esprit des voyageurs. Avant d'effectuer le voyage, la destination est déjà remplie par toutes sortes des images

---

<sup>5</sup> Ibid, p.7

<sup>6</sup> Gannier O., *La littérature de Voyage*, p.9

<sup>7</sup> Gras A. et Corbeil S., *Paris sera toujours Paris: L'influence du stéréotype sur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langue seconde au Japon*, p.72

<sup>8</sup> Remi I., *La présence de Paris dans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au Japon: une étude socio-psychologique et didactico-culturelle*, p. 98

venues des livres, des photos, des films ou des journaux. Ce champ d’imagologie facilite l’apprentissage de la langue du pays cible grâce aux lieux, aux personnages et aux histoires qui s’inscrivent préalablement dans la mémoire des voyageurs.

Quant aux oeuvres littéraires, je propose ici deux romans du 19<sup>e</sup> siècle et du 20<sup>e</sup> siècle dans lesquels les événements se déroulent à Paris : *Notre-Dame de Paris* et *Epaves*. D’après mon enquête, A partir des lieux très touristiques comme Notre-Dame de Paris et la Seine, nous donnons la lecture et l’activité concernées aux apprenants dans la classe.

*Notre Dame de Paris* écrit par Victor Hugo est un chef-d’oeuvre mondialement connu. Il donne un éclat grandiose au monument. La notion d’imagologie constitue un élément essentiel dans cette reproduction culturelle en matière d’architecture, d’histoire, d’amour et de personnage. Un autre roman, *Epaves*, écrit par Julien Green dont l’histoire se déroule au long de la Seine montre toute vivacité du fleuve. Même si l’ambiance romanesque n’est pas très gaie, l’image rêveuse et mystérieuse fascine les lecteurs par son unique visage caractéristique.

Pour commencer, l’activité du pré-lecture est destinée à animer l’ambiance de l’apprentissage. Quelques activités proposées dans le cours entraînent les apprenants à lier le texte littéraire avec leur propre expérience de la vie. Dans cette classe de langue-culture-littérature, les études métalinguistiques devient très importante car l’application de la seule notion de ‘l’identité’ comme une étiquette, par exemple, ‘Taïwanais’, ne doit pas mettre obstacle à la connaissance de la diversité des identités. Je propose donc des signes de l’inter-structure, par exemple entre deux villes des pays différents dans le cours de langue-culture comme ci-dessous :

Tableau 1 :

Taïpei	Paris
●Le Musée National de Taïpei	●Le Musée du Louvre
●Le Musée des beaux Arts : Musée d’Orsay	●Le Musée de Taïpei
●Le métro, SNCF, autobus	●SNCF, TGV,
●Les célébrités	●Les lettres, célébrités
●Le spectacle : Légende du Serpent blanc	●Le spectacle : Notre Dame de Paris
●Des restaurants étrangers	●Des restaurants étrangers

**La pluralité de l'étude du voyage et du roman  
dans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et littéraire**

•Le palai présidentiel	•l'Elysée
•Les grands magasins: SOGO, Sinkoa Sanyu	•La Fayette, le Printemps
•Le grand fleuve: Taisui	•La Seine
•Le grand pac publique:Ta An	•Le Jardin de Luxemburg
•Le plus haut bâtiment: 101	•La Tour Eiffel
•Le Temple Longshan	•Notre Dame de Paris

Sans penser à l'antonyme, à la division, à l'exclusion, à la différence ou à la divergence dont nous avons trop parlé depuis longtemps, nous allons donner la redéfinition de la culture car sans l'interaction avec les autres elle serait très limitée. Nous devons considérer la 'biosphère' comme un grand corps organique qui donne naissance à tous les espaces culturels dans lesquels nous explorons le synonyme, la connexion, l'influence, la similarité ou la convergence dans la langue ou dans la culture. Par exemple, les idées communes dans les oeuvres littéraires. Nous retrouverons l'inter-structure de ces signes pour que la vision du monde soit présentée d'une façon cohérente, et que l'étude du pluriculturalisme et du plurilinguisme se cheminera vers la diversité des identités dans l'éducation pour la nouvelle génération.

### **5. Le texte didactique et la répliation pluriculturelle**

Dans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secondes aujourd'hui, l'entraînement linguistique prime de plus en plus sur les cultures éducatives car la connaissanc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littérature n'est pas nécessaire dans le marché d'emploi. Les apprenants n'arrivent pas à exprimer l'idée générale sur la culture cible malgré leurs compétences linguistiques. Avec cette problématique, on propose une étude interdisciplinaire et interculturelle qui converge les trois L : la langue, la culture et la littérature :

*' Language-based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which are designed to develop sensibility to language and an ability to interpret the creative uses of language in establishment of meaning.'*<sup>9</sup>

---

<sup>9</sup> Carter R., Michael N. Long, *Teaching Literature*, p.7

Avec cette genre de texte didactique sur le plan pédagogique, Odile Gannier a cité dans *La Littérature de Voyage* (2001) que le champ d’imagologie avec la représentation cartographique pourra nous offrir le lexique géographique comme ci-dessous :

Tableau 2 :

<i>Notre Dame de Paris</i> : lexique géographique	
Niveau A	Niveau B
Eglise, cathédrale, ville, porte, Châtelet, Bourse, Bastille, Cloche, place, Hôtel de ville, chapelle, statue, édifice,	Architecture, gothique, Moyen-Age, le refuge, palais de Justice, Invalides, saint-Sulpice, Renaissance, quartiers, bourgeois
<i>Epaves</i> : lexique géographique	
Passy, madeleine, parisien, rue Monge, Jardin du Luxembourg	Boulevard, métropolitain, Trocadéro, la Tour Eiffel, Panthéon

Concernant les trois modèles mentionnés ci-dessus, L’exemple suivant montre l’association entre le modèle culturel et modèle langagier :

Tableau 3 :

<i>Notre Dame de Paris</i> : Cathédrale	
Niveau A	Niveau B
Elle est grande. C’est un monument historique. Elle est plus grande qu’une église. Notre Dame est la mère de Jésus.	C’est un endroit où l’on fait la prière. Les gens ont fait des photos devant la place. Des centaines de bougies sont allumées dans la chapelle.
<i>Epaves</i> : La Seine	
C’est un fleuve Elle traverse Paris. Le paysage est très joli Les gens regardent le pont	Il y a beaucoup de cafés sur la rive gauche. Des parisiens se promènent sur le quai. Les touristes ont pris le bateau-mouche pour voir le paysage de la ville.

Pour les apprenants, le récit littéraire devient le texte didactique. D'abord, avec la présence de l'apprenant dans le texte, ce modèle personnel invite à associer deux autres modèles et à associer l'écriture littéraire à l'expérience personnelle :

‘The personal growth model is (...) the overall aim being to motivate the student to read by relating the themes and topics depicted in a literary text to his or her own personal experience.’<sup>10</sup>

Finalement, l'étude littéraire sert à instruire les apprenants qui se réfèrent à leur expérience personnelle pour faire évoluer leur esprit et pour éduquer leur sens de réflexion. :

“Literature can be a special resource for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an aim being to encourage greater sensitivity and self-awareness and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round us.”<sup>11</sup>

Ainsi, à travers le texte littéraire, le professeur travaille avec les apprenants dans l'interaction culturelle et littéraire comme les discussions ci-dessous :

Tableau 4 :

<i>Notre Dame de Paris :</i> Le voyage et les personnages	
Niveau A (en langue maternelle), B	Niveau C
« -Que veut dire ce mot : la Esmeralda ? –Je ne sais pas, dit-elle. –A quelle langue appartient-il ? –C'est de l'égyptien, je crois. (...) Vous n'êtes pas de France ?- Je n'en sais rien. » (p.109) Discussion :	Et la cathédrale ne lui était pas seulement la société, mais encore l'univers, mais encore toute la nature. Il ne rêvait pas d'autres espaliers que les vitraux toujours en fleur, d'autre ombrage que celui de ces feuillages de pierre qui s'épanouissent chargés

---

<sup>10</sup> Ibid. p. 9

<sup>11</sup> Carter R., Michael N. Long, *Teaching Literature*, p.3

<p>Est-ce qu'Esmeralda voyage beaucoup ? Esmeralda est une fille étrangère ?</p>	<p>d'oiseaux dans la touffe des chapiteaux saxons...(…). (p.157) Discussion : Parlez de Quasimodo et de sa façon de voir la cathédrale. Notre Dame de Paris est le symbole spirituel pour les visiteurs ?</p>
<p><i>Epaves :</i> Le voyage et les personnages</p>	
<p>« Elle regarda stupidement sa valise qui portait l'étiquette d'un hôtel de Cabourg. Ce voyage à Cabourg accompli quatorze ans plus tôt, (..) » (p.178) Discussion : Les personnages n'aiment pas voyager ou sortir de la ville. Pourquoi ? Où est Cabourg ? Il est loin de Paris ?</p>	<p>« Ce soir, au bord de l'eau, il sentit vivement tou ce qu'il pouvait y avoir d'inaccessible au fond de son propre coeur ? » (p.46) Discussion : Qu'est-ce que la Seine signifie pour les personnages du roman ? Mentionnez quelques fleuves dans les grandes villes du monde et parlez de leur changement culturel et touristique.</p>

Les professeurs peuvent susciter une « discussion pyramidique » issue de ce sujet de plus en plus vaste. Cela permet aux apprenants d'interagir avec les personnages romanesques dans le texte littéraire, car « on ne peut pas dissocier l'acquisition de connaissances et le développement des processus de pensée. »<sup>12</sup> Le roman est comme un modèle de voyage et que le voyage comme un modèle du roman qui est écrit à la première personne. Toutes les deux études font toutes les deux interactions de sorte qu'elles renforcent la compétence interdisciplinaire de l'apprentissage. Le décroisement de discipline nous donne envie de cultiver le champ d'application beaucoup plus vaste avec ces trois modèles culturels, langagiers et personnels.

Puis les professeurs peuvent prendre les autres romans étrangers ou locaux concernant ces discussions comme le roman chinois *La Forteresse Assiégée* (Qian

---

<sup>12</sup> Legendre M-F., Sens et portée de la notion de compétence dans le nouveau programme de formation, p.20



Zhongshu, 1947), ,les nouvelles taiwanaises : *Gens de Taipei*, (Bai Yianyong, 2000) le roman espagnole *Don Quixote* (M. De Cervantes Saavedra, 1615). Les professeurs peuvent conseiller aux apprenant de les lire à l'avance. La lecture littéraire contient plusieurs contextes qui mobilisent les compétences génériques : « La lecture et l'écriture constituent, au même titre que la communication orale, des compétences qui sont appelées à devenir de plus en plus transversales. »<sup>13</sup> La compétence transversale est formée par la capacité référencielle et par l'élargissement de la connaissance. L'exemple est montré ci-dessous :

Tableau 5 :

Sujet	Question
Evolution de la mentalité	Est-ce que le voyage change la mentalité des personnages ?
Mondialisation et localisation	Aux Cours des Miracles, le petit groupe représente un monde pluriculturel. Il prévoit le conflit entre la mondialisation et la localisation ?
Adaptation des imigrés ou des voyageurs	Les gens qui déplacent beaucoup comme Esméralda s'adaptent-ils à la vie et à la mentalité locale ?
Modernisation urbaine	L'ennui chez les personnages d' <i>Epaves</i> est suscité par leur immobilité ? Parlez de la façon de vivre dans la ville moderne de gens chez vous.

### **Conclusion**

Le texte sur l'étude littéraire lié au voyage nous fait plonger dans le discours de fascination, dans des situations de communication virtuelle ou réelle. En plus, le text littéraire marqué par l'expression affective, descriptive, narrative, réflexive nous donne encore plus envie de voyager et de contacter le monde étranger comme la France. D'après Claude Lévi-Strauss, il a décrit que la recombinaison génétique joue un rôle comparable à celui de la recombinaison culturelle dans l'évolution des formes de vie et que le patrimoine culturel évolue beaucoup plus rapide que le patrimoine génétique. Cette stratégie pédagogique qui prend en charge la répllication culturelle

---

<sup>13</sup> Ibid. p.20

s'orienter vers le monde plurilinguistique et pluriculturelle et préparer une ouverture plus perspective en avenir.

## Bibliographie

- Berman A., (1984),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Paris : Gallimard.
- Carter R., N. Long M., (1991) *Teaching Literature*, Longman: England.
- Coste D., Moore D., et Zarate G. (1998), « Compétence Plurilingue et Pluriculturelle », *Apprentissage et usage des langues dans le cadre européen les langues, Le français dans le monde. Recherches et applications*.
- Dawkins R., (1995), traduit par Tsao Shu Miao, *The Selfish Gene*, Taipei: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
- Gannier O., (2001), *La littérature de Voyage*. Paris :Ellipses.
- Gantier H., (1973), *L'enseignement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Paris : P.U. de France.
- Gosselin M., (1990), *Julien Green*, Paris : Roman 20-50.
- Goulemot J. M., (2001), *Le Grand Tour comme Apprentissage*, « Les Ecrivains Voyageurs », Magazine Littéraire, No.432, Paris
- Gras A. et Corbeil S., « Société Japonaise de Didactique du Français », *Paris sera toujours Paris: L'influence du stéréotype sur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langue seconde au Japon*, Vol. 3, no. 2, 2008.
- Green J., (1985), *Epaves*, Paris: Ed. Seuil.
- Hugo V., (2002), *Notre Dame de Paris*. Paris : Classiques Universels.
- Legendre M-F., (2001), « L Revue de l'Aqefles » : Reflets du 22<sup>e</sup> Contrès, *Sens et portée de la notion de compétence dans le nouveau programme de formation*, Vol. 23, no. 1.
- Lévi-Strauss C., (2001), *De près et de Loin*, Paris : Odile Jacob.
- Nikou T., (2002), *L'interculturel : une autre perspective pour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Montpellier :Université Montpellier-III, juin 2002.
- Remi I., (2009), « Revue Japonaise de Didactique du français », *La présence de Paris dans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au Japon: une étude socio-psychologique et didactico-culturelle*, Vol. 4, no. 2, Tokyo : Société Japonaise de Didactique du Français.
- Tomlinson J., *Globalisation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Yang S. N., (2009), « Revue Japonaise de Didactique du français », *La stratégie Culturelle dans l'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Vol.4, n.1, Tokyo : Société Japonaise de Didactique du Français.

**【Résumé】**

Pour continuer à développer la stratégie culturell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j'avance cette stratégie vers l'étude pluriculturelle et interdisciplinaire comme le thème du voyage et du roman avec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et littéraire.

Premièrement, selon les prévisions, l'industrie de la création culturelle est la plus prometteuse pour l'avenir. En tant que professeurs du français, nous pourrions lier la langue à la culture en matière de création dans un cours destiné à associer apprentissage langagier et création littéraire ou culturelle.

Deuxièmement, selon le sondage, les apprenants sont plutôt motivés par l'étude du voyage pour apprendre le français. Si le voyage se lie à la littérature, toutes les activités concernées constituent une méthode pédagogique, cette stratégie de l'enseignement s'oriente dans l'acquisition pluriculturelle. Les apprenants développent leur compétence interdisciplinaire dans la pluralité de l'étude, et ils se chargeront ainsi de la mission de la perpétuation pluriculturelle à long terme.

**【Mots-clés】**

pluriculturel,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roman, voyage, pédagogie, enseignement, français, création culturelle

# La sensualité et son expression poétique dans les *Folastries* de Ronsard

舒卡夏 / Katarzyna Stachura

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程 法語組助理教授

French,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European Languag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摘要】

洪沙的詩作《愛情》受佩脫拉克主義影響至深，然而他並沒有自限於模仿這個文藝復興時期廣為流傳的模範，其作品《嬉戲》可為最佳例證。本文主旨在於指出洪沙創作的演化，說明《嬉戲》此類型詩作的起源，並評論洪沙因書版《嬉戲》所引起的醜聞。隨後進行詩作的分析以說明洪沙對於官能之樂的新概念與表達方式，以發掘其較不為人知的創作面向與豐富性。

## 【關鍵詞】

洪沙、文藝復興時期詩歌、官能之樂、愛情、嬉戲

## 【Abstract】

Pierre de Ronsard owes his status of one of the greatest French writers to his most famous work, *Amours*, which was inspired by petrarkism. However the love lyric of the master is not reduced to the model of writing, widely practised in Renaissance. In fact, a new orientation gives birth to the new collection of poetry called *Folastries* (1553). The current article offers to trace the Ronsard's evolutions. It also show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literary genre called *folastrie*. The article informs about the scandal in Ronsard's literary surroundings caused by the publication of *Folastries*. Finally, it concentrates on the texts of the collection: their analysis and numerous quotations are to reflect the new concept of Ronsard's sensuality and their literary form. The aim of this contribution is to present unknown aspect of Ronsard writings and prove how diverse they are.

**【Keywords】**

Ronsard, Renaissance poetry, folastrie, sensuality, love

## **Introduction**

Pierre de Ronsard est appelé « prince des poètes ». S'il est considéré comme l'un des plus grands écrivains français, c'est, à n'en pas douter, grâce à ses oeuvres les plus connues, telles que *Les Odes* (1550) ou *Les Amours* (1552), inspirées du pétrarquisme. Ce dernier présente quelques contraintes que les imitateurs se devaient de respecter, notamment la sublimation de l'amour et la souffrance du poète provoquée par l'inaccessibilité de la femme aimée. Mais, la lyrique amoureuse du maître vendômois est loin de se limiter à ce modèle d'écriture largement répandu à la Renaissance. En effet, l'année 1553 sera le théâtre d'un revirement de Ronsard, qui délaissera son pétrarquisme de commande pour adopter un ton plus libre, voire licencieux. Cette nouvelle orientation aura pour fruit un opuscule intitulé *Folastries*. Le travail que voici se propose de retracer les grandes lignes de cette évolution de Ronsard. Il s'efforcera de défini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 genre de folastrie, pratiqué par les poètes gréco-latins, notamment Catulle. Il s'attachera ensuite à rendre compte du scandale qu'a provoqué le *Livret de Folastries* dans le milieu littéraire de Ronsard ainsi que d'une tentative de celui-ci de faire oublier cet « écart de conduite ». On passera enfin en revue les textes du recueil en en citant de nombreux vers afin de mettre en lumière la nouvelle conception de la sensualité ainsi que son expression poétique chez Ronsard. Le but de cette contribution sera de faire découvrir un aspect de la poésie de Ronsard peu ou pas connu des lecteurs et de démontrer par là même la richesse de sa création littéraire.

### **1. Le pétrarquisme : conception de l'amour dominante au XVI<sup>e</sup> siècle**

La Renaissance puise dans la tradition ancienne, « qui vient des troubadours comme des trouvères, de chanter, avec les élans de la passion amoureuse, beautés et vertus d'une femme élue entre mille et de qui le poète le plus épris n'attend rien, que les émotions du rêve et quelquefois l'aumône de la renommée »<sup>1</sup>. Cet amour élevé n'a rien à voir avec les tumultes de la chair, et peut aller jusqu'à la divinisation de la femme, comparée quelquefois au culte de la Vierge Marie. Au temps de Ronsard, cette conception de l'amour a un impact important sur les écrivains de l'époque. *La 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manifeste de la Pléiade publié en 1549,

---

<sup>1</sup> Pierre de Nolhac, *La vie amoureuse de Pierre de Ronsard*, Paris, éd. Flammarion, 1926, pp. 28-29.

expose clairement les idées de la brigade en matière d'imitation : pour chaque genre littéraire réhabilité, il s'agit d'imiter les Anciens ou les Italiens. Ainsi, François Pétrarque, un poète italien du XIVe siècle, devient principale source d'inspiration pour toute une génération de poètes renaissants.

Son oeuvre emblématique, *Canzoniere*, paraît en français en 1548. Ce recueil de sonnets composés en l'honneur de sa dame, Laure, célèbre une conception courtoise de l'amour qui influencera considérablement la poésie amoureuse des siècles suivants. Le poète y raconte un itinéraire amoureux, ponctué par des étapes qui se constitueront par la suite en une véritable topique amoureuse appelée à être imitée par ses successeurs. Le parcours obligé de l'amour pétrarquiste contient nécessairement un *innamoramento* (le choc de la première rencontre), qui donne naissance à un amour passionnel se déroulant dans la servitude absolue de l'amoureux à sa dame ; le portrait physique et moral de la dame ; la déclaration d'amour réitérée ; le mal d'aimer provoqué par l'inaccessibilité de la bien-aimée ; enfin la sublimation de cet amour en vertu chrétienne, délivré des désirs charnels<sup>2</sup>. Métaphore, synecdoque, allégorie, antithèse, oxymore, accumulation ou hyperbole constituent une rhétorique multiple et sophistiquée au service des transports de cet amour inaccessible<sup>3</sup>.

C'est en disciple de Pétrarque que Ronsard entre dans la poésie française, pour accéder, en peu de temps, au statut prestigieux de « prince des poètes ». Comme l'écrit Françoise Joukovsky, « les premiers essais de Ronsard, les *Odes* de 1550 et les *Amours* de 1552, relevaient d'un idéal fort ambitieux. Le poète écrivait sous l'emprise de cette force divine qu'est la fureur apollinienne, préférait les sujets nobles, tels que la gloire des héros et des princes ou les souffrances de l'amour, et élaborait une langue poétique différente du langage quotidien »<sup>4</sup>.

---

<sup>2</sup> Pour de plus amples explications, voir : Véronique Denisot, *Les Amours de Ronsard*, Paris, éd. Gallimard, 2002, le chapitre « Pétrarque et le pétrarquisme », pp. 19-25.

<sup>3</sup> Ici aussi, on consultera avec profit l'introduction de l'édition des *Amours* et des *Folastries*, établie par André Gendre, Paris, éd.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93.

<sup>4</sup> Pierre de Ronsard, *Le Bocage, Les Meslanges*, éd. de Françoise Joukovsky, Paris, éd. Flammarion, 1995, introduction, p. 16.



## 2. Revirement de Ronsard

Néanmoins, Ronsard changera vite la direction de ces tendances littéraires : il ramènera sur terre cet amour qui tendait vers les cieux. Il reconnaîtra la suprématie d'un « carpe diem » terrestre par rapport à la glorification d'une seule image féminine à la Pétrarque et chantera une sensualité à peine voilée, aux accents nouveaux, étrangers aux élégiaques de la latinité ou de l'humanisme. Il veut en effet apprendre aux gens que les amours doivent s'exprimer dans un autre langage que celui de l'amour pétrarquiste. La nouvelle attitude du maître vendômois se traduit par un net épicurisme. Nous savons, en effet, que le poète ne se bornait pas à un seul amour terrestre. « Il y aura dans sa vie Marie la villageoise, Genève, la bonne fille de Paris, la hautaine Isabeau de Limeuil, et cette grande dame qu'il chantera sous le nom d'Astrée, et celles qu'il aura sans les chanter »<sup>5</sup>. Bien qu'au début il soit gratifié du titre tant envié de « Pétrarque français », on ne tardera pas à l'entendre chanter la palinodie :

Je veux aimer ardemment  
Aussi veux-je qu'également  
On m'aime d'une amour ardente.  
Les amants si froids en été,  
Admirateurs de chasteté,  
Et qui morfondus pétrarquisent  
Sont toujours sots <sup>6</sup>....

C'est une volte-face des plus osées, au regard de l'esprit platonicien dominant de l'époque. Voici comment Pierre de Nolhac conclut ce revirement : « Ronsard se félicite d'avoir rompu avec les pédants pour se faire entendre des amoureux »<sup>7</sup>. Ronsard semble donc évoluer vers une conception de l'amour moins ambitieuse et plus « terrestre », un amour plus sensuel, et qui veut être payé de retour. Il est

---

<sup>5</sup> Pierre de Nolhac, *La vie amoureuse de Pierre de Ronsard*, op. cit., p. 41.

<sup>6</sup> Cité d'après Pierre de Ronsard, textes choisis et commentés par Pierre Villey, Paris, éd. Plon, 1914, p. 123.

<sup>7</sup> Pierre de Nolhac, *La vie amoureuse de Pierre de Ronsard*, op. cit., p. 65.

maintenant soucieux du « vulgaire », il n'apprécie plus, chez un poète, une attitude altière et renonce à voir dans l'obscurité et le pédantisme des gages de profondeur. Pierre Villey a pu dire en ce sens : « Au fond [Ronsard] avait toujours estimé que c'était une sottise que de chanter pendant tant d'années une maîtresse qui ne payait pas son poète de retour. Nous l'avons entendu autrefois se moquer des pétrarquaisants. Un amour sincère, juvénile, sensuel devait bientôt le dégager plus complètement encore de son pétrarquisme de commande et lui rendre l'indépendance littéraire »<sup>8</sup>.

### 3. Les *Folastries*

Ce sera chose faite en 1553, l'année où la production littéraire de Ronsard évolue d'une façon remarquable, du ton langoureux et paré, vers un ton familier et « grivois ». Il avait commencé à sentir en lui le besoin de s'évader des chaînes dont il s'était lui-même lié. La divergence entre l'amour tel qu'il le chantait et l'amour tel qu'il le pratiquait était trop grande et sa sensualité difficilement contenue dans sa poésie courtoise rêvait de s'échapper enfin en rythmes plus légers et plus conformes à sa nature gauloise. C'est en 1553 même que ce désir trouve son issue dans le recueil appelé *Folastries*. Que ce soit une brusque volte-face dans la création poétique de Ronsard en témoigne le fait que l'auteur lui-même n'avait pas osé signer son oeuvre. Il ne savait que trop qu'il avait outrepassé la mesure... Le recueil paraît donc sans nom d'auteur. Bien que d'abord anonyme, l'oeuvre est de Ronsard ; les études menées pour confirmer cette paternité ne permettent plus d'en douter<sup>9</sup>. Plus tard il supprimera de cette oeuvre les plus licencieuses des *Folastries* et gardera les autres en les dispersant parmi des poésies ultérieures sous le nom de *Gayetés*<sup>10</sup>. Selon André Gendre, après l'effort et la rhétorique grandiloquente des *Amours*, *le Livret de Folastries*, « résonne comme un chant libérateur ! »<sup>11</sup>

---

<sup>8</sup> Pierre de Ronsard, textes choisis et commentés par Pierre Villey, *op. cit.*, p. 123.

<sup>9</sup> Voir notamment le père des ronsardiens, Paul Laumonier, in : Pierre de Ronsard, *Oeuvres complètes*, vol. V : *Livret des Folastries* (1553), *Les Amours* (1553), *Cinquième Livre des Odes* (1553), éd. critique avec introduction et commentaire de Paul Laumonier, Paris, éd. Hachette, 1928, p. VII et pp. XVI-XVII.

<sup>10</sup> Pierre de Ronsard, textes choisis et commentés par Pierre Villey, *op. cit.*, p. 115.

<sup>11</sup> Pierre de Ronsard, *Les Amours et les Folastries (1552-1560)*, éd. établie, présentée et annotée par André Gendre, *op. cit.*, p. 37.

### **3.1. Caractéristiques du genre et généalogie de l'opuscule**

A l'origine, les folastries étaient des pièces légères écrites en hendécasyllabes (vers de onze syllabes) par les poètes gréco-latins, notamment Catulle (vers 87- vers 54 av. J.-C.). Il s'agit de pièces pleines de fantaisie, que l'on appellerait aujourd'hui « bagatelles », consistant à « faire quelque chose d'un rien »<sup>12</sup>, et que les Latins, à l'époque désignait par les mots « nuagae », « lusus », « ineptiae »<sup>13</sup>. Ces « billets badins » se caractérisaient par un ton satirique, railleur, mais pouvaient aussi être empreints d'une certaine vulgarité.

C'est précisément l'oeuvre de Catulle (et, dans une moindre mesure, celle des « catulliens » modernes : Pontano, Second, Flaminio, Marulle), qui a inspiré au poète vendômois l'idée de son *Livret*. Ce projet s'était concrétisé grâce aux conférences qu'avait faites Muret en 1553 sur ce poème lyrique, élégiaque et satirique à la fois, et auxquelles Ronsard avait participé très volontiers<sup>14</sup>. Comme le remarque Paul Laumonier, les *Folastries* ronsardiennes sont plus longues que les pièces de Catulle, et les vers employés par le poète renaissant sont l'octosyllabe (huit syllabes) et l'heptasyllabe (sept syllabes), et non le hendécasyllabe, mais outre ces différences minimales, ces poèmes restent toujours de petits vers uniformes et astrophiques, d'allures grivoises et enjouées, de fond et de style licencieux, dits, anciennement, « versiculi »<sup>15</sup>.

L'une des lois de ce genre semi-lyrique, chez les Anciens, voulait que le poète laisse libre cours à son imagination, sans s'astreindre aux exigences de l'ode et qu'il s'exprime en un mètre simple d'un cours égal et rapide. La poésie mignarde et lascive de Catulle a trouvé en Ronsard un disciple doué. Il n'eut pas de mal à suivre cette loi, tout comme celle qui voulait que le poète foule aux pieds toute pudeur et qu'il parle de choses dont on ne devrait pas normalement parler sans gêne. La nature des amours a en effet changé dans les *Folastries*. Comme l'écrit André Gendre, à « l'amante

---

<sup>12</sup> Jean Bayet, *Littérature latine*, Paris, éd. Armand Colin, 1947, p. 235.

<sup>13</sup> Cf. Fernand Desonay, *Ronsard, poète de l'amour*, livre 1: *Cassandre*, Bruxelles, éd. Palais des Académies, 1965, p. 50 et Paul Laumonier, introduction, in *Folastries, op. cit.*, p. IX.

<sup>14</sup> Pierre de Ronsard, *Oeuvres complètes*, vol. V : *Livret de Folastries*, avec introduction et commentaire par Paul Laumonier, *op. cit.*, p. VII.

<sup>15</sup> *Ibid.*, p. VIII.

unique et difficilement accessible » des *Amours*, « ont succédé plusieurs jeunes filles, villageoises apparemment ; malgré quelques obstacles, on peut mener avec elles l'amour jusqu'au bout de manière fruste et directe, et l'aventure se dit sans qu'on projette sur elle le voile de la pudeur, sans qu'on déguise par des métaphores les instruments du plaisir »<sup>16</sup>.

Quoique l'imitation de Catulle soit indéniable dans le *Livret de Folastries*, Ronsard nous dit dans la dédicace qu'il « conçut » son « livret » quand il était « jeune garçon ». Comment considérer cet aveu dans le contexte de toutes les ressemblances tout à fait conscientes avec la poésie antique ? Il ne fait guère de doute que Ronsard aimait à se vanter d'avoir été de très bonne heure « le mignon des Muses »<sup>17</sup>. Il se dit possédé, dès son jeune âge, du démon du vers et prétend avoir composé ses premiers vers avant l'âge de douze ans, au profond des vallées, dans une parfaite insouciance. Sans doute est-ce là une image fort flatteuse de Ronsard mais est-elle véridique pour autant ? D'autant plus qu'il se contredit en annonçant ailleurs que dans ces « mignardes chansonnettes » il a voulu adopter « en la famille française ces coulons et mignards handécasyllabes à l'exemple d'un Catulle, d'un Ponton et d'un Second »<sup>18</sup>. Selon Paul Laumonier, il en a en effet adopté l'allure générale, les tons divers, le style et jusqu'à un certain point le rythme ; il a seulement laissé de côté, et la quantité et le nombre de syllabes. Par ailleurs, comme écrit le père des ronsardiens, le « folastre » ne manque pas de prévenir son lecteur, dès le début, que son livret contient des « sornettes » et des « vers raillars »<sup>19</sup>.

### 3. 2. Scandale de la publication des *Folastries*

La publication du *Livret de Folastries*, au printemps 1553, a rencontré une vive critique dans le milieu même du poète. Guillaume des Autels, l'un des poètes de la Pléiade, les membres du Parlement Robert de La Haye et Michel de l'Hôpital ainsi que le poète Nicolas Denisot<sup>20</sup> ont adressé à Ronsard des reproches devant rappeler

---

<sup>16</sup> Pierre de Ronsard, *Les Amours et Les Folastries*, éd. établie par André Gendre, *op. cit.*, p. 47.

<sup>17</sup> Pierre de Ronsard, *Livret de Folastries*, introduction par Paul Laumonier, *op. cit.*, p. VIII.

<sup>18</sup> *Ibid.*, p. X.

<sup>19</sup> *Ibid.*

<sup>20</sup> *Ibid.*, p. XIX.

« le folastre » à la décence. Ronsard lui-même avait compris la nécessité de justifier la sensualité licencieuse de son opuscule par une épigraphe prise à Catulle : « Nam castum esse decet pium poetam / Ipsum, versiculos nihil necesse est ». « Il convient que le poète scrupuleux soit chaste, il n'est pas indispensable que ses vers le soient »<sup>21</sup>. Singulier précepte que, comme l'observe Gustave Cohen, la vie du maître Ronsard ne paraît illustrer d'aucune manière ...

Néanmoins, il y eut aussi quelques amis bienveillants. Pierre des Mireurs, ancien élève de Coqueret devenu médecin à Dieppe, est celui qui prend le plus hardiment la défense de Ronsard<sup>22</sup>. Il rappelle aux censeurs du « rhapsode gaillard », parmi lesquels surtout Jean Macer (il s'agit de l'imprimeur Jean Macé), auteur du pamphlet qui reprochait à Ronsard « sa paillardise et son paganisme »<sup>23</sup> que les plus grands poètes du latin récent, tels Policien, Jean Second, Bembo, lui ont ouvert cette voie dont le but n'est autre que de chercher des jeux littéraires. Le 30 juin 1553, dans une lettre adressée à Jean de Morel, il se félicite de « ce rajeunissement de l'érotisme classique »<sup>24</sup> que constitue le *Livret de Folastries* de son ancien camarade et ami. L'avocat autoproclamé de Ronsard invoque les obscénités que l'on trouve aussi chez Marot, Saint-Gelais et quelques autres, afin de disculper tant soit peu le « folastre » de ses licences.

Toutefois, le plaidoyer terminé, Pierre des Mireurs ne dissimule pas que l'auteur ferait bien de ne pas s'attarder à ces « gayetés » qui outrepassent les bornes de la pudeur (surtout les *Folastries I, III et IV*). Il suggère à Ronsard d'appliquer son rare talent à d'autres sujets, à des poèmes chastes qui seront mieux en accord avec sa vie. Suivant le bon conseil de l'ami, Ronsard va s'atteler à un hymne, celui de « Hercule Chrétien » : désignation qui s'applique à Jésus-Christ. Comme le rappelle André Gendre, « bien qu'il soit incorporé au premier livre des *Hymnes* en 1555, l'*Hercule Chrestien* restera sans lendemain dans l'oeuvre de Ronsard »<sup>25</sup>. Il est probable en effet

---

<sup>21</sup> Gustave Cohen, *Ronsard : sa vie et son oeuvre*, Paris, éd. Gallimard, 1956, p. 139.

<sup>22</sup> Pierre de Nolhac, *Ronsard et l'Humanisme*, Paris, éd. Honoré Champion, 1921.

<sup>23</sup> Pierre de Ronsard, *Livret de Folastries*, introduction, *op. cit.*, p. XVIII.

<sup>24</sup> Pierre de Ronsard, *Oeuvres Complètes*, vol. 1, éd. établie, présentée et annotée par Jean Céard, Daniel Ménager et Michel Simonin, Paris, éd. Gallimard, 1993, Chronologie, p. LVII

<sup>25</sup> André Gendre, *L'Esthétique de Ronsard*, Paris, éd. Sedes, 1997, p. 127.

que le seul but du pieux poème était de faire diversion à l'esprit de débauche qui habite les *Folastries* et qu'en esquissant ce changement radical de sa poésie, Ronsard ne cherchait qu'à apaiser Nicolas Denisot et Jean de Morel, choqués par le ton dru de son ouvrage.

Quel fut le destin de cet opuscule frivole que sont les *Folastries*?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Jacques Grévin, un adversaire huguenot de Ronsard, a soutenu que le *Livret de Folastries* aurait été brûlé par ordre du Parlement<sup>26</sup>. Pourtant, le père des ronsardiens, Paul Laumonier, reste sceptique quant à la véracité de ces dires, et même la rareté de l'édition princeps n'est pas pour lui « une raison suffisante pour affirmer qu'elle fut condamnée au feu »<sup>27</sup>.

### 3. 3. Aperçu des textes

Le *Livret de Folastries* s'ouvre par un poème intitulé *A Janot Paisien*. Comme le fait remarquer Paul Laumonier, le prénom en question désigne sans doute le compagnon d'études de Ronsard, Jean-Antoine de Baïf. Viennent ensuite les huit *Folastries* proprement dites. Dans les éditions actuelles, elles sont suivies des *Dithyrambes* et de la *Traduction de quelques épigrammes grecs*. Mais du temps de Ronsard, le livret se terminait par deux sonnets, retranchés dès 1560. Il s'agissait en effet de « blasons anatomiques », inspirés de l'érotique antique et mis à la mode par Clément Marot. Le blason est un poème décrivant un objet ; mais ceux des poètes marotiques dont s'inspire Ronsard concernaient rarement les animaux et les plantes... Qu'il nous suffise de savoir que, selon l'expression de Fernand Desonay, « Ronsard, dans le second surtout de ces sonnets, consacré au sexe féminin, a toute vergogne déposée »<sup>28</sup>. Les *Dithyrambes* ne seront pas retenus pour notre analyse pour la raison qu'ils ne se prêtent pas à l'étude de notre sujet et parce qu'ils constituent une oeuvre très riche en références antiques qui mérite une étude à part<sup>29</sup>. C'est exclusivement

---

<sup>26</sup> Michel Simonin, *Pierre de Ronsard*, Paris, éd. Fayard, 1990, p. 147.

<sup>27</sup> Paul Laumonier, introduction, in *Folastries*, op. cit., p. XIX.

<sup>28</sup> Fernand Desonay, *Ronsard, poète de l'amour*, op. cit., p. 54. Voir, à ce sujet, Paul Laumonier, introduction in *Folastries*, op. cit., p. XVI.

<sup>29</sup> « Ce poème bachique en vers libres allie à une érudition déchaînée une imagination bouffonne » : Raymond Lebègue, *Ronsard*, Paris, éd. Hatier, 1966, p. 41.

aux *Folastries* que nous allons nous intéresser de plus près et, parmi celles-ci, ce sont les *Folastries I, III, IV, V* et *VII* qui nous semblent refléter le mieux le changement de la conception de l'amour chez Ronsard après sa période pétrarquiste.

Ces *Folastries*, sont-elles vraiment obscènes ? Par quels moyens littéraires cette sensualité nouvelle se traduit-elle dans ces petites pièces ? Ronsard a recours à des refrains-cadres, des refrains intérieurs, l'emploi des diminutifs, la parodie. C'est ce que nous allons voir dans les *Folastries I, III, IV, V, VI* qui passent pour les pièces les mieux troussées de ce recueil.

### 3.3.1. *Folastrie I*

La *Folastrie I* est un éloge de deux amantes du poète, « une grasselette » et « une maigrelette ». Elle se caractérise par l'accumulation de diminutifs - « pucelette », « grasselette », « maigrelette », « grassette », « maigrette », « brunette », « bellette », « ondelette », « ruiselet », « chapelet », - et par des refrains intérieurs qui apparaissent à intervalles irréguliers. Le motif qui revient toujours est constitué par les vers : « Qu'éperdument j'aime mieux / Que mon coeur, ny que mes yeux » :

Une jeune pucelette,  
Pucelette grasselette,  
Qu'éperdument j'aime mieux  
Que mon coeur, ny que mes yeux,  
A la moytié de ma vie  
Eperdument asservie  
De son grasset enbonpoint  
Mais fâché je ne suis point  
D'être serf pour l'amour d'elle  
Pour l'enbonpoint de la belle,  
Qu'éperdument j'aime mieux  
Que mon coeur, ny que mes yeux.  
Las ! Une autre pucelette,  
Pucelette maigrelette,  
Qu'éperdument j'aime mieux  
Que mon coeur, ny que mes yeux,

Eperdument a ravye  
L'autre moytié de ma vie  
De son maigret enbonpoint :  
Mais fâché je ne suis point  
D'estre serf pour l'amour d'elle,  
Pour la maigreur de la belle,  
Qu'éperdument j'ayme mieux  
Que mon coeur, ny que mes yeux [...].<sup>30</sup>

L'auteur met en évidence les atouts des deux femmes qu'il trouve séduisantes toutes les deux et dont il s'enamourache au même point et en même temps. Il est conscient que leurs charmes respectifs qui le subjuguent sont chacun d'une autre nature. L'une l'attire par son « sein grasselet », son « oeil brunelet » et sa « cuisse rondelette »<sup>31</sup>. Mais, avoue-t-il, en donnant libre cours à une sensualité grivoise :

[...] par dessus tout m'espoint  
Un grasselet enbonpoint,  
Une fesse rebondie  
En deux monteletz bossus  
Où l'on dormirait dessus  
Comme entre cent fleurs décloes  
Ou dessus un lit de roses  
Puis avecque tout cela  
Encore d'avantage ell'a  
Je ne scay quelle faintise  
Ne scay quelle mignotise,  
Qui fait que je l'ayme mieux  
Que mon coeur, ny que mes yeux [...].<sup>32</sup>

---

<sup>30</sup> Pierre de Ronsard, *Livret de Folastries*, op. cit., *Folastrie I*, vers 1-24, p. 8.

<sup>31</sup> *Ibid.*, vers 73, 74, 79, p. 10-11.

<sup>32</sup> *Ibid.*, vers 73-98, p. 10-11.



Si l'autre femme apparaît au poète moins belle et moins voluptueuse – elle a « les tétins maigreletz », son « flanc », sa « cuisse », sa « hanche » n'ont pas la blancheur de la « grassette », et « son ventrelet n'est pas si rebondi ne si gras », si bien qu'il laisse sentir à l'amant « mille petits os cornus » qui lui « blessent les flancs nus »<sup>33</sup> - elle le ravit par d'autres attraits : son chant mélodieux, « une douce mignardise », « un doux languir de ses yeux », « un doux soupir gratieux », une danse charmante ou encore des baisers langoureux<sup>34</sup>.

Le poète se montre inassouvi des plaisirs charnels que lui offre l'amitié de ses deux amantes, trouvant tout à fait naturelle sa « douce inconstance » qui le fait passer d'une fille à l'autre et comparant cette singulière alternance à celle, plus triviale, d'un gourmet sachant apprécier la saveur d'une viande à condition de ne pas en manger sans interruption, mais bien de l'échanger de temps en temps contre une autre..:

[...] quand je suis milassé  
Du premier plaisir passé,  
Des le jour je laisse celle  
Qui m'a fâché dessus elle,  
Et m'en voys prendre un petit  
Dessus l'autre appetit,  
Afin qu'apres la dernière  
Je retourne à la première,  
Pour n'estre recreu d'Amours. [...]»<sup>35</sup>

Malheureusement, cette idylle se trouve soudainement troublée : les deux demoiselles, la « grassette » tout comme la « maigrette », semblent éviter les avances de l'amant qui se plaint de ne plus pouvoir embrasser aussi souvent qu'avant

---

<sup>33</sup> *Ibid.*, vers 102-114, p. 11-12.

<sup>34</sup> *Ibid.*, vers 117-133, p. 12-13.

<sup>35</sup> *Ibid.*, vers 145-153, p. 13-14. Dans les notes qui accompagnent ce passage, Paul Laumonier indique le sens actuel de certains mots ou expressions. Ainsi, « millassé » équivaut à « à demi lassé » ; « fâché » à « fatigué » (au sens physique) ; « un petit » à « un peu » ; « pour n'estre recreu d'Amours » a le sens de « afin de ne pas être las de mes amours ».

l'« estomac grasselet » de l'une et le « sein maigrelet »<sup>36</sup> de l'autre. De cette réserve soudaine, il rend coupable l'humaine médisance, dictée par la jalousie :

[...] [Avez-vous] peur d'estre nommées  
Pucelles mal renommées ?  
[Avez-vous] peur qu'un blasonneur  
Caquette de vostre honneur,  
Et qu'il die : Ces deux belles,  
Qui font le jour les rebelles,  
Toute nuit d'un bras mignon  
Echaufent un compaignon,  
Qui les paye en Chansonnettes,  
En rymes & en sornettes ? [...] <sup>37</sup>

L'amant se veut au-dessus de la mesquinerie des gens qui voudraient le séparer de celles qu'il aime. Il demande à ses amies de ne pas prêter attention à la rumeur et assure, dans une longue énumération, que rien au monde – ni le temps, ni la mort, ni les parjures, ni les soupçons, ni les pères, ni les mères, ni les frères ... –

« [...] N'auront puissance de faire  
Que tousjours [il] n'ayme mieux  
Que [son] coeur, ny que [ses] yeux,  
L'une & l'autre pucelette,  
Grasselette, & maigrelette<sup>38</sup>.

### 3.3.2. *Folastrie III*

La *Folastrie III* est l'histoire d'une Catin dont la conduite en sa jeunesse n'avait rien d'édifiant : Catin, aimant les joies de la chair, « Jamais ny à Clerc ny à Prestre, /

---

<sup>36</sup> *Ibid.*, vers 165-166, p. 14.

<sup>37</sup> *Ibid.*, vers 167-177, p. 14-15.

<sup>38</sup> *Ibid.*, vers 218-222, p. 17.

Moine, chanoine, ou Cordelier / N'a refusé son hatelier »<sup>39</sup>. Ces vers constituent un refrain-cadre que l'on trouve au début et à la fin de la folastrie. Infatigable dans « le mestier de l'un sus l'autre, / Où l'un dessus l'autre se vautre »<sup>40</sup>, Catin prodigait ses charmes sans faire de distinction entre le riche et le pauvre, entre le beau et le laid, entre le maître ou le valet, « pourveu qu'il servist bien en chambre »<sup>41</sup>...

Mais les années ont passé et la fraîche et vigoureuse Catin est devenue une vieille femme décrépite - et bigote, de surcroît. La description que Ronsard fait de l'ancienne prostituée dans cette folastrie est fort naturaliste :

[...] Or' se voyant décolorée  
Comme une image dédorée  
Se voyant dehors & dedans  
Chancreuses & noires les dents  
Se voyant rider la mammelle  
Comme un Escouillé de Cybèle,  
Se voyant grisons les cheveux  
Et, par ses deux conduits, soufflante  
A bas une haleine puante  
Elle changea de volonté  
Et son premier train efronté  
Par ne scay quelle frenaisie  
A couvert d'hypocrisie [...].<sup>42</sup>

Après avoir exploité les attraits physiques de son corps, Catin devient dévote et s'adonne à des pratiques de mortification que l'auteur compare à la pénitence d'Oedipe. Mais, le plus scandaleux, c'est qu'elle essaie de « convertir » à ses « mille bigotations » la jeune amie du poète. Ronsard rapporte les paroles que la vieille

---

<sup>39</sup> *Ibid.*, *Folastrie III*, vers 6-8, p. 22.

<sup>40</sup> *Ibid.*, vers 9-10, p. 22.

<sup>41</sup> *Ibid.*, vers 25, p. 23.

<sup>42</sup> *Ibid.*, vers 45-55, p. 23-24. « Comme un Escouillé de Cybèle » : « Les Corybantes, prêtres de Cybèle, se coupaient les testicules » (note 1. p. 24).

hypocrite adresse à sa jeune amante :

[...] Et quoi (dit elle) ma mignonne ?  
Ce n'est pas une chose bonne  
D'aymer ainsi les jouvenceaux :  
Amour est un goufre de maux  
Amour affole le plus sage  
Amour n'est sinon qu'une rage  
Amour aveugle les raisons  
Amour renverse les maisons  
Amour hannist la renommée  
Amour n'est rien qu'une fumée  
Qui par l'air en vent se répent  
Toujours d'aymer on se repent [...] <sup>43</sup>.

Catin, prodiguant les « bons conseils » (« fuyez les banquetz, & les dances / Les cheines d'or, les grands bombances, les bagues, & les grands atours » <sup>44</sup>) faute de pouvoir continuer à donner de mauvais exemples, réussit à « convertir » la jeune fille dont Ronsard est amoureux :

[...] Ainsi Catin la bonne dame  
Maintenant miroir de tout bien)  
Prescha dernièrement si bien  
La jeune raison de m'amie  
Qu'en bigote l'a convertie [...] <sup>45</sup>...

Si bien que la demoiselle, novice implacable dans la pratique de la vertu, refuse dorénavant les avances du poète, convaincue par Catin qu'il ne faut pas que

---

<sup>43</sup> *Ibid.*, vers 103-114, p. 26.

<sup>44</sup> *Ibid.*, vers 115-117, p. 26.

<sup>45</sup> *Ibid.*, vers 120-125, p. 27.

« charnellement on [la] touche »<sup>46</sup>. Frustré au plus haut point d'un plaisir inassouvi, le poète ne peut que maudire la vieille prostituée, oublieuse de sa jeunesse dissolue : « Qu'à cent diables soit la prestresse / Qui a bigoté ma maistresse »<sup>47</sup>. Et d'appeler les vers à la rescousse pour se vanger de

« [...] cette beste,  
Qui, ores femme n'étant plus,  
Mais ombre d'un tombeau reclus,  
Misérablement porte envie  
Aux doux passetemps de [sa] vie [...] »<sup>48</sup>.

### **3.3.3. Folastrie IV**

La *Folastrie IV* est une parodie de la pastourelle de Robin et Marion, largement répandue au Moyen Âge. Elle dépeint la rencontre amoureuse de Jaquet et de Robine. Tout comme la *Folastrie I*, elle a recours à de nombreux termes hypocoristiques rehaussant le ton grivois de la pièce (« doucettes », « mignardelettes », « paillardettes »...) et des refrains intérieurs qui contribuent à conférer à ce poème champêtre un rythme et une musicalité (« O amourettes doucelettes. / O doucelettes amourettes ») :

Jaquet ayme autant sa Robine  
Qu'une pucelle sa poupine,  
Robine ayme autant son Jaquet  
Qu'un amoureux fait son bouquet.  
O amourettes doucelettes,  
O doucelettes amourettes,  
O couple d'amis bien heureux,  
Ensemble aimez & amoureux.  
O Robine bien fortunée

---

<sup>46</sup> *Ibid.*, vers 139, p. 27.

<sup>47</sup> *Ibid.*, vers 155-156, p. 28.

<sup>48</sup> *Ibid.*, vers 160-164, p. 28-29.

De s'être au bon Jaquet donnée,  
O bon Jaquet bien fortuné  
De s'estre à Robine donné.[...] <sup>49</sup>

Le poète prend soin d'inscrire cet amour dans la tradition pastorale en faisant de la nature non seulement le théâtre de cette rencontre (la folastrie décrit « les rivages babillars », « l'oisiveté des prés mignards », « les fontaines argentelettes », les ondes, les forêts, les vallées...), mais aussi pour ainsi dire sa motivation intrinsèque, les deux personnages faisant étroitement partie du cosmos, au même titre que les plantes ou les animaux. L'amour de Jaquet et Robine ne relève aucunement d'un quelconque marché mais bien d'une force naturelle qui le rend autant pur que primitif, voire violent. La scène de cette rencontre amoureuse se produit après que les deux amants se sont réchauffés et rassasiés d'un quignon de pain et d'une galette et le moins que l'on puisse dire c'est que Ronsard ne sacrifie pas à l'euphémisme dans cette folastrie. Au contraire, on observe ici un affranchissement total de toutes les contraintes imposées par le modèle platonicien ou pétrarquiste de l'amour. Fini de chanter les ivresses de l'imagination ou les soupirs d'un amant qui n'est pas payé en retour, et place à un amour concret des sens. Comme l'écrit Gustave Cohen, la *Folastrie IV* « respire une franche odeur de terroir, très caractéristique, retraçant les rudes amours de compagnards s'aimant comme on se cogne, obéissant à la loi de la nature, qui ne sont pas de langoureux bergers de pastorale, mais qui, parce que nous vivons tout de même à l'époque de la Renaissance triomphante, entraînent dans leurs culbutements et leurs danses les Sylvains et les Nymphes de la forêt »<sup>50</sup>.

La *Folastrie IV* est sans doute la plus licencieuse de toutes. Nul mieux que Pierre Villey n'en a résumé le climat : « C'est une orgie d'écolier trop longtemps tenue en tutelle »<sup>51</sup>, écrit-il dans la présentation des *Oeuvres* de Ronsard. La note gauloise y résonne en effet du début à la fin en révélant qu'il y a en Ronsard d'incontestables affinités avec Villon et Marot. Mais, ajoute le critique, cette « verve gauloise chez

---

<sup>49</sup> *Ibid.*, *Folastrie IV*, vers 1-13, p. 29-30.

<sup>50</sup> Gustave Cohen, *Ronsard, sa vie et son oeuvre*, nouvelle édition, revue, corrigée et augmentée, Paris, éd. Boivin & Cie, 1932, p. 141.

<sup>51</sup> Pierre de Ronsard, textes choisis et commentés par Pierre Villey, *op. cit.*, p. 115.

[Ronsard] s'annoblissait, s'affinait, en se parant des somptueuses richesses et des grâces exquises de l'art antique »<sup>52</sup>.

### 3.3.4. *Folastrie V*

La *Folastrie V* met en scène un personnage singulier : un chien. En effet, à l'instar des poètes antiques, les poètes de la Renaissance ont fait souvent l'éloge d'animaux favoris, notamment de chiens et de chiennes, fidèles compagnons des hommes. Mais Ronsard fait à l'envers : le chien qui apparaît ici n'est point considéré comme ami. Bien au contraire, il est coupable d'avoir interrompu la nuit d'amour du poète et de sa bien-aimée par ses aboiements :

[...] Car toi, par ne scay quel destin  
Desloyal & traistre mastin,  
Japant à la porte fermée  
De la chambre, où ma mieux aymée  
Me dorlotoyt entre ses bras  
Counillant de jour dans les draps  
Tu donnas soupçon aux voisines,  
Aux soeurs, aux frères, aux cousines,  
T'oyans pleindre à l'huys lentement  
Sans entrer, que segretement  
Tout seul je faisais la chosette  
Avecque elle dans sa couchette [...].<sup>53</sup>

Le bruit de cette entrevue qui aurait dû rester secrète a ainsi couru à travers le village exposant la jeune fille au « déshonneur » et à l' « infamie » aux yeux des villageois et au courroux de sa mère qui, ayant appris la nouvelle, « sa fille diffama de coups, / Lui escrivant de vergelettes / L'yvoire de ses cotelettes »<sup>54</sup>.

Le poète s'en prend violement au « coupable » et l'accuse d'avoir trahi

---

<sup>52</sup> *Ibid.*, p. 115.

<sup>53</sup> Pierre de Ronsard, *Livret de Folastries, op. cit., Folastrie V*, vers 11-22, p. 36.

<sup>54</sup> *Ibid.*, vers 28-30, p. 36.

l'amour qu'il lui portait. Sans cette perfidie, le chien aurait pu être immortalisé par son maître, et jouir d'une gloire éternelle aux cieux. A la place, le poète lui adresse les pires imprécations, en lui souhaitant comme punition :

« [...] une fourmillière de poux,  
Un camp de puces, & de loups,  
La rage, le farcin, la taigne  
Un dogue afamé de Bretagne,  
Jusque aux oz [le] puissent manger  
Sur quelque fumier estrange [...] »<sup>55</sup>

### 3.3.5. *Folastrie VI*

Dans cette folastrie, Ronsard établit un parallèle entre lui-même et un enfant de quatre ans. Quel peut bien être leur point commun ? – C'est la nourrice qui pouponne le petit garçon en le tenant dans ses bras et qui, par ses yeux et sa beauté, a asservi le coeur du poète. Le garçonnet, dans son inconscience, n'est pas capable d'apprécier la chance qu'il a de cotôyer au quotidien celle qui est l'objet de fantasmes du poète. Celui-ci exprime ainsi ses rêves les plus fous :

[...] Que pleust à dieu que je peusse  
Pour un soir devenir puce,  
Ou que les ars Medeans  
Eussent rajeuni mes ans,  
Ou converti ma jeunesse  
En ta peu caute simplesse,  
Me faisant semblable à toy :  
Sans soupson je coucheroy  
Entre tes bras, ma cruelle,  
Entre tes bras, ma rebelle,  
Ore te baisant les yeux,  
Or le sein préteux,

---

<sup>55</sup> *Ibid.*, vers 51-56, p. 37-38.



D'où les amours qui m'aguetent  
Mille flèches me sagetent [...] <sup>56</sup>.

S'ensuit la vision des plaisirs sensuels dont le poète comblerait la femme aimée si elle voulait de lui, au point qu'elle quitterait ses frères, son père et sa mère pour le suivre où il voudrait, telle Vénus son Adonis.

**Conclusion : « Faire son miel de toutes les fleurs... »**

Cette courte analyse de cinq des *Folastries* de Ronsard démontre l'aspect général de ce recueil d'une gaité assez libre. Cette gaité s'exprime par un réalisme gaulois, un certain naturalisme et l'anti-pétrarquisme.

On ne peut pas refuser à Ronsard le titre glorieux du poète de l'Amour mais il faut bien se mettre d'accord en ce qui concerne la convention de cet amour. Car, loin de s'enfermer dans l'image d'un poète satisfait d'un amour platonicien, comme le voulait le pétrarquisme de son époque, dans maints passages des *Folastries*, Ronsard répète en effet: « *Carpe diem* », cueillez les fleurs de la vie ; profitez de la jeunesse qui passe. Ces petites pièces sont imprégnées d'une sensualité plus libre que les *Odes* ou les *Amours*. Les contemporains de Ronsard étaient émerveillés par la prodigieuse souplesse de son génie poétique. Sa carrière littéraire est d'autant plus particulière que la même année, tandis que d'une main il offre au public ses oeuvres les plus fidèles au modèle poétique de l'époque, les plus graves et les plus chrétiennes, il lui présente de l'autre ses pièces les plus païennes et les plus lascives. D'abord, il s'exprime en imitant les modèles imposés, mais progressivement la vie - dans sa richesse illimitée - pénètre son oeuvre, l'impulse et la diversifie. C'est là le secret de l'*innutrition* du maître vendômois, celui de faire son miel de toutes les fleurs...

Concluons cette analyse avec Pierre Villey qui a très bien résumé l'évolution ronsardienne dont ce travail s'était proposé de retracer les principales lignes. « D'abord il avait songé surtout à l'inspiration pindarique, à la poésie grandiloquente et « altiloque », écrit le critique. Mais peu à peu, à mesure qu'il se découvrait, sa

---

<sup>56</sup> *Ibid.*, *Folastrie VI*, vers, 35-48, p. 40. « Ou que les ars Medeans / Eussent rajeuni mes ans » : Médée avait rajeuni Aeson, père de Jason » (note 2, p. 40). « les amours [...] mille flèches me sagetent » : « me lancent mille flèches » (note 3, p. 40).

conception s'est transformée. Il a compris que cette chose divine, l'inspiration, jaillit dans les petits événements et dans les états moyens de sensibilité comme dans les catastrophes épiques et dans les états d'exception, dans les sentiments modernes comme dans ceux que les anciens ont exprimés ; qu'elle transfigure la vie toute entière ; que le poète a pour mission de dévoiler au commun des hommes en toutes choses, même dans les plus vulgaires, des sources de joies et de tristesse qu'ils ne sentent que confusément. La réalité a dépassé son rêve. Son rôle principal a été en vérité d'étendre considérablement le domaine de la poésie française »<sup>57</sup>. En écrivant les *Folastries*, Ronsard a peut-être devancé ses contemporains par sa sensibilité par rapport aux choses quotidiennes inaperçues. Loin d'être seulement vulgaire et grivois, c'est avec ces petites pièces qu'il montre la diversité de son œuvre et rend à la sensualité humaine, trop sublimée et devenue irréelle et inaccessible, une certaine ludicité et une légèreté inédites.

---

本論文於 2011 年 10 月 14 日到稿，2011 年 11 月 19 日通過審查。

---

<sup>57</sup> Pierre de Ronsard, textes choisis et commentés par Pierre Villey, *op. cit.*, p. 302-303.

**Bibliographie :**

- Bayet, Jean, *Littérature latine*, Paris, éd. Armand Colin, 1947.
- Cohen , Gustave, *Ronsard : sa vie et son oeuvre*, Paris, éd. Gallimard, 1956.
- Cohen, Gustave, *Ronsard, sa vie et son oeuvre*, nouvelle édition, revue, corrigée et augmentée, Paris, éd. Boivin & Cie Editeur, 1932.
- Denisot, Véronique, *Les Amours de Ronsard*, Paris, éd. Gallimard, 2002.
- Desonay, Fernand, *Ronsard, poète de l'amour*, livre I: *Cassandra*, Bruxelles, éd. Palais des Académies, 1965.
- Genre, André, *L'Esthétique de Ronsard*, Paris, éd. Sedes, 1997.
- Lebègue, Raymond, *Ronsard*, Paris, éd. Hatier, 1966.
- Nolhac de, Pierre, *La vie amoureuse de Pierre de Ronsard*, Paris, éd. Flammarion, coll. « Leurs amours », 1926.
- Nolhac de, Pierre, *Ronsard et l'Humanisme*, Paris, éd. Librairie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21.
- Ronsard, Pierre de, *Le Bocage, Les Meslanges*, édition présentée par F. Joukovsky, Paris, éd. Flammarion, 1995.
- Ronsard, Pierre de, textes choisis et commentés par Pierre Villey, Paris, éd. Plon, 1914.
- Ronsard, Pierre de, *Oeuvres complètes*, vol. V : *Livret des Folastris (1553), Les Amours (1553), Cinquième Livre des Odes (1553)*, éd. critique avec introduction et commentaire de Paul Laumonier, Paris, éd. Hachette, 1928.
- Ronsard, Pierre de, *Les Amours et Les Folastris (1552-1560)*, éd. établie, présentée et annotée par André Genre, Paris, éd.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93.
- Ronsard, Pierre de, *Oeuvres Complètes*, vol. I, éd. établie, présentée et annotée par Jean Céard, Daniel Ménager et Michel Simonin, Paris, éd. Gallimard, 1993.
- Simonin, Michel, *Pierre de Ronsard*, Paris, éd. Fayard, 1990.

## **Raumbezogene PPn im Deutschen und Chinesischen: Eine Analyse aus vergleichender Perspektive**

羅麗蓓 / Lyih-Peir Luo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 **【摘要】**

在對空間介詞短語的研究中，近年來有一個見解普遍受到重視，即趨向介詞的補語並非名詞短語而是處所介詞短語。根據這個看法，語意上表示趨向還是表示處所取決於介詞短語的架構，而非介詞的詞彙語義，介詞短語的架構也反映在格位標記上。本文即採用這個觀點來分析德語和漢語裡表處所和趨向的空間介詞短語，並從事件架構觀點來解釋其句法表現和語意之間的連結關係。

### **【關鍵詞】**

空間介詞短語、趨向、處所、事件架構

###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spatial prepositional phrases (PPs) in German and Chinese, adopting the proposal that directional PPs embed a locative PP. According to this view, the semantics of these PPs is determined by their structure, not by the lexical properties of the preposition. The morphological case-markings of the noun phrases in these PPs reflect the internal structures of the PP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event structure may account for the linking between the semantics and the syntax of spatial PPs.

### **【Keywords】**

Spatial PP, directionals, locatives, event structure

## **1. Einleitung**

In diesem Artikel befaße ich mich mit den raumbezogenen Präpositionalphrasen (PPn) im Deutschen und Chinesischen aus vergleichender Perspektive. Es wird sich zeigen, dass die von Dikken (2010) vorgeschlagenen Strukturen für PPn Unterstützung von den beiden Sprachen erhalten, insbesondere die Hypothese, dass direktionale PPn nicht eine Determinalphrase (DP), sondern eine lokale PP als Komplement selektieren. Des Weiteren wird dafür argumentiert, dass die Semantik der raumbezogenen PPn sich aus ihrer Beziehung zur Ereignisstruktur des Verbs ableiten lässt. Daraus folgt, dass direktionale PPn auf ein komplexes, lokale PPn dagegen ein einfaches Ereignis bezogen sind.

Die vorliegende Arbeit ist wie folgt aufgebaut: nach der Einleitung werden die raumbezogenen PPn im Deutschen und Chinesischen hinsichtlich der Verknüpfung von Syntax und Semantik vorgestellt. Danach folgt eine auf Ereignisstruktur und auf der Theorie von Dikken (2010) basierende Analyse für die beiden Sprachen. Die Arbeit schließt mit einer Zusammenfassung der Schlußfolgerungen.

## **2. Datenanlage und Problemstellung**

### **2.1 Deutsch**

Was die deutschen Daten anbelangt, so habe ich insbesondere die folgenden Wechselwirkungen der Syntax und Semantik ins Auge gefasst. Zuerst geht es um das Verhältnis von Kasuszuweisung und semantischer Funktion der eingebetteten DPn. So spezifiziert die eingebettete Dativ-DP in (1a) den Ort, wo das Ereignis/die Bewegung von Anfang an bis zum Schluss stattfindet. Demgegenüber wird in (1b) der DP Akkusativ zugewiesen, wobei sie den Zielort darstellt, den der Referent der Subjekt-DP nach dem Vollzug der vom Verb denotierten Bewegung/Handlung erreicht. Die PP in (1a) wird in der Literatur allgemein als lokale PP, die in (1b) als direktionale bezeichnet. Es scheint, dass im Deutschen, einer Sprache mit einem reichen Kasussystem, zusätzlich der Kasus der eingebetteten DP zur Differenzierung der Bedeutungen eingesetzt wird, falls die regierende Präposition die Interpretation der Komplement-DP zwischen einer lokalen und einer direktionalen offen lässt.<sup>1</sup>

---

<sup>1</sup> In der Tat umfassen direktionale PPn auch PPn, die die Quelle denotieren. Diese Arbeit setzt jedoch den Fokus auf die das Ziel denotierenden direktionalen PPn.

- (1) a. Er tanzt in der Disco  
b. Er tanzt in die Disco

Zudem spielt die Aktionsart des Verbs, mit dem die PP zusammen auftritt, eine Rolle. Denn obwohl manche Präpositionen (*in, an, auf, über, hinter, neben, unter, vor, zwischen*) (vgl. Zwarts 2005) sowohl von einer Dativ-DP als auch von einer Akkusativ-DP gefolgt werden können, muss die DP im Dativ erscheinen, wenn das Verb ein Positionsverb ist, und im Akkusativ, wenn das Verb ein Bewegungsverb ist, vgl. (2a) mit (2b) (Maienborn 1994:225). Diese Einschränkung deutet darauf hin, dass die PPn vom Verb thematisch selektiert sind. Die thematische Rolle der PP in (2a) ist lokal (location), hingegen ist die der PP in (2b) direktional (goal).

- (2) a. Der Stuhl steht in der/ \*die Küche  
b. Gunda geht in die/ \*der Küche

Man darf aber mit (1) und (2) nicht davon ausgehen, dass die Realisierung des Kasus von der Semantik des Kasusträgers (d.i. der Komplement-DP) bedingt ist. Dagegen sprechen zwei Indizien. Das erste ergibt sich aus der Tatsache, dass die Kasusmarkierung eine morphosyntaktische Eigenschaft des Regierers (d.i. der Präposition) ist. Am Beispiel von (3) (Dikken 2010:112) zeigt sich, dass die Präposition *zu* die Komplement-DP mit Dativ markiert, obwohl die DP das Ziel darstellt, auf das der Referent der Subjekt-DP, der sich der von dem Verb denotierten Bewegung unterzieht, gerichtet ist. Somit entspricht die PP *zu dem Laden* einer direktionalen PP.

- (3) a. Er rannte zu dem Laden  
b. \*Er rannte zu den Laden

Ein Gegenbeispiel dazu ist die Präposition *um*. Die Sätze unter (4) (Wunderlich 1993:112) führen vor, dass die Präposition *um* die Komplement-DP einheitlich im Akkusativ markiert.<sup>2</sup>

---

<sup>2</sup> Streng genommen denotieren die Komplement-DPn unter (4) weder Ort noch Ziel wie definiert im Text,

- (4) a. Es gibt Nebel um die Klippen  
b. Er rannte um den Park  
c. Jemand stellte die Stühle um den Baum

Das zweite Indiz hat mit der Stellung der Präposition zu ihrem Komplement zu tun. Vergleicht man in (5) den (a)-Satz mit dem (b)-Satz (Abraham 2010:227), so sieht man, dass die Komplement-DPn mit unterschiedlichen Kasus markiert sind, je nachdem, ob sie vor oder nach der Präposition auftreten. Die interne Struktur der PP spielt dabei also auch eine Rolle.

- (5) a. entlang dem Fluss/ des Flusses/ \*den Fluss  
b. \*dem Fluss/ \*des Flusses/ den Fluss entlang

Des Weiteren geht es um Kombinationen der raumbezogenen PPn mit nicht-lokalen Verben. Wie den Sätzen unter (6) (Maienborn 1994:231) zu entnehmen ist, erhalten die PPn directionale Interpretation.<sup>3</sup> Die betreffenden Verben können auch von einer lokalen PP angeschlossen werden. Allerdings müssen die eingebetteten DPn dann im Dativ stehen.

- (6) a. Christof drischt den Ball aufs Tor  
b. Der Vermieter wollte Gunda aus der Wohnung klagen  
c. Gunda hilft den Kindern über die Straße  
d. Kaufhof sponsort Ihnen die Olympiade ins Haus

Bemerkenswert ist an dieser Stelle ein Vergleich mit dem Englischen. Aus den Beispielen unter (7) ist zu ersehen, dass im Englischen directionale PPn und lokale PPn von verschiedenen Präpositionen angeführt sind. Der Satz in (7a) ist eindeutig

---

sondern verweisen auf einen raumbezogenen Standpunkt. Sie werden deshalb vorläufig aus dem Rahmen der vorliegenden Arbeit weggelassen.

<sup>3</sup> In dieser Arbeit wird als directionale PP eine PP definiert, in der die eingebettete DP das Ziel bzw. die Quelle denotiert. Damit kommen manche anderwo und auch in Maienborn (1994) als directional klassifizierte PPn wie die in „*ein Motorrad knattert durch das verschlafene Dorf*“ nicht in Frage.

lokal und in (7b) direktional. Im Gegensatz dazu basiert das Deutsche die Bedeutungsdifferenzierung auf die verschiedenen Kasusmarkierungen der Komplement-DPn, vgl. dazu (1).

(7) a. John ran in the forest (lok,\*dir)

b. John ran (in)to the forest (\*lok, dir)

Von der Tatsache, dass das Englische über ein verkümmertes Kasussystem verfügt, ist zu erwarten, dass es PPn gibt, die sowohl direktional als auch lokal interpretiert werden können, vgl. (8) (Noonan 2010:162) und (9) (Gehrke 2007:100). Ob dies beim Chinesischen, einer im Hinblick auf das morphologische Kasussystem dem Deutschen entgegengesetzten Sprache, auch der Fall ist, wird im nächsten Abschnitt thematisiert.

(8) John ran under the bridge (lok, dir)

(9) Oscar jumped in the lake (lok, dir)

## 2.2 Chinesisch

Im Standardchinesischen (Mandarin) können einige raumbezogene PPn neben der präverbalen Position auch die postverbale Position einnehmen. In D. Liu (2008:60) sind die folgenden aufgeführt: “在 *zai* ‘at’, 往 *wang* ‘towards, to’, 向 *xiang* ‘in the direction of’, 到 *dao* ‘to’, 于 *yu* ‘at, to, from’, 自 *zi* ‘from, since’”. Darunter kann aber nur *zai* (eventuell auch *yu*) mit stativen Verben kookkurieren (s. (10)).<sup>4</sup> Dabei spezifiziert die *zai*-Phrase den Ort, wo das vom Verb denotierte Ereignis sich ereignet.

---

<sup>4</sup> Stative Verben (stative verb) wie *schlafen*, *wohnen*, *bleiben* sind von Zustandsverben (state verb) wie *sein*, *besitzen*, *wissen*, *verstehen* (Bussmann 1990:871) zu unterscheiden. Für nähere Auseinandersetzungen ist u.a. auf Mittwoch (2005), Maienborn (2008) zu verweisen.



- (10) 他們 生活 在/于/\*到/\*往/\*向/\*自 災區  
 tamen shenghuo zai/yu/\*dao/\*wang/\*xiang/\*zi zaiqu  
 sie leben auf/in/zu/nach/nach/von Katastrophe Gebiet  
 ‘Sie leben in dem von der Katastrophe betroffenen Gebiet.’

Dementsprechend kann sich die *zai*-Phrase anti-kausativen Verben anschließen. Die Beispiele in (11) (Liu 2009:111,112) stellen deutlich dar, dass lokale *zai*-Phrasen, aber keine direktionale *dao*-Phrasen erlaubt sind.

- (11) a. 許多 稻子 爛 在/\*到 田裡  
 xuduo daozi lan zai/\*dao tian-li  
 viele Reispflanze verrotten auf Ackerland-in  
 ‘Viele Reispflanzen sind auf dem Ackerland verrottet.’
- b. 張三 出現 在/\*到 眼前  
 zhangsan chuxian zai/\*dao yan-qian  
 Zhangsan erscheinen auf Auge-vor  
 ‘Zhangsan ist vor den Augen erschienen.’

Die raumbezogenen *zai*-Phrasen können aber auch beispielsweise mit den unter (12) (Liu 2009:103,114) aufgeführten dynamischen Verben (einschließlich Bewegungsverben der Art und Weise) zusammen auftreten. In diesem Fall gibt die eingebettete DP das Ziel an, das der Referent der Subjekt-DP am Schluß des Ereignisses erreicht. Daher ist hier die *zai*-Phrase mit einer direktionalen PP zu identifizieren, die dieselbe Distribution wie *dao*-Phrasen zeigt, die ausschließlich direktionale Bedeutung haben.

- (12) a. 雨水 打 在/到 窗戶上  
 yushui da zai/dao chuanghu-shang  
 Regentropfen schlagen auf Fenster-auf  
 ‘Regentropfen haben auf das Fenster geschlagen.’

b.	貓	跳	在/到	桌上
	mao	tiao	zai/dao	zhuo-shang
	Katze	springen	auf	Tisch-auf

‘Die Katze ist auf den Tisch gesprungen.’

Das Verhalten und die direktionale Lesart von *zai*-Phrasen in den Sätzen unter (12) sind jedoch überraschend. Denn von den Beispielen in (10) und (11) würde man erwarten, dass *zai*-Phrasen die Umgebung von Verben mit der Eigenschaft [+statisch] bevorzugen. Anschluss an dynamische Verben sollte daher eigentlich entweder überhaupt ausgeschlossen sein oder eine repetitive Interpretation erzwingen. Diese Erwartung trifft tatsächlich auf die lokalen PPn im Deutschen zu, wie den Sätzen in (13) (Maienborn 1994:197) zu entnehmen ist.

- (13) a. Gunda rennt in der Küche  
 b. Er springt auf dem Sofa

Aus der vergleichenden Perspektive vom Deutschen und Englischen her stellt sich also die Frage, warum keine Ambiguität in den chinesischen Sätzen unter (12) entsteht, obwohl es sich um eine morphologisch invariante Präposition handelt und die eingebettete DP keine erkennbare morphologische Kasusmarkierung aufweist? Ferner muss aufgeklärt werden, wie die direktionale Interpretation der raumbezogenen PPn in Kombination mit nicht-lokalen dynamischen Verben abgeleitet wird?

### 3. Analyse

Aus einer näheren Beobachtung geht hervor, dass die *zai*-Phrase konsequenterweise einen raumbezogenen Zustand denotiert. Jedoch könnte der Zustand entweder auf ein einfaches Ereignis oder einen Teil eines komplexen Ereignisses Bezug nehmen. Bezieht sich die *zai*-Phrase allein auf den abschließenden Teil eines komplexen Ereignisses, wird sie als eine direktionale PP aufgefasst, andernfalls als lokale PP. Aus dieser Beobachtung folgt, dass die lokale PP das Ereignis nicht abgrenzt, weil sie auf das ganze Ereignis Bezug nimmt, wohingegen die direktionale PP zu einem gebundenen Ereignis führt, indem sie den Resultatort

bzw. Resultatzustand einer Entität nach dem Vollzug der vom Verb eingeführten Handlung angibt.<sup>5</sup>

Die Annahme, dass *zai*-Phrasen im Wesentlichen lokale PPn sind, die unter gewissen Umständen erst zu direktionalen PPn „genötigt“ werden, erhält weitere Unterstützung von den Sätzen unter (14), die zeigen, dass *zai*-Phrasen mit strikt direktionalen Verben inkompatibel sind. Hingegen können die *dao*-Phrasen von direktionalen Verben ohne weiteres lizenziert werden.

- (14) a. 他 進入 到/\*在 屋子裡  
 ta jinru dao/\*zai wuzi-li  
 er eintreten in Haus-in  
 ‘Er ist ins Haus eingetreten.’
- b. 他 搬家 到/\*在 台北  
 ta banjia dao/\*zai Taibei  
 er umziehen in Taipei  
 ‘Er ist nach Taipei umgezogen.’

Hinzu kommt, dass *zai*-Phrasen von der Umgebung direktionaler Verben mit deiktischer Markierung (deictic directional verb) ausgeschlossen sind, siehe (15) (Liu 2009:104-105).

- (15) a. \*李四 來 在 門口  
 \*lisi lai zai menkou  
 Lisi kommen zu Tür  
 ‘Lisi ist zur Tür gekommen.’
- b. \*圓圓的 月亮 升 在 頭頂上  
 \*yuanyuande yueliang sheng zai touding-shang  
 rund Mond aufkommen auf Kopf-auf  
 ‘Der runde Mond ist über meinen Kopf aufgekommen.’

---

<sup>5</sup> Direktionale PPn, die die Quelle denotieren, erfüllen diese Bedingung nicht, und deshalb können das Ereignis auch nicht binden.

- c. \*張三 把 書 拿出 在 桌上  
 \*zhangsan ba shu nachu zai zhuo-shang  
 Zhangsan BA Buch hervorbringen auf Tisch-auf  
 ‘Zhangsan hat das Buch auf den Tisch hervorgebracht.’

Eine Ausnahme wären Sätze wie die unter (16) (Liu 2009:111,119). In (16) liegen direktionale Verben, die eine Abwärtsbewegung ausdrücken, vor. Liu (2009) weist darauf hin, dass die Sätze in (16) denen in (14) und (15) gegenüberstehen. Sie unterscheiden sich durch die Richtung der Bewegung. Die Richtung der von den Verben in (16) denotierten Bewegung ist absteigend.

- (16) a. 風 一吹， 許多 葉子 落 在 地上  
 feng yi chui xuduo yezi luo zai di-shang  
 Wind wehen viele Blätter fallen auf Boden-auf  
 ‘Der Wind wehte, viele Blätter fielen auf den Boden.’
- b. 李四 跌倒 在 地上  
 lisi die-dao zai di-shang  
 Lisi stolpern-fallen auf Boden-auf  
 ‘Lisi fiel auf den Boden.’

Meiner Ansicht nach sind die in (16) vorgestellten Ausnahmefälle nicht in der Spezialisierung auf eine absteigende Richtung zu verankern, sondern haben mit der Ereignisstruktur der Verben zu tun. Betrachten wir diesbezügliche Verben als anti-kausative Verben, dann stellen sie keine Ausnahme mehr dar. Wie oben am Beispiel von (11) ausgeführt wurde, fallen die *zai*-Phrasen in Kombination mit anti-kausativen Verben in die Kategorie der den Resultatzustand darstellenden PP.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den anti-kausativen Verben in (11) und denjenigen in (16) liegt darin, dass in (16) ein vorangehendes (und zugleich als das Teilereignis der Verursachung angesehenes) Ereignis explizit zum Ausdruck gebracht wird und die *zai*-Phrase als auf das daraus resultierende Teilereignis bezogen aufgefasst wird. In dieser Hinsicht nähert (16) sich (12) an. Bei (12) und (16) handelt es sich beide Male um eine komplexe Situation, in der der vorangehende Akt zur Änderung des Zustands einer Entität führt, und die *zai*-Phrase den daraus resultierenden raumbezogenen

Zustand darstellt. Im Gegensatz dazu wird bei (11) kein vorangegangenes Ereignis angegeben. Man erzielt eine inchoative Lesart, indem man eine implizite entgegengesetzte Situation voraussetzt.

Aus der bisherigen Diskussion folgt, dass streng direktionale Verben für direktionale PP subkategorisieren, und deswegen lokale *zai*-Phrase ausschließen. Die direktionale Lesart der *zai*-Phrase beruht auf der komplexen Ereignisstruktur des regierenden Verbs, wobei die Denotation der *zai*-Phrase sich als auf ein Teilereignis bezogen versteht. Dagegen ist die lokale *zai*-Phrase auf das ganze Ereignis bezogen und weist eine einfache Ereignisstruktur auf. Die einfache Ereignisstruktur erscheint übereinstimmend bei den drei Aktionsart-Klassen der Verben: Zustand (z.B. (10)), Achievement (z.B. (11)) und Aktivität (z.B. (17a) (Liu 2009:118)). Dieser Schluss bestätigt geradezu die Ansicht von Levin (1999).

- (17) a. 張三        走        在        路上  
         zhangsan    zou        zai        lu-shang  
         Zhangsan    gehen    auf        Straße-auf  
         ‘Zhangsan spaziert auf der Straße.’
- b. 張三        走        到        路上  
         zhangsan    zou        dao        lu-shang  
         Zhangsan    gehen    auf        Straße-auf  
         ‘Zhangsan spaziert auf die Straße.’

In Sätzen unter (17) erhalten die *zai*- und *dao*-Phrasen verschiedene Bedeutungen. Die *zai*-Phrase drückt aus, wo eine Entität während des Ereignisses ist. So befindet sich *Zhangsan* in (17a) auf der Straße, solange das Ereignis des Gehens stattfindet. Dagegen drückt die *dao*-Phrase den Weg/ die Richtung aus. So wird bei (17b) vorausgesetzt, dass *Zhangsan* nicht auf der Straße war, aber nachdem das Ereignis des Gehens stattgefunden hat, ist *Zhangsan* auf der Straße angekommen als das Resultat des Ereignisses. Die Differenzierung zwischen lokaler und direktonaler Interpretation ist also durch verschiedene Präpositionen gekennzeichnet. In dieser Hinsicht ähnelt (17) dem englischen Fall in (7).

Was die Ambiguität im Englischen wie in (8) und (9) betrifft, so kann man

chinesische Pendants folgender Art finden, siehe (18) (Liu 2009:114).

- (18) a. 導航雁          飛          在          前面  
daohangyan      fei          zai      qianmian  
Wildgans          fliegen      in      vorn  
'Die Wildgans fliegt vorne.'
- b. 一隻      蝴蝶                  飛          在          他的      肩膀上  
yi-zhi      hudie                  fei          zai      tade      jianbang-shang  
ein-Kl<sup>6</sup>      Schmetterling      fliegen      auf      seine      Schulter-auf  
'Ein Schmetterling flug auf seine/ seiner Schulter.'

Aus (18) ist zu ersehen, dass die *zai*-Phrase in Kombination mit demselben Verb sowohl eine lokale als auch eine direktionale Lesart erzeugen kann. Dies würde im Deutschen nicht passieren, da dort die eingebettete DP entweder mit Dativ oder Akkusativ markiert ist und folglich eindeutig ist hinsichtlich der damit verbundenen Interpretation. Anzumerken ist an dieser Stelle, dass im Unterschied zu Liu (2009) ich der Meinung bin, dass der Satz in (18b) neben der direktionalen auch eine lokale Interpretation zulässt. Die direktionale Interpretation ergibt sich, wenn man das Fliegen als eine einmalige Aktivität ansieht. Eine lokale Interpretation kann man jedoch auch bekommen, wenn man das Fliegen als eine durative Aktivität betrachtet, die aus wiederholenden Bewegungen des Fliegens besteht (vgl. Zwarts 2008). Deshalb kann die Schulter in (18b) sowohl die Endstation des Fliegens als auch den Ort, an dem die Aktivität bzw. der Zustand des Fliegens stattfindet, bezeichnen. Diese Ambiguität führe ich darauf zurück, dass eine lokale PP, die das ganze Ereignis lokalisiert, eine direktionale Interpretation erwirbt, wenn sie zur Lokalisierung eines Teilereignisses herab gestuft wird. In einer komplexen Ereignisstruktur stellt die eingebettete DP den Zielort dar, den eine Entität nach dem Vollzug der von dem Verb denotierten Aktivität am Schluß erreicht. Dabei ist die PP nur auf den Teil des Schlussereignisses bezogen. Angesichts der Umstandsänderung der Entität wird eine direktionale Lesart der PP abgeleitet, die einen impliziten, von der Entität zurückgelegten Weg hervorbringt. In Analogie zur Zustandsänderung (change of state)

---

<sup>6</sup> Kl: Klassifizierer.

verweist die Umstandsänderung (change of location) folglich auf ein gebundenes Ereignis.

Diese Analyse hat auch Gültigkeit für das Deutsche und das Englische. Die unterschiedlichen zugrundeliegenden Ereignisstrukturen sind im Deutschen mit verschiedenen Kasusmarkierungen morphologisch erkennbar. Die morphologische Kasusmarkierung im Deutschen kann deshalb nicht für ein grammatisches Mittel zur Disambiguierung der Semantik gelten. Stattdessen sollte sie als Reflex der internen Struktur der PP angesehen werden. Für das Englische gilt, dass die Disambiguierung auf die Ereignisstruktur des Verbs und die strukturelle Relation der PP zum Verb zurückgreift. In Abschnitt 4 werde ich weiterhin zeigen, dass die komplexe Ereignisstruktur durch die Projektion von Path<sup>0</sup> erkennbar gemacht wird.

#### **4. Die interne Struktur der raumbezogenen PPn**

##### **4.1 Dikken (2010)**

Dikken (2010) zufolge kann die interne Struktur raumbezogener PPn folgendermaßen angesetzt werden:

- (19) a. [<sub>CP</sub> C<sup>[SPACE]</sup> [<sub>DxP</sub> Dx<sup>[SPACE]</sup> [<sub>AspP</sub> Asp<sup>[SPACE]</sup> [<sub>PP</sub> P ...]]]]  
 b. [<sub>CP</sub> C<sup>[PLACE]</sup> [<sub>DxP</sub> Dx<sup>[PLACE]</sup> [<sub>AspP</sub> Asp<sup>[PLACE]</sup> [<sub>PlaceP</sub> P<sub>Loc</sub> ...]]]]  
 c. [<sub>CP</sub> C<sup>[PATH]</sup> [<sub>DxP</sub> Dx<sup>[PATH]</sup> [<sub>AspP</sub> Asp<sup>[PATH]</sup> [<sub>PathP</sub> P<sub>Dir</sub> {C<sup>[PLACE]</sup>P/Dx<sup>[PLACE]</sup>P/PlaceP}]]]]

In (19a) ist ein allgemeines Schema für raumbezogene PPn repräsentiert. C<sup>[SPACE]</sup>P ist die maximale Struktur der PPn. CP, DxP (Dx = Deixis) und AspP (Asp = Aspekt) sind optionale funktionale Projektionen, und kommen nicht in jeder Situation vor. Das Schema in (19b) zeigt, dass eine lokale PP eine Projektion von P<sub>Loc</sub> (d.i. Place<sup>0</sup>) ist, und folglich eine PlaceP. Demgegenüber zeigt das Schema in (19c), dass eine direktionale PP eine Projektion von P<sub>Dir</sub> (d.i. Path<sup>0</sup>) ist, und folglich eine PathP. Lokale sowie direktionale Interpretationen sind jeweils in der erweiterten Projektion CP kodiert, sei es eine erweiterte Projektion von Place<sup>0</sup> oder Path<sup>0</sup>. Am plausibelsten gilt die Annahme, dass die lokale PP als Komplement von P<sub>Dir</sub> analysiert wird. P<sub>Dir</sub> ist entweder lexikalisch oder leer. Ist P<sub>Dir</sub> lexikalisch, wird sie vom Verb selegiert und daraufhin ohne weiteres lizenziert. Ist P<sub>Dir</sub> dagegen null, dann muss sie zur

Lizensierung vom Verb inkorporiert werden. Allerdings muss das Verb eine direktionale Interpretation unterstützen, ansonsten scheitert die Inkorporation.

In Parallele zur verbalen Kategorie nimmt Dikken (2010:101) weiterhin an, dass auch raumbezogener Aspekt (spatial aspect, Asp<sup>[SPACE]</sup>) vorliegt, der zwei Varianten, Asp<sup>[PLACE]</sup> und Asp<sup>[PATH]</sup>, aufweist. Vergleicht man (20a) mit (20b), ergibt sich, dass es sich bei (20a) um ein gebundenes Ereignis, bei (20b) hingegen um ein ungebundenes Ereignis handelt, obwohl beide PPn Direktionale denotieren. Bei (21a) und (21b) geht es um lokale PPn, aber die Sätze unterscheiden sich dadurch, dass *tanzen* ein duratives Merkmal besitzt und daher ein ungebundenes Ereignis darstellt, während *springen* punktuell und folglich gebunden ist. In Anbetracht der Tatsache, dass raumbezogene PPn mit dem verbalen Aspekt interagieren, sind lokale PPn zwischen gebunden und ungebunden zu unterscheiden.

(20) a. Er tanzt in die Disco

b. Er tanzt entlang dem Fluss

(21) a. Er tanzt in der Disco

b. Er springt in der Disco

Die Projektion von Dx<sup>[SPACE]</sup> hat ebenfalls zwei Varianten, Dx<sup>[PLACE]</sup> und Dx<sup>[PATH]</sup>. Realisierungen von Dx<sup>[PLACE]</sup> im Deutschen sind beispielsweise *hier* und *da/dort*, und für Dx<sup>[PATH]</sup> *hin* und *her*. Beispiele dafür sind in (22) (vgl. Dikken 2010:101) angeführt.

(22) a. auf dem Dach *da*

b. auf das Dach *hinauf/über/unter*

c. aus dem Haus *heraus*

## 4.2 Chinesisch

Im Folgenden wird die von Dikken vorgeschlagene Struktur für die hier betrachteten chinesischen Fälle implementiert. Lokale PPn wie in (11a), hier als (23a) wiederholt, erhalten dem Schema (19b) nach die syntaktische Repräsentation (23b).<sup>7</sup>

---

<sup>7</sup> Die in der lokalen PP eingebetteten raumdenotierenden DPn werden gegebenenfalls von einem



(23) Lokale PPn

- a. 許多          稻子          爛          [在          田裡]  
       xuduo        daozi        lan        zai        tian-li
- b.  $[_{CP} C^{[PLACE]} [_{DXP} DX^{[PLACE]} [_{AspP} Asp^{[PLACE]} [_{PlaceP} P_{Loc}=zai [_{DPlace} tian-li]]]]]$

Direktionale PPn haben zwei Varianten, zum einen mit einem lexikalischen Kopf, z.B.  $P_{Dir}=dao$ , und zum andern mit einem lexikalisch leeren Kopf,  $P_{Dir}=\emptyset$ . Erstere Möglichkeit illustriert die PP in (14a), hier als (24a) wiederholt, die von direktionalen Bewegungsverben subkategorisiert ist. Sie erhält somit die Repräsentation (24b) infolge des Schemas (19c).

(24) Direktionale PPn

- a. 他    進入    [到    屋子裡]  
       ta    jinru    dao    wuzi-li
- b.  $[_{CP} C^{[PATH]} [_{DXP} DX^{[PATH]} [_{AspP} Asp^{[PATH]} [_{PathP} P_{Dir}=dao [_{PlaceP} P_{Loc}=\emptyset [_{DPlace} wuzi-li]]]]]]]$

Die Struktur der direktionalen PPn wie in (12a), hier als (25a) wiederholt, sei mit (25b) angegeben. Dabei gilt die PlaceP als Komplement einer leeren  $P_{Dir}$ .

(25) Direktionale PPn

- a. 雨水          打    [在          窗戶上]  
       yushui        da    zai        chuanghu-shang
- b.  $[_{CP} C^{[PATH]} [_{DXP} DX^{[PATH]} [_{AspP} Asp^{[PATH]} [_{PathP} P_{Dir}=\emptyset [_{PlaceP} P_{Loc}=zai [_{DPlace} chuanghu-shang]]]]]]]$

Im folgenden wird demonstriert, dass ein  $P_{Dir}$ -Kopf gemäß dem Schema (19c) verschiedene Kategorien als Komplement selegieren kann. Zu besprechen sind zuerst die verschiedenen Analysevorschlage (vgl. (26b) vs. (26c)) fur die Konstruktion mit nominalen deiktischen Kennzeichnungen 這邊/那邊 *zhebian/nabian* ‘hier/dort’. Die

---

Lokalisierer hinzugefugt, der in Huang et al. (2009), Liu (1998) und Sun (2008) als DP-Enklise (clitic), aber in D. Liu (2008) und Djamouri et al. (2011) als Postposition angesehen wird. Hier gehe ich nicht auf die detaillierte Diskussion ein, stattdessen wird der Komplex als DPlace aufgefasst.

Repräsentation (26b) wird abgelehnt, weil die Markierung von *zhebian/nabian*<sup>[PLACE]</sup> mit der Eigenschaft von  $Dx^{[PATH]}$  offenbar in Konflikt steht. Die Tatsache, dass der Satz (26a) grammatisch ist, spricht dafür, dass *zhebian/nabian*<sup>[PLACE]</sup> in einer Projektion von  $Dx^{[PLACE]}$  eingebettet ist. Daraus folgt, dass statt einer PlaceP eine  $Dx^{[PLACE]}P$  als Komplement eines leeren  $P_{Dir}$  angesehen werden soll, wie (26c) zu entnehmen ist.

- (26) a. 雨水 打 [在 窗戶 這邊/那邊]  
 yushui da zai chuangu zhebian/nabian  
 b. \* $[_{CP}C^{[PATH]}[_{DXP}[_{ASP}ASP^{[PATH]}[_{Path}P_{Dir}=\emptyset[_{PlaceP}zai\ chuangu]]]]zhebian/nabian^{[PLACE]}]$   
 c.  $[_{CP}C^{[PATH]}[_{DXP}Dx^{[PATH]}[_{ASP}ASP^{[PATH]}[_{Path}P_{Dir}=\emptyset[_{DXP}[_{PlaceP}zai\ chuangu]]zhebian/nabian^{[PLACE]}}]]]]]$

Diese Analyse erhält weitere Unterstützung durch die Inkompatibilität mit den verbalen deiktischen Kennzeichnungen 來/去 *lai/qu* ‘her/hin’, wie in (27a) exemplifiziert. (27b) weist darauf hin, dass, wenn ein leeres  $P_{Dir}$  eine PlaceP selegieren würde, man erwarten sollte, dass *lai/qu*<sup>[PATH]</sup> nicht in PlaceP eingebettet ist, sondern als der deiktische Kopf  $Dx^{[PATH]}$  gilt, und folglich mit der direktionalen Bedeutung kompatibel sein müsste. Wenn man aber stattdessen (27c) annimmt, wo  $P_{Dir}=\emptyset$  eine  $Dx^{[PLACE]}P$  selegiert, ergibt sich die Ungrammatikalität aus der Unverträglichkeit von *lai/qu*<sup>[PATH]</sup> und  $Dx^{[PLACE]}$ .

- (27) a. \*雨水 打 [在 窗戶(上) 來/去]  
 \*yushui da zai chuangu-shang lai/qu  
 b. \* $[_{CP}C^{[PATH]}[_{DXP}[_{ASP}ASP^{[PATH]}[_{Path}P_{Dir}=\emptyset[_{PlaceP}zai\ chuangu-shang]]]]lai/qu^{[PATH]}]$   
 c. \* $[_{CP}C^{[PATH]}[_{DXP}Dx^{[PATH]}[_{ASP}ASP^{[PATH]}[_{Path}P_{Dir}=\emptyset[_{DXP}[_{PlaceP}zai\ chuangu-shang]lai/qu^{[PATH]}}]]]]]$

Aufgrund des Kontrasts zwischen (26) und (27) ist zu schließen, dass bei direktionalen *zai*-Phrasen der leere  $P_{Dir}$ -Kopf als Komplement eine  $Dx^{[PLACE]}P$  selegiert.

Für die Annahme, dass die nominalen deiktischen Kennzeichnungen

*zhebian/nabian* ‘hier/dort’ und die verbalen deiktischen Kennzeichnungen *lai/qu* ‘her/hin’ in der erweiterten Projektion von  $P_{Loc}$  basisgeneriert werden, sprechen auch die folgenden Verteilungsbeschränkungen:

- (28) a. 許多 稻子 爛 [在 田(裡) 這邊/那邊]  
           xuduo daozi lan zai tian-li zhebian/nabian  
       b.  $[_{CP} C^{[PLACE]} [_{DXP} [_{AspP} Asp^{[PLACE]} [_{PlaceP} P_{Loc}=zai [_{DPlace} tian-li]]]] [zhebian/nabian^{[PLACE]}]]]$
- (29) a. \*許多 稻子 爛 [在 田(裡) 來/去]  
           \*xuduo daozi lan zai tian-li lai/qu  
       b.  $*[_{CP} C^{[PLACE]} [_{DXP} [_{AspP} Asp^{[PLACE]} [_{PlaceP} P_{Loc}=zai [_{DPlace} tian-li]]]] [lai/qu^{[PATH]}]]]$

Der Gegensatz zwischen (28) und (29) zeigt, dass anti-kausative Verben mit den nominalen deiktischen Kennzeichnungen *zhebian/nabian* ‘hier/dort’ kompatibel sind, aber inkompatibel mit den verbalen deiktischen Kennzeichnungen *lai/qu* ‘her/hin’. Die Ungrammatikalität von (29) resultiert also aus der falschen Selektion von  $Dx^{[PATH]}$  für  $C^{[PLACE]}P$ . Dagegen stimmen bei (28) die Lokale kennzeichnenden Merkmale überein und die Konstruktion gilt als konvergente Derivation.

Im Gegensatz zu (29) sind die verbalen deiktischen Kennzeichnungen *lai/qu* ‘her/hin’ mit Bewegungsverben wie erwartet kompatibel, siehe (30). Jedoch benötigt die unerwartete Akzeptabilität des Satzes in (31a) eine Erklärung.

- (30) a. 他 進入 [到 屋子裡 來/去]  
           ta jinru dao wuzi-li lai/qu  
       b.  $[_{CP} C^{[PATH]} [_{DXP} [_{AspP} Asp^{[PATH]} [_{PathP} P_{Dir}=dao [_{DPlace} wuzi-li]]]] [lai/qu^{[PATH]}]]]$
- (31) a. 他 進入 [到 屋子 這邊/那邊]  
           ta jinru dao wuzi zhebian/nabian  
       b.  $[_{CP} C^{[PATH]} [_{DXP} Dx^{[PATH]} [_{AspP} Asp^{[PATH]} [_{PathP} P_{Dir}=dao [_{DXP} [_{PlaceP} wuzi]] [zhebian/nabian^{[PLACE]}]]]]]]]$

Eine Möglichkeit ist anzunehmen, dass bei (31a) als Komplement von *dao* die Projektion von  $Dx^{[PLACE]}$  fungiert, so wie in (31b) dargestellt. Als Alternative ist

aufgrund der komplementären Verteilung von *zhebian/nabian* und Lokalisierer anzunehmen, dass *zhebian/nabian* wegen deren Adjazenz zum nominalen Ausdruck als Enklitika in Frage kommen.

Weitere Evidenzen für die hier vertretene Analyse, dass die verbalen deiktischen Kennzeichnungen *lai/qu* ‘her/hin’ nicht an die VP adjungiert, sondern in  $C^{[SPACE]}P$  eingebettet sind, kommen aus den folgenden Daten. Vergleicht man (32a) mit (27a), kann man sehen, dass *dao* als lexikalische Realisierung von  $P_{Dir}$  mit *lai/qu* verträglich ist. Wenn die verbalen deiktischen Kennzeichnungen *lai/qu* an die VP adjungiert werden würden, müssten sie eigentlich bei denselben Verben mit den gleichen Interpretationen, hier einheitlich Direktionalen, das gleiche Verhalten aufweisen. Das unterschiedliche Verhalten zeigt also, dass *lai/qu* Teil der  $C^{[SPACE]}P$  ist. Bei (33a) verhält es sich ähnlich wie bei (31a). Entweder nimmt man (33b) an, oder hält *zhebian/nabian* für Enklitika.

(32) a. 雨水 打 [到 窗戶上 來/去]

yushui da dao chuanguhu-shang lai/qu

b.  $[_{CP}C^{[PATH]}[_{D_{XP}}[_{ASP}P\text{Asp}^{[PATH]}[_{PathP}P_{Dir}=\text{dao}[_{PlaceP}\text{chuanguhu-shang}]]][\text{lai/qu}^{[PATH]}]]]$

(33) a. 雨水 打 [到 窗戶 這邊/那邊]

yushui da zai chuanguhu zhebian/nabian

b.  $[_{CP}C^{[PATH]}[_{D_{XP}}[_{ASP}P\text{Asp}^{[PATH]}[_{PathP}P_{Dir}=\text{dao}[_{D_{XP}}[_{PlaceP}\text{chuanguhu}][\text{zhebian/nabian}^{[PLACE]}]]]]]]]$

Ferner kann man beobachten, dass *lai/qu* der direktionalen *dao*-Phrase vorangehen können, vgl. (34). Dies ist für *zhebian/nabian* ausgeschlossen, da *zhebian/nabian* tief in der lokalen PP eingebettet sind, vgl. dazu die Konstruktionen in (35).

(34) a. 雨水 打 [來/去 到 窗戶上]

yushui da lai/qu dao chuanguhu-shang

b. 他 進 [來/去 到 屋子裡]

ta jin lai/qu dao wuzi-li

- (35) a. \*雨水 打 [這邊/那邊 到 窗戶]  
           \*yushui da zhebian/nabian dao chuanguhu  
       b. \*他 進 [這邊/那邊 到 屋子]  
           \*ta jin zhebian/nabian dao wuzi

Die Unmöglichkeit von Konstruktionen wie in (36) und (37) bestätigt ohnehin die Beobachtung von Koopman (2000) und auch von Dikken (2010) zum Niederländischen, dass Lizenzierung von Path (d.i. P<sub>Dir</sub>) nie von Elementen aus der eingebetteten lokalen PP gewährleistet wird.

- (36) a. \*許多 稻子 爛 [來/去 在 田裡]  
           \*xuduo daozi lan lai/qu zai tian-li  
       b. \*雨水 打 [來/去 在 窗戶上]  
           \*yushui da lai/qu zai chuanguhu-shang
- (37) a. \*許多 稻子 爛 [這邊/那邊 在 田裡]  
           \*xuduo daozi lan zhebian/nabian zai tian-li  
       b. \*雨水 打 [這邊/那邊 在 窗戶]  
           \*yushui da zhebian/nabian zai chuanguhu

### 4.3 Deutsch

In Abschnitt 3 habe ich ausgeführt, dass die Kasusmarkierung im Deutschen als Reflex der internen Struktur der PP betrachtet werden soll. Dikken (2010:115) zufolge ist die aspektuelle funktionale Kategorie, die lokale bzw. direktioanle PPn als Komplement nimmt, für Kasusmarkierung zuständig. Kasus wird sozusagen in der Domäne vom Asp-Kopf abgecheckt. Die Kasuszuweisung einbeziehend erhalten lokale PPn, wie unter (1a), hier als (38a) wiederholt, dem Schema (19b) zufolge die syntaktische Repräsentation (38b). (38b) besagt, dass die in der PlaceP eingebettete DP im Dativ vorkommt, weil der die PlaceP selegierende Asp-Kopf für Dativ spezifiziert ist.

(38) Lokale PPn

- a. Er tanzt [in der Disco]  
 b.  $[_{CP}C^{[PLACE]}[_{DXP}DX^{[PLACE]}[_{AspP}Asp^{[PLACE]} <DAT>[_{PlaceP}P_{Loc}=in [_{DPlace}der Disco]]]]]$

Ähnlich wie im Chinesischen haben direktionale PPn im Deutschen zwei Varianten, einmal mit einem lexikalisch leeren Kopf,  $P_{Dir}=\emptyset$ , oder mit einem lexikalischen Kopf,  $P_{Dir}=zu, von, nach, aus$  usw. Für die erstere gilt die PP unter (1b), hier als (39a) wiederholt. Sie erhält die Repräsentation (39b) infolge des Schemas (19c). Da der  $P_{Dir}$ -Kopf leer ist, muss er zur Lizenzierung vom Verb inkorporiert werden. Damit erwirbt er via Bewegung zum  $Asp^{[PATH]}$  Akkusativ als Kasus (bzw. via feature-checking), der durch die eingebettete DP morphologisch realisiert wird.

(39) Direktionale PPn

- a. Er tanzt [in die Disco]  
 b.  $[_{CP}C^{[PATH]}[_{DXP}DX^{[PATH]}[_{AspP}Asp^{[PATH]} <AKK>[_{PathP}P_{Dir}=\emptyset [_{PlaceP}P_{Loc}=in [_{DPlace} die Disco]]]]]]]$

Im Fall vom lexikalischen direktionalen Kopf ist der die PathP selegierende Asp-Kopf für Dativ spezifiziert. Demnach hat (3a), hier als (40a) wiederholt, die Repräsentation (40b).<sup>8</sup>

(40) Direktionale PPn

- a. Er rannte [zu dem Laden]  
 b.  $[_{CP}C^{[PATH]}[_{DXP}DX^{[PATH]}[_{AspP}Asp^{[PATH]} <DAT>[_{PathP}P_{Dir}=zu [_{PlaceP}P_{Loc} [_{DPlace}dem Laden]]]]]]]$

Da Kasuszuweisung vom  $Asp^{[SPACE]}$  bedingt ist, ist darauf zu achten, dass Kasuszuweisung nicht als lexikalische Eigenschaft der jeweiligen Präpositionen zählt. In (38b) ist beispielsweise die PlaceP *in der Disco* das Komplement von  $Asp^{[PLACE]} <DAT>$ , weshalb die eingebettete DP im Dativ steht. Im Fall von (39b) ist die PathP *in die Disco* das Komplement von  $Asp^{[PATH]} <AKK>$ , deshalb steht die

---

<sup>8</sup> Noonan (2010) vertritt eine andere Ansicht, demnach *zu* in  $P_{Loc}$  basisgeneriert ist.

eingebettete DP im Akkusativ. Dabei ist die PlaceP in die PathP eingebettet und spielt folglich keine Rolle für die Kasusmarkierung. Gleichfalls ist aus der Struktur (40b) abzulesen, dass die PathP *zu dem Laden* Komplement von  $\text{Asp}^{[\text{PATH}]}\langle \text{DAT} \rangle$  ist, folglich ist die eingebettete DP mit Dativ markiert. Die Analyse widerspricht somit der traditionellen Annahme, dass Präpositionen ihren DP-Komplementen Kasus zuweisen.

## 5. Schlußfolgerung

Die vorliegende Arbeit vertritt die These, dass die Semantik der raumbezogenen PPn in der Struktur kodiert ist. Direktionale Bedeutung ist in der erweiterten Projektion von  $P_{\text{Dir}}$  kodiert, wohingegen lokale in der von  $P_{\text{Loc}}$ . Der Grund dafür, warum lokale PPn unter Umständen eine direktionale Interpretation bekommen können, wird darauf zurückgeführt, dass sie in einer phonetisch leeren PathP eingebettet sind. Dies gilt sowohl für das Deutsche als auch für das Chinesische. Für das Deutsche muss der leere  $\text{Path}^0$ -Kopf durch die notwendige Anhebung zum aspektuellen  $\text{Asp}^{[\text{PATH}]}$ -Kopf den Akkusativ abchecken. Für das Chinesische muss der leere  $\text{Path}^0$ -Kopf ebenfalls zur Lizenzierung zum Verb angehoben werden. Daraufhin ist zu erwarten, dass Verben für die Inkorporation Beschränkungen aufweisen, weshalb postverbale *zai*-Phrasen in Kombination mit gewissen Verben nicht auftreten können.<sup>9</sup>

Ferner kann die Frage, warum direktionale, nicht aber lokale PPn Einfluss auf den Aspekt des Satzes haben, mit Hilfe der Ereignisstruktur beantwortet werden. Während lokale PPn das ganze Ereignis betreffen, beziehen sich direktionale PPn, die das Ziel denotieren, auf den Schlussteil des Ereignisses. Daraus folgt, dass mit der direktionalen PP das Ereignis gebunden wird.

---

本論文於 2011 年 4 月 14 日到稿，2011 年 10 月 3 日通過審查。

---

<sup>9</sup> Für mehr zu skalaren Verben im Zusammenspiel mit postverbalen *zai*-Phrasen siehe Luo (2011).

## Literatur

- Abraham, Werner (2010): Misleading homonymies, economical PPs in microvariation, and P as a probe. *Mapping Spatial PPs: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ed. by Cinque, Guglielmo and Luigi Rizzi, 261-2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ssmann, Hadumod (1990): *Lexikon der Sprachwissenschaft*.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 Verlag.
- Dikken, Marcel den (2010): On the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locative and directional PPs. *Mapping Spatial PPs: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ed. by Cinque, Guglielmo and Luigi Rizzi, 74-12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jamouri, Redouane, Waltraud Paul & John Whitman (2011): Postpositions vs. preposi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articulation of disharmony. (To appear)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Disharmonic Word Orders* ed. by Biberauer, T. & Sheehan, M.
- Gehrke, Berit (2007): On directional readings of locative prepositions. *Proceedings of ConSOLE XIV 2007*, 99-120. <http://www.sole.leidenuniv.nl>.
- Huang, C.-T. James, Audrey Li,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opman, Hilda (2000): Prepositions, postpositions, circumpositions, and particles: The structure of Dutch PPs. *The Syntax of Specifiers and Heads* ed. by Koopman, Hilda, 204-260. London: Routledge.
- Levin, Beth (1999): Objecthood: An event structure perspective. *CLS 35: The Main Session (1999)*, 223-247.
- Liu, Danqing (2008): Syntax of space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Conspiring and competing principles and factors. *Space in Languages of China: Cross-linguistic,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ed. by Xu, Dan, 35-67.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 Liu, Feng-Hsi (1998): A clitic analysis of locative particl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4.1, 48-70.
- Liu, Feng-Hsi (2009): Aspect and the post-verbal *zai* phrase in Mandarin Chinese. *Studie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Functional Approaches* ed. by Xing, Janet Zhiquan, 103-129.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uo, Lyih-Peir (2011): An aspectual approach to the postverbal locative *zai*-phrase.



- Proceedings of the 23rd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3), Vol. 2 ed. by Jing-Schmidt, Zhuo, 66-81.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 Maienborn, Claudia (1994): Kompakte Strukturen: Direktionale PPn und nicht-lokale Verben. *Kognitive Linguistik Repräsentation und Prozesse*. S. Felix, Ch. Habel, and G. Rickheit (Hrsg.), 229-249.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Maienborn, Claudia (2008): On Davidsonian and Kimian states. *Existence: Semantics and Syntax* ed. by Comorovski, Ileana and K. von Heusinger, 107-130.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V.
- Mittwoch, Anita (2005): Do states have Davidsonian arguments? Some empirical considerations. *Event Arguments: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ed. by Maienborn, Claudia and Angelika Wöllstein, 69-87.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 Noonan, Máire (2010): À to Zu. *Mapping Spatial PPs: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ed. by Cinque, Guglielmo and Luigi Rizzi, 161-19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n, Chaofen (2008): Two condition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locative. *Space in Languages of China: Cross-linguistic,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ed. by Xu, Dan, 199-223.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 Wunderlich, Dieter (1993): On German um: Semantic and conceptual aspects. *Linguistics* 31, 111-133.
- Zwarts, Joost (2005): The case of prepositions: Government and compositionality in German PPs. Ms., Radboud Universiteit/Nimway and Utrecht University.
- Zwarts, Joost (2008): Aspects of a typology of direction. *Theoretical and Cross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he Semantics of Aspect* ed. by Rothstein, Susan, 79-10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文學作品中文字意象的研究一

## 以詩人布洛克詩中五大文字意象為例

廖梨月 / Liao Lee-Yueh

清雲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助理教授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Ching Yun University

### 【摘要】

布洛克為俄羅斯現代主義詩歌的一代宗師，為了探索其詩中神秘的隱喻象徵，此論文針對布洛克詩中五大文字意象進行統整分析：「色彩意象」、「聲音意象」、「自然意象」、「神性意象」、「女性意象」。除了針對詩中文字意象所蘊涵之象徵意義進行研究，並和作家的思維、情感及當時的創作背景交錯分析，呈現象徵主義大師布洛克的創作特色。

### 【關鍵詞】

文字意象、布洛克、象徵主義

### 【Abstract】

Blok was a leader of the Russian Symbolist movement. In order to explore mysterious symbols of Blok's poetry, this paper will address the analysis of images in Blok's poetry, including five parts: the color's image (color, light), the sound's image, the image of nature, the God's image, and the women's image. In addition to analyzing poems' images, the analysis will involve Blok's life style, psychic features, n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traditional customs at that time.

### 【Keywords】

image, Blok, symbolism

## 一、前言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羅斯由農業社會逐漸過渡向工業社會，新的社會秩序文化建立之前，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在不確定社會氛圍下，紛紛投向精神的探索，由此萌生了不少文化思想流派，掀起一場嶄新的文化復興運動。這段時期就是「俄羅斯白銀時代」(約從 1890 至 1920 年)。其中詩歌文學創作，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以蓬勃發展。

在俄羅斯現代主義詩歌運動中，「象徵主義」學派就是個中的翹楚。他們強調藝術的三大要素：神祕主義的內容、象徵的手法、藝術感染力的擴大，以對抗當時俄羅斯文壇上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創作。象徵主義者認為象徵可以表現思想無現的一面，使的藝術變得崇高、晶瑩、剔透 (吳元邁 1998:26)。

在二十世紀的俄羅斯詩壇，人們如果想尋找一位普希金式的人物，布洛克應該是最無可爭議的人選。他的創作繼承了俄羅斯沉鬱、感傷、凝重的哲理抒情詩傳統，成為古典詩歌藝術的集大成者，又以神秘的筆觸展示了躁動、荒誕、虛無、絕望、放縱的現代人的生存狀態，成為俄羅斯現代主義詩歌的一代宗師。亞歷山大·布洛克的創作將象徵主義浪潮，推展至巔峰 (曾思藝 2004:125)。1980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他列為世界重點紀念的文化名人之一。

布洛克抒情詩裡蘊含神秘意味的柔美，隨著現實環境的改變，他在革命前的動盪接觸到生活的現實之後，美化神秘色彩受到現實的考驗。他的神祕主義信仰遇到人間醜陋便完全粉碎，一個可怕的道德問題突然如黑不見底的深淵迎面而來。

對布洛克而言，知識份子活在他們自造的一個假世界裡。他們和現實生活中飢餓的工人、農人流浪漢和那個人造世界是脫離的。理想與現實所造成的衝突、反抗、沮喪也反應在文字創作的特色上。

布洛克一再強調詩人的個人熱情，作為一位真正的詩人，那就應該充滿時代的精神。因為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詩人心靈裡最溫柔和親切的渴望，同樣也充滿著動盪和不安。他的詩時而和諧、時而充滿悲劇混亂、時而宣揚美的解放，此論文透過布洛克詩中各種意象的彙整分析，了解詩人的創作特色並印證體驗詩人個別化的過程。

此次布洛克詩中五大文字意象研究，將以語用學角度彙整分析不同語境中話語意義，尋找恰當表達和準確地理解，並確立創作中文字意義。就如同索振羽於《語用學教程》一書當提到：理解語言形式的「字面意義」是不夠的，還必須依據當時的語境推導出言語形式的「言外之意」(索振羽 2000:17)。對於文

學作品語言分析，除了注重「上下文語境」的研究，也不能忽視和文學創作者相關之「社會文化語境」(作者價值觀及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分析。透過不同語境的交錯分析才能突顯文字意象背後所隱藏的真正意涵。

## 二、內容

### I. 布洛克創作生平及特色

布洛克生於 1880 年，卒於 1921 年。布洛克是俄國象徵主義詩潮的傑出代表，他在詩歌創作和理論上既吸納了法國象徵主義的甘露，又汲取了本國詩歌傳統的營養，走出了具有俄國民族特色的象徵之路。布洛克在創作詩歌時，隨著不同時期的心境轉變及社會環境的變化，於作品中將許多想要表達的思想心情反映在詩歌的意象變化中，賦予詩中的意象更獨特更多元的象徵意義。

布洛克文學創作經驗，可將其詩歌探索之路分為三個階段：神祕主義的「正題」階段 (1898-1904)；懷疑主義的「反題」階段 (1904-1908)及最後的「合題」階段 (1908年後)。經由這三個階段連結，布洛克在詩中描述抒情主人翁「我」的道路：從最初的「和諧」，走向「混亂」與「悲劇」，再走向「美」的解放而進行的奮鬥，走向俄羅斯的新生活(曾思藝 2004:106)。

第一階「正題」時期是布洛克內心對美好理想追求的階段，此時期的布洛克深受俄國象徵主義代表人及哲學思想家索羅維耶夫 (В. Соловьев<sup>1</sup>) 神祕主義的影響，相信藝術的魔力，認為唯有藝術的象徵才能表達無法言語的世界奧秘。此時的布洛克一心嚮往真善美的崇高境界。第一階段代表的核心詩章是《麗人吟》(“Стихи о прекрасной даме”)，此時在詩人心目中「麗人」是永恆靈魂的象徵，其意象是崇高的、浪漫的、上天的，此時期強調的是「美」、「善」、「愛」的力量與精神。

第二階段為「反題」時期，具有懷疑主義色彩，是布洛克創作的重要轉折時期。這時整個世界開始動盪不安，超出詩人所能控制的局面並引起自身生命的壓制感，此時的布洛克無法適應外部世界而走向懷疑和自我否定，逐漸背離崇善的象徵化世界，放棄了索羅維耶夫的神祕主義，轉向反映現實生活和社會鬥爭的重大題材。在創作的第二階段，布洛克的世界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05 年第一次革命對布洛克的創作道路起到關鍵性的影響，他關注起日常生活，受到貧窮及政府壓迫的痛苦世界。此階段的分析將以詩集《城市》(“Город”)為基礎。

---

<sup>1</sup> В. Соловьев 俄國象徵主義代表人之一，哲學思想家。

第三階段「合題」時期呈現對現實的一種嶄新、深層的思考，布洛克想引導混亂的世界重新走向統一的和諧。一方面揚棄過去的束縛，另一方面又把過去種種特徵整合起來。布洛克在 1911 致別雷(А. Белый<sup>2</sup>)的信上曾說：「我全部詩篇加在一起，乃成爲「人形成過程的三部分」：從一瞬間極度燦爛的閃亮開始，通過必經的沼澤森林，走向絕望、詛咒、報復……到誕生一個社會的人，一個藝術家，他勇敢地放眼世界，他有權去研究諸多形式，去審視善與惡的雛形…」(阿格諾索夫 2001:206)。此階段分析將以具代表性詩集《可怕的世界》(“Страшный мир”)及長詩《十二人》(“Двенадцать”)爲基礎。

## II. 詩性語言與文字意象

文字的創作類別中，詩歌語言最能突出表現出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區別。就俄國形式主義者雅各布森(Роман Якобсон)觀點：文學性即「詩性語言」，是一種語言藝術(Якобсон 1975:198)。詩歌的語言通常將一般語言的陳述方式打亂，使得平常的世界變得陌生。透過詩歌語言的結構規律和語言的創造性，比起日常生活語言更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

就如同史柯洛夫斯基(В. Шкловский)表示：文學敘述「生疏化」或「陌生化」的主要目的，是將一成不變尋常語言打破，重建語言的魅力與藝術感(Шкловский 1929:5)。根據蘇聯符號學家洛特曼(Ю. Лотман)的看法，語言中除了一般溝通的「自然語言」之外，還有一種以「自然語言」爲基礎所發展出來的「進階語言」，而詩的語言就是「進階語言」的代表，因爲其意義有兩層：自然語言的意義加上附加聯想的意義(Лотман 1970:75)。

文學語言的特性就在於它活化了詞語的全部潛能，使它具有遠多於其在日常語言中所具有的豐富含義。對應俄國形式主義者雅各布森的言語功能理論，「受話者」爲了接收完整的「信息」，需要了解文本中每個最小「意符」於「詩化的」、「文學的」功能主導之下，互相結合作用所產生的複雜語意模式(Якобсон 1975:197-198)。

俄國語言學家帕切伯亮(А. А. Потебня)也表示詩化的文字是將現實經由美學轉換後的一種形式。也就是說詩或藝術本身是一種對現實的詮釋，爲了全新的、更複雜及崇高的人生目標所產生的轉換。於文字及詩學意象發展系統中，創作作品本身架構就反應了社會的生活及社會的理想，作者本身信念、世界觀及對於所描繪的事物的態度(Потебня 1976:339)。

<sup>2</sup> А. Белый俄羅斯象徵主義的主要代表詩人之一。

詩的語言一般的語言有所不同，詩是一種多度的語言，我們用來傳達消息的普通語言是一度的語言，這種語言只訴諸聽者的理智。詩歌是傳達經驗情感的語言，爲了傳達經驗，必須訴諸全體，不能只針對理解部份。詩不只涉及人的理解，還涉及人的感官、感情與想像。詩的理解度之外，還有感官度、感情度與想像度。爲了準確傳達詩歌語言中豐富的情感意蘊，詩人往往運用各種修辭的手法來突顯所要表達的意境，其目的是將文學的語言跳脫出一成不變的日常語言架構，變換語言的慣性與用法，爲了就是要引起讀者的注意，以求更豐富的展現語言所能承載的訊息，讓作品更顯餘蘊。

此次分析將以「文字意象」(Словесный образ) 爲主體，俄國語言學家維納庫爾 (Г. Винокур) 曾表示：文字意象和文學作品之形成密切相關，文字是文學作品的形成工具，但文字本身也是藝術美學中的主體。文學作品的中的文字之所具有特別的美學價值，在於文字不只是一種形式，於形成文字意象的同時文字傳達實質的內容，文字形式構成意象，而意象的又轉換成作品的思想內容 (Кожин 1964: 46)。透過「文字－意象－思想內容」這樣的模式，意象於文學作品的創作中具有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文學作品中的文字意象乃是美學角度爲基礎，於文學作品中作者利用文字將其個人的感受轉化成動人的具體的意象，進而讓讀者從意象中體會作者想要傳達的思想內涵 (Тимофеев 1976: 189)。

意象是一種客觀物象經過詩人的感情活動而創造出來的獨特意象，是一種賦予更多主觀情感色彩的具體藝術形象。「意」是指抽象的心意，是詩人主觀的情意，「象」是外在的具體物象，而文學作品中的「文字意象」就是作者透過文字將主觀的情感寄託於客觀的物象。具體的物象和抽象的情意結合，物象中有情意、情意中有物象。掌握詩歌意象，就能更進一步了解創作者蘊涵於詩歌中的思想情感及意境。

爲了使作品中所描繪的形象更具體化、生動化，感官度的傳達及文字意象的形成就很重要。詩人常常運用空間、時間、色彩、聲音的文字意象，作者將要表達的感情及訊息化結合感觀及想像，利用豐富精鍊的語句，變化語言的慣性，讓作品更具深度及層次。文學作品中透過各種文字編排組合，「意象」的形成就如同帕切伯亮所述：「於一開始呈現文字的外在形式，接著活化文字的內在形式」 (Потебня 1976:24)。

俄國詩學大師日爾蒙斯基 (В. Жирмунский) 於布洛克相關的研究中指出：布洛克是一名隱喻詩人，他將世界隱喻知覺確認為詩人基本屬性。對詩人而言，依照隱喻的幫助，可對世界進行浪漫的變形；這並不是一個隨心所欲的詩歌游擊，而是對生活神秘本質的真正領悟 (Жирмунский 1977: 46)。

詩歌的創作過程中布洛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創作個性，他認為「任何詩人的重心都在於他的創作個性」，「沒有人在其中的的詩句不過是一團的霧」，是被「玫瑰霞光照亮的孤獨沼澤」（袁順芝 2005:102）。布洛克獨特的創作個性顯現在其獨特的詩語用法，布洛克傾心把哲學思考與審美追求融入詩中，在不斷的探索和實驗中形成自己的詩歌風格，也因此，此論文透過詩歌中文字意象的彙整分析，將布洛克詩中抽象的象徵逐一剖析。

爲了探索布洛克詩中隱喻象徵的神秘及每一創作時期之意象特色變化，此論文將針對布洛克之文字意象進行統整分析：主要針對「色彩意象」（顏色、光線）、「聲音意象」、「自然力意象」、「神性意象」、「女性意象」共五大類。如上所述，分析的文本將以布洛克創作時期重要的三個階段（正、反、合）中各選一部具代表性的詩集爲基礎，研究其中五大意象的特色及和變化：《麗人吟》、《城市》、《可怕的世界》及長詩《十二人》<sup>3</sup>。以這三卷詩集及一部長詩爲主研究布洛克詩中意象的變化及其象徵意涵的轉變，由此可以更了解這位象徵主義大師在文學創作裡所呈現出的生命哲學以及對現實世界的詮釋和思考。

### III. 布洛克詩中五大文字意象特色及變化

布洛克十分喜歡運用各種色彩，這不僅僅體現於詩作中，在其相關的論文中也如此。於《論俄國象徵主義現狀》一文中，他用淡紫色、紫紅的黃昏來象徵詩人所面對的現實，並用藍色來象徵詩人理想。布洛克的另一篇論文《顏色與詞語》中也闡釋了色彩對於詩作的重要意義。他表示：在如海的詞語中，只有與顏色相符的詞語才適合詩人，這些詞語是多彩的、多情的和悅耳的（袁順芝 2005:103）。布洛克的詩歌色彩強烈豐富，他的感情，他的喜怒哀樂，都依附在他所創作的色彩中。

俄國詩人布留索夫(В. Брюсов)也評論說，「布洛克的詩是白晝的、不是夜間的，是色彩、不是色調，是豐富的聲音，不是叫喊與沉默」（Брюсов 1955:292）。也因此除了色彩的意象外，聲音意象的分析也是一大重點，布洛克的詩從森林之低吟到暴風雨之怒吼、提琴之狂叫、風之聲、豎琴聲、絃聲、濤聲，他所使用的比喻與象徵大都是有聲的，這些聲音的意象訴說著詩人所體驗的生命本質與真理(史朗寧 1981:256)。

除此之外，自然力意象及神的意象的分析也是了解布洛克創作特色的重要

<sup>3</sup> 分析文本來源為：Блок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бр. соч. : В 8 т. М.; Л., 1960-1963. 此論文中所引用之文本將註明冊數及頁碼。

一環。布洛克所稱之自然，是希臘哲學家所說的宇宙最基本的自然元素，是思想象徵之重要來源（于勝民 2000:86）。在布洛克的心中文明的世界背後存在著人們難以控制的自然力量，在這個非理性的世界裡，人不再是理性的奴隸，而是為本能與狂放的情欲所驅使的自然人。

布洛克深受索羅維耶夫的宗教哲學的影響，善用抽象的象徵來表示對於另一個世界(理想世界)的嚮往。布洛克曾說：「詩人的職責首先在於揭開外面表面的覆蓋，挖掘心靈的深處，詩人必須放棄世俗一切的羈絆」。他把詩歌作為神性的傳達，他認為詩人必須「內心自省、目光專注、神悟默契、與大自然混沌狀態相交融」（袁順芝 2005:102）。

除了宗教哲學之外，索羅維耶夫所提出「永恆女性」（вечная женственность）形象也深深的影響布洛克，「女性」意象成為布洛克創作主題中重要的一環。於布洛克的創作世界中，女性的意象常和自然及宗教的意象相互輝映，於不同的創作時期呈現不同的意象風貌。

以下將以布洛克三個重要的創作時期為基礎，探討詩中五大文字意象(女性、神性、自然、色彩、聲音)之特色及變化。

### 1. 正題時期

第一個階段「正題」（1898-1904）是詩人創作之初期階段，充滿神秘主義的色彩，《麗人吟》是詩人早期重要代表作之一，與其生活、情感經歷密切相關。該作品呈現詩人對於未來妻子門捷諾娃充滿戲劇性的愛情及對俄國詩人哲學家索羅維耶夫之思想的迷戀。這兩個因素成為該詩集直接現實的因素及理論的基礎。

於這階段中作者善用抽象的象徵手法表達孤獨靈魂對於另一個世界的嚮往，女性成為世界靈魂及理想世界的象徵。於《麗人吟》詩集中女性的意象以神秘、浪漫愛情為主旋律，許多方面表現索羅維耶夫以美為基礎改造世界的烏托邦理想。青年詩人布洛克就如同其他象徵派詩人一般，一方面對於現實感到不滿，一方面又無法真正進入現實的社會理解人民的想法，其思想常處於空虛徬徨孤獨憂傷的狀態。從詩人的角度來看，現實世界是污濁痛苦的，也因此於詩人的心中建構出另一個彼岸的理想世界。於這理想的世界中作者用神秘且朦朧的情境來寄託自己的情感。就如同於《麗人吟》詩集中，〈我走進了陰暗的教堂〉（“Вхожу я в темные храмы...”）詩中寫道：

*Вхожу я в темные храмы,  
Совершаю бедный обряд.*

*我走進了陰暗的教堂  
完成簡陋的儀式*



*Там жду я Прекрасной Дамы*                    我等待麗人的來臨  
*В мерцании красных лампад.*                在紅色燈火閃爍中  
( I, 232)

神祕朦朧的意境中，麗人的意象和神及大自然天空的意象合而為一，她是宇宙的靈魂，是神聖永恆的象徵。如在〈我與世界—雪花、溪流...〉（“Я и мир —снега, ручьи...”）詩歌中：

*Я и мир —снега, ручьи,*                        我與世界—雪花、溪流  
*Солнце, песни, звезды, птицы,*                太陽、飛鳥、歌聲、星宿  
*Смутных мыслей вереницы –*                還有一段理不清的思想  
*Все подвластны, все-Твои!*                一切受你主宰，為你所有  
( I, 193)

雖然麗人是世界的主宰，但於詩人的心中這如夢似幻的麗人是令人難以捉摸的，於創作中作者用神祕且朦朧的情境將麗人形象和色彩、宗教的意象及自然的意象密切結合，抒情主人翁把自己滿腔的柔情獻給如夢似幻的女神，期待和著女神的降臨。也因此朦朧的霧色成為此詩集中常見之大自然的意象，於〈你走過蔚藍色的道路...〉（“Ты прошла голубыми путями...”）詩歌中：

*Ты прошла голубыми путями,*                你走過蔚藍色的道路  
*За тобою клубится туман.*                周圍捲起煙霧  
*Над твоей голубою дорогой*                在你面前的蔚藍道路  
*Протянулась зловеющая мгла.*                壟罩著陰鬱霧幕  
( I, 112)

朦朧蔚藍的暮色如同晨霧、日落、黃昏帶著神聖神秘的色彩，這聖潔神秘的氣氛連結了大地的無聲的靜默，於〈黃昏的影子靜靜地...〉（Тихо вечерние тени...”）詩歌中：

*Тихо вечерние тени*                            黃昏的影子靜靜地  
*В синих ложатся снегах.*                    降落在湛藍的雪地上  
*Тихо вечерние тени*                            黃昏的影子靜靜地  
*Синих коснулись снегов.*                    觸動著藍色的雪地。  
( I, 77)

在這樣寂靜的世界中，聽見的只有祭禱的聲音，於〈我與你相會在日落時分...〉（“Мы встречались с тобой на закате...”）詩歌中：

*Белый стан, голоса панихиды*      白色的身軀，祭禱的聲音  
*И твое золотое весло.*              你那金色的船槳  
( I, 194)

依據索洛維耶夫認為：「愛就是尋找上帝，愛情就是對至高無上的主的感情，神秘的顫抖...」（圖爾科夫 1993:78）。布洛克繼承了這一觀點，認為愛情最能體現出人的神性美。也因此《麗人吟》中出現的女主人翁，有著既真實又神祕的色彩，有時像是在闡述著布洛克本身的愛戀瑣事，尤其是跟妻子門捷列耶娃的甜蜜或苦澀，都既隱晦又詳實地描繪在詩集中，但有時卻又像是單純在追尋心目中想要遠離世俗塵囂所高築起來的理想國度。

為了清晰分析《麗人吟》詩集中五大意象的特色及關係，可對應俄國學者曼慈（Минц）依此詩集中詞彙象徵意涵的分類：第一組為「上帝」（Бог）及「天空」（Небо）；第二組為「麗人」（Прекрасная Дама）；第三組為「大自然」（Природа）；第四組為「詩人」（поэт）（也就是詩中的「我」）；第五組是「人們」（люди）及「城市」（город）（Минц 1999:570）。於此分類中「上帝」和「天空」等詞彙在詩裡的地位被安置在上，而「人們」和「城市」則是被放置在下。I、II、III這三大類組合其實就等同於是世界核心的本原體，也就是布洛克闡述他夢想國度的理想特性，這些都屬於精神上的。詩人認為「上帝、天空」和「麗人」的地位是至高無上，是身處於這熟悉世界「我」與「人們」努力追求的梦想。

第一組至第三組之上帝、天空、麗人甚至是大自然，於此詩集中代表都不是實物，從字面上看來便給予人高尚及崇高的感受。位於第四組的詩人，處於理想國度及現實社會之交接模糊位置，詩集中顯示「我，與麗人相同」或是「我，與人們和城市分開」，便可看出布洛克在《麗人吟》裡，自身想擺脫所處的庸俗世界及嚮往純潔美麗的彼岸國度，詩人想藉著真善美代表的麗人來掙脫這個世俗的現實社會。但同時於詩集中也呈現不同角度，就是「我，與麗人分開」或是「我，與人們和城市相同」，布洛克經常在詩裡會透露出的迷惑與不安，他雖執拗地追求美好世界的麗人，但畢竟現實世界有著現實世界的殘酷，被塵囂世俗深深桎梏住，他的理想飛不高、走不遠，始終與幻想中的蔚藍遠方有著某種程度的距離。

麗人的理想意象於《麗人吟》詩集中和藍色意象相互連結，如在〈自由望著一片藍天...〉（“Свобода смотрит в синеву...”）、〈你走過蔚藍色的道路...〉（Ты

прошла голубыми путями...)、〈春天消融著河上的冰...〉(Весна в реке ломает льдины...)詩歌中所描繪的藍色幾乎都與「道路」(дорога)、「遠方」(даль)、「自由」(свобода)或「藍天」(синева)相連結。對於理想中麗人的追尋表現在對於彼岸世界理想的追求過程，也顯現在尋找一條藍色的康莊道路的願望，於是藍色的遠方幾乎也等同於是理想國度的代名詞。

對於布洛克來而言「藍色是一個神祕的色彩，代表著愛，是夢想中的感受、是創作時的夢境、在記憶或在想像裡的美好。它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日常生活裡的現實，而是內在的世界，詩人的真實嚮往，這一份愛帶有神祕和浪漫的色彩」(Ковтунова 2003:19)。

除了藍色理想意象之外，於詩人「正題」創作階段中金色及白色也呈現理想彼岸的象徵。如在〈我與你相會在日落時分...〉(“Мы встречались с тобой на закате...” )、〈我相信聖經的太陽...〉(“Верю в Солнце Завета...” )、〈燃燒神祕的標誌...〉(“Разгораются тайные знаки...” )等詩歌中，藍天與黃金色相連一起，詩中也常見炫目的金色與神聖的白色連用，像是白晝山頂鑲上金光、白色的身軀拿著金色的船槳等，於布洛克的詩中藍、白這兩種純粹的色彩與光亮飽和的明亮色相連結，呈現年輕夢幻的璀璨，金色象徵的希望展現在神祕聖潔的蔚藍與潔白中。

從顏色意象來看，在《麗人吟》裡白色、金色與藍色可與分類中的 I、II、III 類組相互連結，常連用的詞彙有「天使」(ангел)、「聖廟」(храм)、「天空」(небо)、「遠方」(даль)、「夢想」(мечта)等，這三種顏色是屬於詩人夢想國度的顏色，歸屬於精神靈魂層面。而黑色與紅色常相連的字彙就屬於第四與第五類組，常相連結的詞彙有「火焰」(пламя)、「塵土」(пыль)、「奴隸」(раб)、「煙霧」(дым)或「髒污」(смрад)等，是屬於世俗的現實社會層面。這大類所屬顏色存在著明顯的對立關係。

除了連結麗人出現時「白色」(белый)、「藍色」(голубой)、「金色」(золотой)，麗人的意象常伴隨的是「寂靜」(тишина)、「聖廟」(храм)、「教會」(церковь)、「天使」(ангел)、「遠方」(даль)、「小花」(цветы)、「天鵝」(лебедь)、「白雪」(снег)、「霧」(туман)、「馬」(конь)等等。麗人的出現虛無縹緲、似有若無，如仙女下凡一般，透過布洛克多彩的詩歌語言及一連串意象的結合，建構一連串麗人的聖潔神祕的意象體系。

## 2. 反題時期

第二階段「反題」時期 (1904-1908)，具有懷疑主義色彩，是布洛克創作的重要轉折時期。嚴峻的鬥爭打破了詩人所編織的象徵美夢，他逐漸放棄了神祕主義及世界和諧的美好理想，開始關注起日常生活，受到貧窮及政府壓迫的痛苦世界。如在詩集《城市》中布洛克已逐漸背離了神祕主義，放棄他所期望的世界和諧的理想。「永恆的女性氣質」在這裡不是以崇高的浪漫主義概念出現的，而是聽慣城市街頭喧囂的塵世中顯現。

詩人開始面對現實並於現實的社會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將自己置身於民族國家的命運當中。也因此詩歌題材也轉向反映生活及社會鬥爭等重大社會題材。詩人的女性意象也從神聖純潔的「麗人」形象轉變成爲酒館中帶著黑色的面紗的「陌生女郎」。

<i>И каждый вечер, в час назначенный</i>	每天傍晚於約定的時光
<i>(Иль это только снится мне ?),</i>	(或許這只是我的夢幻)
<i>Девичий стан, шелками схваченный,</i>	一位穿著洋裝的苗條女郎
<i>В туманном движется окне.</i>	出現於煙霧朦朧的窗旁
---	---
<i>И веют древними поверьями</i>	她那頭上帽子插著黑色羽毛
<i>Её упругие шелка,</i>	她那飄逸的洋裝如雲彩衣裳
<i>И шляпа с траурными перьями,</i>	她那纖美的手指滿是珠寶閃亮
<i>И в кольцах узкая рука.</i>	讓人相信她是傳說中下凡的女郎
<i>И странной близостью закованный.</i>	一種奇妙的親切感把我征服
<i>Смотрю за тёмную вуаль,</i>	對著她黑色的面紗我不禁凝望
<i>И вижу берег очарованный</i>	那裡我看到了迷人的彼岸
<i>И очарованную даль.</i>	我看到了令人神往的遠方

(II, 185)

於〈陌生女郎〉(“Незнакомка”)詩中，布洛克審視這位酒館中出現的陌生女郎，從燈紅酒綠的酒館中，主人翁仍在找尋「迷人的彼岸和令人嚮往的遠方」。「陌生女郎」起源於「麗人」，一方面這是對於舊象徵的一種傳承思考，另一方面是對於「麗人」意象的疏遠、否定，這一新的意象讓布洛克體會接近現實及塵世的願望。雖然此時期詩人的思考對於美的膜拜仍處於朦朧的狀態但滿懷期

待，隨著時代變化詩人的思想逐漸深化，詩歌中的社會主題及知識份子的主題愈來愈深化及鮮明。

於此階段布洛克此時的注意力擺在周圍發生的情勢變化，幻化成詩裡的内容，也就是主人翁所生活、活動的地方。在詩集裡的「城市」的面貌是以不同形式呈現出來：「暗淡的屋頂」(оловянные кровли домов)、「胡同」(переулки)、「廣場」(площади)、「街道」(улицы)、「櫥窗與人行道」(витрины и тротуары)、「黑暗的門縫」(тёмные подворотни)、「懸掛明亮燈火的劇院門口」(театральные подъезды с яркими фонарями)、「夜晚的小酒館」(ночные кабаки)、「郊外的餐廳」(загородные рестораны)等。

爲了更了解此階段中的各種意象之特色，對照《麗人吟》詩集中的分類，依照詩詞象徵的意涵可以將《城市》詩集裡常出現的意象詞彙分爲五組：第一組爲「雪」(Снег)及「花」(Цветы)；第二組爲「她」(Она)和「陌生女郎」(Незнакомка)；第三組爲「霧」(Туман)、「黑暗」(Мрак)和「日落」(Закат)；第四組爲「詩人」(поэт)；第五組爲「工廠」(Фабрика)和「城市」(Город)。

如果《麗人吟》的象徵核心是以世界本質的神祕性所呈現，那麼《城市》的核心便是更趨向於社會現實情況的反映，是某種新的社會本質。詩集中呈現出一種混亂、無系統的社會活動。在這之中，「永恆女性」已經漸漸遠離，既神祕又純粹潔白的理想國度也已逐漸消失。

將布洛克創作第一階段代表詩集《麗人吟》與第二階段之代表詩集《城市》中象徵神聖崇高的第 I、II、III 類組相對比便可發現，《麗人吟》裡的美婦人處在既神祕又崇高的環境裡，她在上帝的擁抱中，接近大自然意象中之天空。而在《城市》裡代表著高尚又純潔的常相連字彙已從抽象、虛幻的代表換化成可碰觸的雪和花，是走入現實社會的「陌生女郎」。於第二階段神性意象的「蔚藍天空」已變成實際的「白雪」和「小花」，神聖的聖廟形式已逐漸消失。

此時期大自然意象「霧」及「日落」於詩歌意象中湧現，常和「黑暗」連結，其實也等同於詩人在這一時期較爲朦朧灰暗的心緒。而這樣的自然意象也各顏色的意象相互輝映。在《城市》詩集裡灰色是主色調，這是困苦平民百姓的代表色，像是穿著灰上衣的狀漢或是在灰色天空底下祈求麵包的可憐人們。如在〈最後一日〉(Последний день)、「大會」(“Митинг”)、「從地窖黑暗處升起...」(“Поднимались из тьмы погребов...”)等詩裡所透露出的氣息大多是灰濛濛不清楚的桎梏空間。於〈依舊美好的灰色天空〉(“Ещё прекрасно серое небо...”)詩中，寒冷的光線使沙皇的冬宮呈現灰濛或是灰色的街道上覆蓋著滿滿的蜘蛛

網等，這其實是形容當時在社會層出不窮的擾亂鬥爭中，小老百姓們於夾縫中求生存灰白荒涼的意象。

<i>Ещё прекрасно серое небо,</i>	灰色天空依舊美好
<i>Ещё безнадежна серая даль.</i>	灰色遠方依舊絕望
<i>Ещё несчастных, просящих хлеба,</i>	無人憐憫，無人憐憫
<i>Никому не жаль, никому не жаль !</i>	祈求麵包的可憐人

<i>И в небе сером холодные светы</i>	在灰色的天空中，寒冷的光線
<i>Одели Зимний дворец царя,</i>	壘罩著沙皇的冬宮，

--

--

(II, 176)

此時期的詩人位於第三組的「灰霧」及第五組「城市」之間，雖然周遭世界充滿灰暗的色調，但詩人的心中仍然嚮往能從現實中找尋到心目中的蔚藍理想。藍色在此時依舊是布洛克心目中對於真善美的期望代表，但又因感受到現實世界的動亂不安，此階段藍色開始與陰鬱及昏暗的場景相連結。像是〈傳說〉(“Легенда”)、〈隱形人〉(“Невидимка”) 與〈你面無笑容走過...〉(“Ты проходишь без улыбки...”) 詩歌中所描繪：藍色的帳幕是低矮的、藍色煙幕在城市上空、藍色陰鬱依托在神聖的遺跡之上。當然，布洛克所賦予它的神聖瑰麗色彩依舊存在，像是〈在小酒館，在胡同，在轉角處...〉(“В кабаках, в переулках, в извивах...”) 還有〈我處在四面牆 — 絕望的...〉(“Я в четырех стенах — убитый...”) 裡的仍可看見蔚藍地及蔚藍的像在天上的她。也如同〈陌生女郎〉“Незнакомка”的藍眼睛在遙遠的岸上發亮。

<i>И перья страуса склоненные</i>	帽子上低垂的羽毛
<i>В моём качаются мозгу,</i>	總在我腦海裡搖晃，
<i>И очи синие бездонные</i>	深不可測的藍眼睛，
<i>Цветут на дальнем берегу.</i>	在遙遠的岸上發亮。

(II, 185)

《城市》時期和《麗人吟》時期最大的不同在於其主色調從象徵聖潔之白色及藍色，轉換成灰色、黑色及紅色，這些顏色意象和第三組及第五組的意象

象徵相互連結。「灰色的行人」(Серые прохожие)象徵的底層人民，而「紅色境內的城市」(город в красные пределы)或「黑色的巢穴」(чёрный притон)、「黑色的披甲兵」(латник в чёрном)等描繪均呈現社會動盪不安、現實生活緊張氣氛的縮影。這和《麗人吟》所描繪的景象顯著不同，呈現更為具體、更入微深刻的動亂緊張之感。此時期以灰、黑、紅為主之顏色意象，讓人感受到這時的俄國社會瀰漫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革命氣息，處在一觸即發的時刻。尤其是1905年革命後，國內社會矛盾愈加嚴峻，俄國人民日益高漲的反動激情還有嚴重的鬥爭形勢都一再敲碎破壞了布洛克初期那幻想的美夢。

除了黑色意象之外，白色意象也逐漸轉往死亡與強烈哀淒的象徵意蘊，白色與純潔的理想相連，也與黑暗的死亡相連，這種移動性是與布洛克看世界的觀感相關。也突顯出反題時期的懷疑主義色彩，呈現一種反象徵的藝術表現手法。所謂的「反象徵」指的就是在象徵中的「自我否定因素」，即隨著詩人世界觀的改變，藝術表現手法也有所變化，同一詞彙在不同創作階段有了相反的變體象徵意義，失去了原來崇高地位，轉向低俗的象徵 (Эпштейн 1977:354)。這樣的反象徵手法也反應在「麗人」至「陌生女郎」意象的轉變。

除了顏色的意象外，聲音意象也反應作者創作中象徵意涵的改變。聲音意象從神聖的「寂靜」及「祭禱」聲轉變成了灰色街道中人群的「沙沙作響聲」(шелется)，酒館中的「嘻笑聲」(хохот)、「玻璃杯的相碰聲」(в звоне стаканов)、「尖銳咒罵聲」(резко — раздались проклятья)及「士兵們『一、二、一、二』的答數聲」(Шлепают солдатики: раз! два! раз! два!)。於〈傳說〉(“Легенда”)詩中現實中的哈哈大笑聲及轟隆雷聲結合，打破大地沉寂，似乎嘲諷這瀰漫死亡氣息的城市。

*Под дождем умолкала песня дальних  
колес...*

*И толпа грохотала. И гроза хохотала.*

*Ангел белую девушку в дом свой унёс.*

*(II, 167)*

*雨聲下遙遠的車輪之歌*

*沉寂下來...*

*人群轟轟作響，雷亦轟隆*

*天使帶走家中的白女孩*

此時的革命與社會環境使他從孤獨的冷眼旁觀到漸漸融入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嘗試用幻想揭示世界的奧秘到冷靜地觀察現實，他逐漸擺脫象徵的理想朝向現實生活。

### 3. 合題時期

第三階段「合題」(1908 年後) 是對現實的一種嶄新思考, 布洛克想引導混亂的世界重新走向統一的和諧。在 1905 至 1917 年兩次革命之間, 布洛克對祖國和人民的歷史命運特別關注。他向著革命方向突進, 在社會鬥爭日趨激烈的形勢下逐漸擺脫象徵主義, 轉向現實生活, 於其詩歌創作中作者一方面揚棄過去的束縛, 又把過去種種特徵整合起來。在這階段, 是詩人艱難甚或痛苦的道路達到最後的巔峰階段。這期間出現的詩作響鳴起兩種聲音, 一種聲音揭示他稱之為《可怕的世界》(“Страшный мир”) 中人的孤獨、痛苦與絕望, 渴望著拯救與解放; 另一個聲音則嚮往未來、嚮往革命, 透過絕望與痛苦, 愛恨交織來表達對祖國、對人民、對生活的希望, 如長詩《十二人》(“Двенадцать”)。

從這時期開始, 布洛克愈是對生活留心觀察, 愈是對周圍的世界作深入思考, 不再只侷限於象徵主義的框架, 而是擴大對現實世界的真實描繪, 將所感受到的社會黑暗與困苦人民的生活, 透過象徵的隱喻與寫實的描述於其詩歌中呈現。他在這創作成熟時期, 所展現的是對思想和藝術方面的信念和熱情, 而不單僅僅是他原有象徵主義體系手法的呈現。《可怕的世界》這一詩集的核心與布洛克其他詩集都相關連, 首重在探討俄國境內受革命動盪影響後的氣氛, 還有因權威沙皇暴虐統治下, 底層人民困苦生活的寫實描述。

這階段之創作中, 布洛克最主要想呈現的內容是「洞察生活本質」, 於《可怕的世界》中經由許多修飾語使用加深詩集所呈現的氣氛。如詩集中代表性的之修飾語「荒涼的、偏遠的、消條的」(глухой) 和「空虛的、無聊的」(пустой, пустынный) 突顯當時不安社會中人民生活的本質。這些修飾語所描繪的主體是外在世界的面貌: 「荒涼的街道」(на улицы глухие)、「閉不透風的窗戶玻璃」(за глухим стеклом окна)、「幽暗荒涼」(мрак был глух); 也用來描寫時間: 「萬籟俱寂的夜晚」(вечера глухие)、「消條歲月」(года глухие); 有時是描寫人的感受: 「沒有理由的沉悶憂鬱」(глухая тоска без причины); 當然也有對於心靈的描述: 「你的心靈既疲倦又冷漠」(ты душа усталая глухая); 和對生活的描述: 「我消磨著既瘋狂又寂寥的生活」(Я коротаю жизнь мою, Мою безумную, глухую.) , 詩中所強調的生活與世界本體是: 「塵世空虛的無聊日子」(пустынной жизни суета)、「冷漠的世界, 空虛、簡單又寂寥!」(--мир бесстрастен, чист и пуст!) 這些修飾語特別突顯《可怕的世界》中所呈現的貧脊、沙漠般的生活, 既荒涼又冷漠 (Кожевникова 1986:202)。

有關女性的意象, 於《可怕的世界》首篇〈致繆斯〉(“К Музе”) 詩中出現了有別以往的「繆斯」女神的意象。文學作品中的「繆斯」的形象通常以溫柔婉



約、和諧美麗的象徵出現，但此時的「繆斯」是悲劇性的，她的聲音帶有嘲諷的訊息。

<i>И когда ты смеешься над верой,</i>	當你嘲笑信仰時，
<i>Над тобой загорается вдруг</i>	你的頭頂突然閃過
<i>Тот неяркий, пурпурово-серый.</i>	我曾看見過的
<i>И когда-то мной виденный круг.</i>	朦朧的紫灰色光環。

(III, 7)

詩中的「你」(ты) 指的就是繆斯。她大膽嘲笑忠誠信仰的神聖。紫灰色的光環其實就是現實的象徵，現實社會的死亡氣息讓女神的形象不再輕歌曼舞。

爲了更清楚分析《可怕的世界》五大意象之間的關係及特色，依據其象徵意涵可將讓詩集常出現的詞彙意象可分爲五大組：第一組爲「天空」(Небо)及「岸邊」(Берег)；第二組爲「她」(Она) 和「繆斯」(Муза)；第三組爲「黑暗」(Мрак)、「日落」(Закат)、「可怕的世界」(Страшный мир)；第四組爲「詩人」(поэт)；第五組「魔鬼」(Демон)、「死亡」(Гибель)、「地獄」(Ад)。

此時的自然意象籠罩著一股陰暗的氣息，「黑夜」及「日落」和 現實社會中「可怕的世界」連結，詩人深陷其中，感受到如從地獄般傳來之死亡訊息。

對於詩集中顏色意象的變化，從《城市》至《可怕的世界》可發現於此創作的階段詩中所呈現的內容更爲陰暗，黑色意象成爲主調。於此時期可怕的世界中常相連接的色彩爲黑色及黃色（歸屬於第三組及第五組），基本上是呈現對於下流骯髒、墮落放蕩世界的描繪及諷刺，另一方面是爲了無法真正落實理想、崇高的美麗世界而感到失落惆悵。

《可怕的世界》詩集延續《城市》詩集的舊有形象，並且更加深了它的陰鬱及恐怖，其實從色彩的變化便可清楚得知各自特點的不同。原本《城市》詩集中是以「紅、灰」交雜的色調爲主，於《可怕的世界》裡變成是以「黑、黃」相織的色調爲主，加深了死亡的訊息。原本的「灰色的夢」(серый сон)、「灰白僵硬的身軀」(серо-каменное тело)、「夜晚的灰色蒼穹」(серый как ночные своды)、「灰色天空」(серое небо)、「紅色太陽」(красное солнце)、「在紅色境內的城市」(город в красные пределы)、「紅色光線」(красный свет) 變成「黑色天空」(чёрное небо)、「黑色玫瑰」(чёрная роза)、「冬季黃色日落」(жёлтый зимний закат)、「黃色霞光」(жёлтая заря)、「在那黃色的日子裡」(в эти жёлтые дни)。

於此可怕世界中的黑色意象描繪的城市是痛苦、喪失名譽的地方，是以粗俗力量和金錢就能夠取勝的地方、是一切(包括愛)都能出售及買賣的地方。於詩歌〈合唱中的聲音〉(“Голос из хора”)中寫道：

<i>Всё будет чернее страшный свет,</i>	可怕的世界愈來愈黑暗，
<i>И всё безумней вихрь планет</i>	星球風暴愈加瘋狂...；
(Ш, 62)	

詩歌〈黑色的血〉(“Чёрная кровь”)強調就算是愛也無法馴服這陰暗的城市；詩歌〈死亡舞蹈〉(“Пляски смерти”)中描繪可怕的死人張牙裂嘴齜開黑色的嘴唇；詩歌〈我朋友的生活〉(“Жизнь моего приятеля”)敘述底層人民大多數人的心聲，毫無信仰、悲傷、淒慘又黑暗。除了黑色之外，黃色在《可怕的世界》詩集中也表達出整個社會的情況，像是〈屈辱〉(“Унижение”)中在冬季黃色日落時，斷頭台所行刑的死刑，表現當時人類所生活的驚駭絕望世界。

<i>В чёрных сучьях деревьев обнажённых</i>	在光禿禿的黑色樹枝中
<i>Жёлтый зимний закат за окном.</i>	窗外是冬季的黃色日落
<i>(К шафоту на казнь осуждённых</i>	(斷頭台前被定罪的死刑犯
<i>Поведут на закате таком).</i>	在日落時行刑)
(Ш, 31)	

在主要的洞察「可怕世界」的描繪中，仍存在這另一種微弱的聲音，於絕望與痛苦生活中，表達對未來的希望。也因此於第 I 類組中也會連結白色和藍色及顏色意象，「天空」及「彼岸」之意象又再次出現。在這個階段它們就像是結合了《麗人吟》的神聖抽象及《城市》中的實際理想，成為救贖黑暗世界的純潔力量的象徵。但這樣的意象於《可怕的世界》詩集裡非常的微弱，是屬於一種現實的描繪的反襯，強調在如此邪惡可怕環境裡仍潛藏著希望。如於詩歌〈魔鬼〉(“Демон”)中，即使追求者可能消失跌落於大地之中，即使是魔鬼所創造出來的幻影，但白光閃耀的高山仍然是一種追尋的希望。

<i>И на горах, в сверканьи белом,</i>	而在那白光閃耀的高山
<i>На незапятнанном лугу,</i>	在那潔淨無瑕的草地
<i>Божественно-прекрасным телом</i>	我將用我這柔美的軀體

*Тебя я странно обожгу.*

夢一般神奇地燃燒著你

---

---

*И под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улыбкой,*

消失於飛翔之際

*Уничтожаясь на лету,*

在絕妙的歡笑中

*Ты полетишь, как камень зыбкий,*

而你像顆搖晃的石子飛走

*В сияющую пустоту...*

飛向燦爛無垠大地

(Ш, 60)

若和布洛克第一及第二創作階段比較起來，於「合題」階段《可怕的世界》詩集中主人翁常以「魔鬼」、「枯骨」等這類非人間的邪惡角色為主，他們主要來自於墳墓且準備要將世界同樣也壟罩在可怕的地獄裡。這樣意象和「正題」階段神聖的象徵及「反題」階段現實城市及工廠有著不同的面貌。爲了對抗這充滿魔鬼的非人世界，長詩《十二人》就應運而生。

隨著革命的氣氛愈來愈緊張，社會情勢的變化動，反應主人翁創作的感受，於「可怕世界」中所存在的二種聲音(絕望和希望)不再只是一強一弱的顯現，而是出現了互相抗衡的態勢，於長詩《十二人》中「漆黑的夜」(Чёрный вечер)及「潔白的雪」(Белый снег)兩種對比的顏色象徵著兩種力量兩種世界的爭鬥，黑暗舊世界和光明未來新世界的對比。

這樣的顏色意象明顯和大自然意象及聲音相互連結，「漆黑的夜」及「潔白的雪」的對比並不是靜止不動的，這和漆黑腐舊社會對抗的雪是以「暴風雪」夾雜「旋風」的意象呈現。布洛克於描述「風」的意象時，最常連結的動詞，如「急奔、奔馳、盤旋、旋轉」(лететь, мчаться, виться, кружиться)，也常伴隨修飾語「凶惡、猛烈、狂暴」(злой, дикий, буйный)的自然意象，除此之外「狂吼的聲音」(шум и звон)意象更增強此階段大自然意象的狂暴特性。詩中出現的風，有別於一般輕柔溫順的和風，其詩中的風常常夾雜著暴風雪及塵沙，讓人睜不開眼、站不住腳，這些象徵大都是有聲的、激烈的。這樣的大自然意象和以往作家所塑造出來的祖國平靜柔和之自然風光意象呈現極大的差異(Эпштейн 1990: 243)。

上述的自然和聲音的意象於長詩《十二人》中還夾雜著現實社會的機關槍聲「噠噠噠—噠噠噠—噠噠」(Трах-гарарах)，於狂風怒吼及噠噠槍聲中將革命的理想及宗教的意象融合在一起。

在布洛克創作的第三階段是詩人創作的成熟時期，許多作品和十月革命相關。長詩《十二人》屬於此時的巔峰作品。詩歌名為《十二人》很自然使人聯想到耶穌十二門徒，具有濃厚宗教的象徵色彩。詩中的十二人列隊來自社會之底層，他們是新信仰捍衛者的象徵，他們威武地行進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代表摧毀舊世界不可抗拒的力量，且最後耶穌基督成為不見形跡的領袖，這十二名列隊成為十二門徒，在恐怖與無政府的狀態的流血混亂之中產生一種新的福音。長詩《十二人》宛如是一種喪歌，也像是復活節的彌撒，將死亡和新生希望混合一起。透過十二位於彼得格勒街上巡邏，反應了十月革命這大風暴所帶來的影響，作者站在革命集體群眾的一方，宣告舊制度的滅亡及新世界的誕生，整篇詩歌瀰漫革命時代氣息。

### 三、結論

布洛克十分擅長運用五大文字意象：「女性意象」、「色彩意象」、「聲音意象」、「自然意象」、「神性意象」。五大意象之象徵反映當時社會動態及布洛克內心的感受。從「正題」的神秘主義，到「反題」的懷疑主義，直至「合題」時期合併前兩個時期的特色來看，由於社會氛圍以及詩人心境上的改變，文字意象之象徵意蘊特色也隨之變化。

「正題」時期是神祕主義的體現，以崇高的永恆女性為主題，神聖無法捉摸的麗人成為詩人追求的理想，代表色是純潔的白色、理想的藍色與明亮的金色，處於寂靜空靈及祭禱的神聖聲音意象中。蔚藍的天空的自然意象象徵理想的世界，此時期的麗人意象和神性的象徵結合，代表的一種神聖宇宙中心的永恆靈魂。

「反題」時期中懷疑主義體現於帶著黑色的面紗的陌生女郎的女性意象中，此時期詩歌創作以革命當下的社會生活為主，由血腥動亂的紅色及描繪底層人民的灰色為代表。聲音的意象從神聖的寂靜天籟中變成了城市中的轟隆聲、酒館中的嘻笑、咒罵聲及士兵們的答數聲；自然的意象也從神聖抽象的天空換化成可碰觸的雪和花，並和此時期相互輝映，以灰色相連結之灰霧及日落為主軸；此時期的神性象徵轉換成現實社會中陌生女郎，她是世間靈魂及在頹廢的氣氛中的一絲希望。

「合題」時期詩人對於現實有了更新及更深層的思考，帶有嘲諷氣息的女神繆斯成為這時期的象徵。此時期是象徵與現實的描繪的結合，深刻地影射出陰鬱及恐怖的真實世界，由墮落淫穢的黑色和蕭條沉悶的黃色相織成主色調，白黑之間的新舊勢力對抗也成為此時期重要的象徵意象。暴風雪聲及噁噁的槍

聲成爲十月革命大風暴的中聲音意象最佳代言人，自然的意象也變成摧毀舊勢力力量的風、雪，於這混亂的風暴中，結合人性及神性的耶穌基督成救世之力量。

由以上的分析顯示，文學作品中文字意象色爲一種典型的情感符號，內蘊深刻豐富，詩人們常藉以運用以成爲強力的情感表達手段。它不僅可以再現描述對象的外貌，經過作者的主觀審美加以歸納粹煉，呼應社會歷史變遷的同時，更能創造意境、表現特定的情感思想。

### 參考文獻

- Блок А. А. (1960-1963), Собр. соч. : В 8 Т. М.; Л.: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Брюсов В. Я. (1955),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 2.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Винокур Г. О. (1990), О язык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1977), 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этика. Стилистика. Л.:Наука.
- Ковтунова И. И. (2003), Очерки по языку русских поэтов. М.:Азбуковник.
- Кожевникова Н. А. (1986), Слово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в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М.:Наука.
- Кожин В. В. (1964), Слово как форма образа// Слово и образ: Сб. статей.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 Лотман Ю. М. (1998) Структур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 Лотман Ю.М. Об  
искусстве.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
- Минц З. Г. (1999), Поэтика 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а. СПб. :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Потебня А. А. (1976), Эсте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 М.: Искусство.
- Тимофеев Л. И. (1976), Основы те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 Шкловский В. Б. (1929), О теории прозы. М.: Федерация.
- Якобсон Р. О. (1975),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 «за» и «против».  
М., Прогресс.
- Эпштейн М. Н. (1977), Диалектика знака образа в поэтическ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А. Блока. // Баробали Ю. Я. Семиотика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Наука.
- Эпштейн М. Н. (1990), "Природа, мир, тайник вселенной.": Система пейзажных  
образов в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 于勝民 (2000)。〈“美婦人詩吟”的神話象徵結構〉，《二十世紀文學》，第  
三期。
- 史朗寧 (1981)。《現代俄國文學史》，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 阿格諾索夫 (2001)。《白銀時代俄國文學》，南京：譯林出版社。
- 吳元邁 (1998)。《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青島：青島出版社。
- 索振羽 (2000)。《語用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袁順芝 (2005)。〈論勃洛克詩歌語言編碼藝術〉，《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第28卷，第1期。
- 曾思藝 (2004)，《俄國白銀時代現實主義詩歌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圖爾柯夫(1993)。《勃洛克傳》，上海：東方出版社。

## 《淡江外語論叢》徵稿辦法

99 年 9 月修訂

### 一、稿源性質：

- (一)《淡江外語論叢》為學術性期刊，內容包括外國語文教學及研究：外國文學、比較文學、外國語文、語言學、比較語言學、外國文化、翻譯學、外國文學及語言之教材教學法等領域。
- (二)刊載文章須為首次發表之著作，且為上述範圍內的原創學術論文。

### 二、徵稿對象：本院專兼任教師、研究生及國內外專家學者。

### 三、截稿日期：6 月出刊之截稿日為 4 月 15 日；12 月出刊之截稿日為 10 月 15 日。

### 四、篇幅與語言：來稿除英、法、德、西、日、俄文等 6 種外語外，亦可使用繁體中文，且以不超過 A4 規格 20 頁為原則。

### 五、內容與格式：

- (一)論文需符合國科會「國內學術性期刊評量參考標準」。
- (二)所有來稿務請完全依照「《淡江外語論叢》論文書寫格式」處理妥當，否則礙難接受。

### 六、評審：著作經本刊編輯委員會初審後，委請校內外專家採匿名方式審查。審稿辦法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另定之。

### 七、文責：本刊刊載之著作，文責由作者自負。論文經送審查後，不得要求撤回。

### 八、版權：投稿本刊時須檢附著作權授權書，著作文稿經本刊決定刊用後，其著作權仍歸著作者所有。本刊具「第 1 次使用權」。歡迎著作者(或其授權人)日後以任何形式引用或轉載，不須徵求本刊同意，但務請註明「原載《淡江外語論叢》第○期○頁民國○年○月」字樣。

### 九、酬勞：本刊為純學術服務性質，無法致送稿酬。



十、本刊出版後將分贈國科會，國家圖書館及國內各主要大學圖書館各 1 冊，作者可獲得 2 冊。

十一、本辦法經本刊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刊賜稿處及聯絡方式：

2513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淡江大學外語學院 淡江外語論叢

Phone:(02)2621-5656 x 2558 (02)2622-4593

Fax:(02)2623-2924

E-mail : jtsfee@staff.tku.edu.tw

## 《淡江外語論叢》書寫格式

99年3月修訂

本刊為統一格式，敬請配合版面格式，以利作業。相關事項如下：

一、所有來稿請以電子檔傳送至本刊 [jtsfee@staff.tku.edu.tw](mailto:jtsfee@staff.tku.edu.tw) 信箱，或以A4紙張單面列印一式3份，連同光碟寄至「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淡江大學外語大樓410室《淡江外語論叢》收」。

二、無論中外文稿件，一律由左向右橫寫，A4規格。版面上下各空2.54cm；左右各空3.17cm，以12號字體隔行繕打。最小行高；18PT。中文、日文每行34個字，每頁38行，西文每行69字元，每頁38行。

三、論文採「隨文注」；補充說明之注則採「隨頁注」；引述出處標寫如（張大春 2000:27）、（Catfort 1968:35-38）；引言後置如下：

一國文字和另一國文字之間必然有距離，譯者的理解和文風跟原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之間也不會沒有距離，而且譯者的體會和他自己的表達能力之間還時常有距離。[...] 因此，譯文總有失真和走樣的地方，在意義或口吻上違背或不盡貼合原文。那就是『訛』（錢鍾書1990：84）

四、「中、英文摘要」及「中、英文關鍵詞」請附論文首頁，「中英、文摘要」字數各以120-150字左右為宜。

五、論文後面僅列出「引用書目」即可。書目呈現方式如下：

金 緹（1989），《等效翻譯探索》，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67頁。

吳錫德，〈如果新小說變成經典〉，《中國時報》，1997/10/30，頁42。

Cotford, J. C.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Press,

Chevrel, Y.(1989), *La littérature compar(e)*, (比較文學), Paris: PUF, 中譯本：馮玉貞譯，台北：遠流。

六、中文正文採用「新細明體」，引文採用「標楷體」。

西文正文及引文採用「Times New Roman」；日文採明朝體。

七、請提供論文作者英文姓名及文章篇名英譯。

八、校正

所有文稿均請作者自行校正，務請細心謹慎。

若審查人表示文稿須修正後刊出，本刊將先退回稿件，請作者於2週內修正後送回，逾期則不予刊登。

九、各語言書寫格式可參閱前期刊登文章。

(淡江大學外語學院網址：<http://www.tf.tku.edu.tw>)

## 《淡江外語論叢》審稿辦法

99年9月修訂

- 一、所有來稿先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就論文寫作格式、稿件的書寫及排版是否符合本刊規定進行形式審查。不合格者退回請修正。
- 二、經形式審查合格者，送交審查人初審。
- 三、審查人名單由編輯委員會提名校內外專家學者產生，審查人之姓名皆不公開。內稿送2位校外審查人初審；外稿送2位校外審查人或送校內、校外審查人各1位初審。刊登標準如下：

審查意見	結 果
2位通過	直接接受或修正後再接受
1位通過，1位不通過	送第3位審查人複審
2位不通過	退稿

- 四、評審費：每篇論文校內審500元，校外審1,000元，送第3人審查者由作者自行負擔1,000元。
- 五、本辦法經本刊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